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象牙塔的人們：  
台灣學者的類型分析

The logo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Library is a circular emblem. It features the university's name in Englis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round the top inner edge and "PROG" at the bottom.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 "圖" (Library) and a smaller character "書" (Book).

指導教授：朱元鴻

研究生：張舜翔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

## 摘要

本文試圖討論從 1949 年國民黨遷台後發展至今的台灣學術場域其時空特殊性與學者家庭教養程度，對台灣學者的學術態度影響。並透過面對面訪談的方式測量學術場域受到外部影響的程度和內部變化的差異，最後再將這些差異予以分類和解釋。學術場域作為一個如象牙塔般的相對自主性場域，它和外部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在康德的「系所鬥爭說」中，學術場域必定要透過學科之間的分工來解決這個問題。但國家的處境，歷史的變化對學術場域分工方式的影響為何？又是什麼樣的教養條件促使學者被分配到不同的學術工作？研究發現，台灣的學術場域構成和學者的學術態度深受國家處境和學者的家庭文化教養所影響，學術實踐其實是兩者交互影響下的產物。

關鍵字：學術場域、慣習、反思性、後進國、系所鬥爭

##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investigate how Taiwan academic field and its specificities with historical context and developmental-state situation, and the magnitude of cultural cultivation of the members of Taiwan academic field, which influence the academic practice and attitude of Taiwan scholars, from 1949 KMT government transferred to Taiwan to now on. The research, through interviewed with 29 scholars in 6 different disciplines, attempt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external influence from outside of academic field, and internal structure varied difference. As a ivory tower in metaphor,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field and its external society? According to Kant's '*The conflicts of faculty*', academic field have to solve this problem by division of labour. But in sociological sense, how does historical events and developmental-state situation affect this division, or distinction, and what kinds of social origin and cultivative conditions affect scholars' academic attitude in the division of academic labour? In my article, the composition of Taiwan academic field and scholars' academic attitude are deeply influence by developmental-state situation and scholars' family cultivation. Academic practices in Taiwan are the product of those two mutually affected conditions.

Keywords: Academic Field, Habitus, Reflexivity, Developmental State, *Conflict of Faculties*.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源起	2
第二節 問題意識	3
第三節 文獻探討：康德的分類架構面對不同時代和國家的 問題	4
第四節 研究與實驗設計	8
第二章 學術空間：康德「系所鬥爭」說的探討	13
第一節 康德的想像	13
第一段 為何而寫？	13
第二段 康德的系所鬥爭隱喻	14
第三段 康德系所鬥爭說的問題	16
第二節 構成學術「合法鬥爭」與「相對獨立性」的正當性 基礎	18
第三節 與康德斟酌	20
第三章 後進國台灣的學術場域建立	24
第一節 節省、侷限的學術獨立	25
第二節 主導台灣學術和教育的實業家官僚現實心態	29
第三節 暫時性高教員（先知型學者）的浮現	36
第一段 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暫時性高教員	37
第二段 科學家的暫時性高教員	42
第四章 台灣（北部）學者的學術態度與價值測驗分析	44
第一節 學者的意見	44
第二節 初級分類	47
第三節 訪談分析	50
第一段 務實型學者	51
第二段 先知型學者	60
第三段 知識貴族型學者	70
第四節 學術地圖	77
第五章 結論	81

## 圖表

表 3-1	臺閩地區教育經費概況·····	30
表 3-2	臺閩地區高等教育·····	31
表 3-3	1950-200 年台灣留學生國家比例·····	34
表 4-1	訪談結果比例·····	47
圖 4-1	學術態度分類的相應分佈圖·····	77
圖 4-2	父親的教養和學術態度的相應分佈圖·····	80

# 第一章：緒論

科學的學科史傾向於壓抑一個事實，知識所處的世界和它所討論的世界是同一個。<sup>1</sup>

—— Steve Fuller

## 第一節、研究源起

本文的目的在於解釋台灣學術場域的時空特殊性，以及學者家庭教養程度，對台灣學者的學術態度和價值判斷所產生的影響。並且藉由不同的影響區分出不同類型的學者。啟發研究中的區分架構主要來自康德的系所鬥爭理論<sup>2</sup>，不過康德討論大學系所的分類時，並沒有考慮到時代的差異，而且歐洲的大學體制正在康德寫作些書之後開始變化，現代大學的專業化分工體制開始成形。因此有必要在參考康德的理論架構時，同時與歷史和台灣情境回應。

談及學術工作，社會學的經典中就以韋伯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sup>3</sup>最廣為人知。其中提到，學術工作是一種沒有任何價值目的的熱情，學者是一個為學術而學術的專家，他在課堂和研究的表現上不應該有任何神聖的情懷，他不能是任何一種形式的領袖人物，更不應該把這種領袖魅力帶入校園和學術，不管他服務的價值是低賤或是崇高。

不為任何目的而服務，只是不斷的自我指涉、自我繁衍的學術可能嗎？什麼樣的原因會讓人選擇進入學界這座象牙塔<sup>4</sup>工作？不同的原因會導致不同的學術

---

<sup>1</sup> 參見Steve Fuller,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nd the Rhetor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Knowledge: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ies in Disciplinary.*, p.125.

<sup>2</sup> Kant, 1992, *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

<sup>3</sup> 參見Weber, 'Science as Vocation', in Gerthe and Mills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P144. "Furthermore,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scientific work and its presuppositions varies widely according to their structure. The natural science, for instance, physics, chemistry, and astronomy, presuppose as self-evident that it is worth while to know the ultimate laws of cosmic events as far as science can construe them. This is the case not only because with such knowledge one can attain technical results but **for its own sake**, if the quest for such knowledge is to be a 'vocation'. 學術固然可以獲得某種可見的技術應用結果，但學術的目的並不能終於此，亦不能被應用結果的滿足所限制。而是「為了學術自己」。

<sup>4</sup>象牙塔一詞最早出自舊約聖經雅歌 (Song of Solomon) 第七章，所羅門王讚美他所摯愛的美女：「你的頸項如象牙臺；你的眼目像希實本、巴特拉併門旁的水池；你的鼻子彷彿朝大馬色的利巴嫩塔。」但是其後十九世紀的文評家兼詩人Charles-Augustin Saint-Beuve於1837寫了一首詩 (Penses d'Aout (Thoughts of August)) 批評雨果 (Victor Hugo) 和維尼 (Alfred de Vigny) : Hugo, strong partisan ... fought in armour, And held high his banner in the middle of the tumult; He still holds it; and Vigny, more discreet, As if in his ivory tower, retired before noon. 之後，象牙塔一詞就接近現代的用法，指的是脫離日常生活的關注和特性、遠離實存世界的人們所聚集的活動。「象牙」一詞有潔白不染、堅硬之意，意味著超凡脫俗。另外，象牙也是昂貴的材質，象牙塔亦有昂貴且奢侈之意。

選擇嗎？若不是，那改變的又是什麼？在大學已成為定義知識機構的今天，「學術」一詞總納這麼多的學者、這麼多的學科、開這麼多的課，收納那麼多對知識態度不同的學生和學者，難道每一個都是按照韋伯對學術志業的方式進行嗎？

1959年，小說家兼科學家史諾（C. P. Snow）應邀在劍橋大學瑞德講座（Rede Lecture）演講，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演講的題目是「兩種文化」，內容談到科學家與傳統人文知識分子之間的鴻溝所造成的彼此不理解與忽視。史諾的兩種文化區分十分的生動，以致於引起很多的討論，甚至批評，不過批判都是落在知識內容的討論上，例如Michael Yudkin便認為，不要說史諾訝異科學類的研究生不讀狄更生的小說了，就連被史諾通通歸類到「傳統文化」這邊的人們，就能夠掌握所有的文學、繪畫、音樂嗎<sup>5</sup>？科學和人文的知識差異並不下於它們自己內部次學門的知識差異，例如高能物理和理論物理的差異。然而這其實是誤解了史諾的論點。事實上，史諾早已說過，他關心的其實是窮國和富國之間的鴻溝，而科學和人文，只不過是他用來指涉能夠幫助國家富強的知識和抵制國家進步的知識之間的代號。這提醒了一種有別於韋伯對學術的觀點，學術知識其實是有很多用途的，而且有一種學術的立場是完全贊同學術知識應該要具有價值方向，要有目的性，要為不同的利益而服務。

史諾提出的不同立場，讓我們知道學術有很多種樣貌，「到底學術為何而存在？」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因人、因時、因地有不同的回答？有些學科的知識有明顯的使用價值，他們的知識能夠立即在就業市場和產品市場交易出去；但是有些學科的知識則讓人摸不著頭緒，完全不知道其存在的作用和意義，所以也不知道如何來正當化他們的存在，不管是知識的產出或是訓練出來的專業，幾乎和（一般）人們所能設想的社會一點關係也沒有。這個粗魯的問題有它的意義，因為這其實透露出提問者在學術上的無知。事實上有不少學者他的交換訓練管道就是和他同類的學者，他們之間以一種類似智力遊戲的競賽方式維持整個學術戲局的構成，使得他的活動範圍形成「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魔法圈。他們到底憑據著什麼樣的信念或社會條件，從事這種最孤單的社會實踐。

事實上學術圈裡，有多樣化的學術態度，有人把學術當成一種個人事業晉昇的工具，不斷尋求擔任更高的職位，或是想盡辦法往資源或名聲更好的學校擠去；有人把學術當成拯救社會國家的福音，到處批判哪裡的不公不義，教育平民的科學與民主素養；有人則純粹好奇，獲得像玩魔術方塊一樣的一種不可分享的樂趣。這三種學者是構成學術場域的主要類型，他們對學術在生命中的角色定位明顯不同，使人很難用同一範疇來解釋他們之間的差異。本文提出這三個學者的類型：務實的態度、理想的態度，菁英的態度。這三種差異如何構成的？國家的國際地位，歷史和社會的巨大結構，個人家庭的教養這些外部條件是如何影響學術場域這個象牙塔的？正如馬克思批評蒲魯東（Proudhon）的方式：不要錯把邏

---

<sup>5</sup>參見Michael Yudkin, 1962, in *Two Cultures? The Significance of C. P. Snow*, p.33.

輯的事物當成事物的邏輯。因此有必要探討承載知識的「知者」(the knower)，他精神氣質和背後的社會意圖之間的關係，這樣的社會意圖又如何被國家和社會所影響，這些完全屬於事物邏輯層次的社會條件。

當然，本文另一個好奇來自開頭引述 Fuller 的話「知識是存在於它所談論的同一個世界」，對本文作為一學術研究來說，如此的說法必定帶來強大的反身性 (reflexivity)，那麼對於研究的人們進行研究，要如何看待他的位置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也正如 Pascal 的名言：「是世界包含了我，但是我能理解它」(Bourdieu and Wacquant 2004) 一樣。既然談論世界萬物運作原理、千種文化情懷的學者可以說學術知識是普遍的，那麼當然「學者」這種存有應該也是能夠放在裡面的吧！

## 第二節、問題意識

一個場域的形成，決定於它是否能和外部的社會環境形成一個相對自主性 (relative autonomy) 的關係。如果它無法形成一套不同於外部環境的構作方式 (formation)，就無法聲稱它是一個獨立的領域<sup>6</sup>。這種相對自主性的構作方式，便是因為學術追求知識的真理，這是它唯一和其他的機構或是場域不同的地方，若沒有這個根本的目的，學術就無異於追求利潤的企業和追求救贖的宗教。

但是另一方面，學術場域不能憑空存在，它必須要給外部環境一個存在的交代，讓外部環境知道它的存在並不是沒有作用和意義的。這個交代

(accountability)，無疑的就是和外部環境的需求相結合的，透過服務於交代，也給了自己一個合理的生存空間，讓學術場域能夠繼續從事外部環境所不能理解的追求真理遊戲，繼續給他資源，不會視為異端邪魔。如此討論學術場域的首創，當屬康德的 *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sup>7</sup> 中所區分的高等系所 (high faculty) 和基礎系所 (low faculty)。在康德的區分中，高等系所的知識是人民所能欲求的，能解決他們在法律上，身體上，精神上問題的學者，也因此他們容易獲得一般人的關愛，而容易因為掌握了過多的權力而導致知識上的腐化；這時需要基礎系所的教員理性批判來遏止這種情形。基礎系所為什麼不會和高等系所一起腐化，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知識不是人們所能欲求的，不為任何的目的、理想、價值而服務的，純粹為學術而學術的。所以不會因為掌握了權力而腐化，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權力可言。康德清楚的劃分了學術中必定要有兩種人，一種為了外部社會的需要，一種為了學術場域自己的邏輯，這兩種系所之間必需存在著合法鬥爭的關係 (不欺騙、不利誘、不暴力脅迫，只純粹就理性討論理性)，學術界才可能存在。任一方過強都會危及學術場域的存在。

---

<sup>6</sup> 「獨立」其實是一個很弔詭的詞。因為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場域能夠毫不理會外部環境的存在，專斷地主宰一切場域內部的運作方式，它也許有一套自成一格的邏輯，但絕不可能和外部毫無關聯。

<sup>7</sup> Kant, 1992, *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康德的理論過於把學者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按系所學科的畫分來區分，似乎意味著有些系所學科（如康德例舉的法學、神學、醫學，現代的工程學）就註定是會腐化，並且等待基礎系所來批判的學者，而忽略了學術場域的分工和專門化發展，會使得每個系所學科都會獲得自己的一套獨立的核心理性，不會因為任何的社會價值目的或使用所腐化。換言之，理性不一定限定在特定的學科（或許某些學科的高等／基礎教員比例會有所不同）。針對這一點，本文在挪用康德的概念時會以歷史和國家的條件加入斟酌，甚至修改。

無論如何，康德展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即學術場域的形式是需要不同的學術態度分工所組成的，但是學術場域是人所構作的結構，他所提供的不同功能總是要有人來投入和參與才能達到。那麼如何決定什麼樣的人參與什麼樣的學術工作呢？什麼樣的人會帶著「給社會交代」的企圖從事學術實踐？又是什麼樣的人會投入「追求純粹真理」的學術活動呢？是什麼樣的背景或是國家、社會條件會作出這種選擇？

如果把外部條件當成「決定」學者從事學術的態度，這無疑過度強化了結構的力量，失去了個人的心智如何參與作用的過程。要解決這個問題來幫助思考，我們必需要找出外部條件的影響到底對學者產生了什麼意義。由於知識和藝術同是人類精神文化最高度的表現，而學術又是當代知識生產的主要模式，無可避免的，學者從事學術研究本身必然也是一種文化行為，沒有理由能解釋美學品味的說法卻不能解釋學術態度。因此文化教養將是幫助我們思考學者從事學術態度的重要概念。從家庭傳承而來的文化教養到底會不會影響學者從事學術的態度，這些教養又有什麼樣的差異？

「什麼樣的外部條件影響學者從事學術的態度」是本研究中重要的問題。如果回答了這些問題，就能讓這些人們說說他們的故事，帶我們走過學術重重的選擇機制；透過他們的時代背景、他們的家庭教養、他們選擇投入學術工作的理由等種種「區隔」，摸清他們所存在的地盤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 **第三節：文獻探討：康德的分類架構面對不同時代和國家的問題**

#### **1、近代大學的轉變：從文藝復興人到專業分殊化（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

當康德試圖建立起不同的系所學科之間的鬥爭關係時，歐洲的大學體制發生了一些轉變，這些轉變使得系所的屬性不再能夠以康德的區分方式來理解。因為分工制度在大學實行的關係，使得不同的知識都加入了「大學」的行列，成爲一個學科，有了自己的一套術語規則和學術實踐方式。這使得康德的賦予基礎系所

的「理性」特權，變得難以被特定的系所學科<sup>8</sup>所擁有，學科之間的互相批判也變得愈來愈困難。而這正是文化史學家Peter Gay提到「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的終結」<sup>9</sup>。

中世紀時，歐洲的大學只有神學、法學和醫學三門學科，1749 法國才出現第一個工藝學校 *Éco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 來教導設計、建築、開礦。但是當時重要，而且多數的科學家、發明家都在學院之外工作。直到雅各賓派倒台後，拿破崙於 1794 年開始強力支持工藝學校（*École Polytechnique*）對工程師和自然科學家的訓練，他一改初期對「思想家<sup>10</sup>」（ideologists）的敬重，開始意識到自己需要稱帝的合法性，而這批長年修習哲學的批判思想家正是他稱帝的路障。在拿破崙與羅馬教皇簽署協定後，他與思想家開始分道揚鑣，而反教權的思想家們也因為拿破崙與教皇的協定背叛了啓蒙的傳統而予以憤怒的批判。1802 年，拿破崙解散了法國科學院的第二分院，該院主要研究道德政治科學，幾乎所有在裡頭的成員都是「思想家」（Coser 1992）。「思想家」們規劃的教育體制一個個被拿破崙拆除。拿破崙於 1802 到 1805 年間進行教育改革，將教育的中心思想放在培養帝國的臣民，而不是自由的公民。大量湧入學校的青年們開始厭惡哲學討論和意識型態的爭辯。職業的大門似乎向樂於從事技術、軍事、行政或科學研究的天才敞開。一股重視「使用」（use）的學院風潮開始推行，也連帶著產生了古典教育和技術訓練之間的張力。一些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比較利益法則（comparative advantage）<sup>11</sup>的信仰者開始大力鼓吹分工的重要性，比較利益法則在勞動與經濟領域中獲得的效力蔓延到學院來，如Charles Babbage所說：「心智上的分工和制度上的分工是一樣成功的。」<sup>12</sup>

過去的學校是上層階級的堡壘，是凍結階級流動的壓縮機。古典教育的課程無外是神學、希臘文和拉丁文，一些數學和哲學；這些都是完全無涉於實際用途，而主要是承襲貴族氣質的學科。這引起了現代主義者（modernists）和世俗論

---

<sup>8</sup> 在康德的分類中，屬於理性批判的基礎系所有兩類。一類是指歷史性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史學、地質學、文詞學、人文學，和所有自然科學中的經驗科學；另一類指的是純粹理性知識（pure rational knowledge）：純數學、純哲學、自然和道德的形上學。這些學科都是因為沒有明顯的社會需求，只服從於理性，而被康德視為大學精神核心。本文第二章會對康德的教員鬥爭說作更清楚的討論。

<sup>9</sup> 參見Peter Gay, 1993,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V3,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p472-513。指的是全才全能型的人物，代表者是達文西。

<sup>10</sup> 主要是指一群在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派倒台後，主張從道德、教育、意識型態上重建法國的知識分子。主要成員有孔多塞（Condorcet）、Cabanis、Benjamin Franklin等人。他們希望繼承法國大革命的理性傳統。

<sup>11</sup> 比較利益法則指的是李嘉圖經濟學說中一個著名的經濟思想。他相信人有不同，因此專長和優勢也不同，所以與其強迫不熟悉或是不喜歡某種勞動的人，倒不是讓喜歡或熟悉不同勞動的人都有機會從事他們自己專長的勞務，然後再到市場上交換彼此的成果，總和來說，會比強迫人們去從事不熟悉的活動要獲得更大的生產量。

<sup>12</sup> *Ibid*, p474。

(secularists)者對古典教育的批評<sup>13</sup>。如Sydney Smith在《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中，以培根式的話語批評劍橋和牛津以古典教育的方式：把知識拿來襯托特定階級，使得大學失去它的責任。一直到1830年，牛津和劍橋才不甘願地取消了宗教測驗作為入學考的主軸。這時，過去用來稱讚一個人博學多聞的「愛好者」、「業餘者」(amateur, dilettante)則變成一個完全負面的字眼。

造成學科分殊化的知識動力是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利益法則，而社會動力則是布爾喬亞對階級流動的要求。這也為未來的學院設置和外部社會之間的關係安置了一個發展的典型，學科分類幾乎完全按社會分工所需來進行，也就使得學校成為勞動市場培養勞動力的重要制度。過去文科(liberal art)課程是大學的全部，如今則面臨到生存的危機，主要正是因為它較難完美地鑲嵌入社會分工的類型框架之中。這表現在現代大學的課程設計上，專業化的學科(如醫學、法學或工程科系)在大學四年課程中有四分之三花在專業課程上；而文科只有二分之一不到<sup>14</sup>。

大學專業化後對康德的理論架構應用產生了一個影響。在康德的「系所鬥爭說」中預設了兩種系所之間的差異，為社會需求服務的高等系所和為理性服務的基礎系所，而且因為任何的知識，即使是高等系所的知識都需理性的力量來幫助其知識的前進，但是在大學專業化後，學科和學科之間的關係變得無法以康德的架構來理解，每一個學科都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和專有名詞系統，共同修習的課目愈來愈少<sup>15</sup>，學科之間的知識相干性也愈來愈低落，彼此愈來愈陌生，已經很難設想康德說分類的基礎系所要如何對高等系所發動批評。

## 2、台灣學術與教育的社會歷史脈絡

康德的分類架構不只是時代上出現了應用的問題，對不同國際地位的國家也一樣會產生需要修正的問題。以身為後進國的台灣來說，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後進國家在發展學術上出現的問題，可以和康德的宣稱作一個限定和討論。

主導台灣早期發展策略的重要人物李國鼎(1978)指出：「為了要成為工業化國家，我們必需要開發並累積這些極其重要的人力資源。但如何進行呢？答案是雙管齊下，即透過教育和訓練。」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號，早在民國五十三年，經濟合作委員會即成立人力資源小組(後改名為人力發展小組)致力於建立適合

---

<sup>13</sup> 這裡如史諾著名的描述：「科學家骨子裡有未來」和「科學革命對貧富差距的決定性影響」，巧妙地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找到了先祖。現代主義者強調發展與未來，世俗主義者則強調唯物論對神學的反駁。

<sup>14</sup> 見William Gasement, "DO COLLEGE STUDENTS NEED A MAJOR?", in *Academic Questions*; Summer98, Vol. 11 Issue 3, p72, 7p。

<sup>15</sup> 在過去，無論什麼樣的科系，都必需學習神學、希臘文和拉丁文，一些數學和哲學。但這些共同修習的科目在現今大學的修課規定中所占的比例愈來愈少，而且愈是專業化的學科中，專業化的科目比重也愈來愈重。

台灣教育制度<sup>16</sup>。其後的教育制度完全是在促進國家競爭力的前提下進行的，古典博雅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所強調的，養成一個全人公民的人格(manhood)完全由專業教育所強調的人力(manpower)所取代。從民國五十七年的九年國教、民國六十年代工業專科學校的成長、到民國七十年代後大學工程科系的擴張，全是一期四年，連續六期的經建計畫中人力發展部門的產物(羊憶蓉 1994)。台灣的教育發展完全依賴經濟發展的方向而定。

除了教育是人力思維下的產物，學術研究亦是在人力的觀念下發展。從 1959 年在胡適的奔走下成立的「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到「國科會」，台灣發展學術的方式一直都有後進國家發展計畫經濟的特色，一來期望學術能為國家帶來經濟富裕，二來也希望學術被夠像經濟一樣被計畫著。多數都是由上而下的採取資源分配與學術獎勵的方式。

從民國八〇年後，由「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所推行的一連串大學自主活動開始，解嚴後的大學方向一方面開始解脫完全的國家依賴，要求校長遴選、教授治校、學生參與校務會議等等；另一方面大學卻開始市場化，入學多元、國立大學的國家補助漸漸退場、產業成功人士取代政治菁英進入大學授課、學術成就的指標索引評估等，都是這種轉型。Bill Reading<sup>17</sup>將這種大學的轉型稱之為由「問責」(accountable)轉向問責力的(accountability)的變型。過去「問責的」學術場域評價方式強調大學內部必須不斷的交相責問以處理爭議和分配，而問責力的概念就是以一套固定式的標準，所有的爭議和分配問題都不需要經過溝通和理解，只需要拿出成績來比分數就行了。前者強調的是一種相互說明和討論的責任，大學教員在面臨爭議時基於對自己所屬學科的訓練和來自其他不同學科的意見交相問責；後者則是一種以管理者的姿態，要求所屬機關對績效負責的態度，它強調如何快速處理爭議與理解的績效，最快的方式就是研究一套精確量化的評估標準，使得爭議不再出現。大學從問責轉向問責力，方便了學術社群和外界的溝通，卻也約減了學術交流的內涵，將大學教員當成國家學術公司生產力的負責人。問責性通常交由數量化的評估標準來處理學術產品的內涵問題，而把學術產品的內涵和意義約減成學術成就上的分數，向外界「溝通」，讓學術產品的內容以行銷力的概念來評估。台灣學術界領域的「負責」態度是國家退去學院的主導角色後，改由市場型的監督來負責，透過數量化的方式向外界「說明<sup>18</sup>」和交代。對Bill Reading來說，當大學轉向問責性的績效評估後，大學將成爲一個專業化的生產知識集團，讓知識有效的爲交代和解釋的對象服務，大學將完全失去自主性。

在台灣學術發展，似乎和台灣的國際地位十分相牽，而且是鑲嵌在國際發

---

<sup>16</sup>自光復後，台灣的教育制度幾乎全是經濟考量下的產物。不僅是內容上完全不想要開啓民智，而且執行者、計劃者也完全是財經專業官僚。

<sup>17</sup> 參見Bill Reading, 1997,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p26。

<sup>18</sup> 數量化的「說明」方式完全不涉及學術產品內容的意義和內涵。而是增加外部對學院評估的依據。通常這種說明，表現在排名、設備、大師、國際化等等與學術內容完全無關的指標上。

聲位置弱勢的情境中。由於學術系統不發達，多數社會對學術的期待強烈的左右了台灣的學術走向，而這些期待總是因為希望台灣能夠在國際上各個領域揚眉吐氣，不管是最明顯而務實的國民生產毛額，還是長期的教育水平和公民素養，國家和社會都加諸很大的責任和使命感在這些留學於先進國家多年，曾經看過洞穴外的世界、看過眼界的人們，能夠幫助他們走向進步（無論是民主的、科學的、經濟的、政治上的進步）。這種期待，使得台灣學術強烈的走向「應用」，這不單是工學界為高科技研發，商學界為金融商品研究市場情形；生命科學、醫學界為生技製藥解開技術和實驗的人力的問題，還包含了社會科學為政府推動（形式）民主化，或是人文學科能不能幫助文化產業發展。學術上的「應用」成為最高的期待，這種期待反饋成爲一種學術態度，而這種學術態度不僅影響了學者在學術上知識生產的走向，也影響了學者在社會實踐上投入的時間。

從李國鼎主導經建計畫，到學術評鑑的大爭議，學術問題從毫無疑點地必須從成爲一個爲國家培養產業人才的教育問題<sup>19</sup>，服務於經濟和產業應用科技的發展。這個部分可以看到後進國對先進國家的學術必然要保持一種類似Bourdieu在*Distinction*中所描述的文化善意（cultural goodwill, Bourdieu 1994），不斷地吸收和引進先進國家早已合法化到有點陳腐的知識，並且對它們表達出無與倫比的耐心、尊敬和自卑，這是一種貪慾和焦慮所混合的產物。就像小資產階級把輕歌劇當成嚴肅的音樂，並且積極地去參與一樣，使後進國把大學錄取率的提升當成公民智能的提升，並積極投入高等教育民主化的路線，把原本在西方只是當作資料索引（citation index）的資料庫名目，當成學術國際化的標準，同時把學術的英文發表當成與世界接軌的唯一方式。也就是說，文化善意是一種把接受度（acceptability）當成「近用度」（accessibility）的誤用<sup>20</sup>。會導致誤用的原因在於後進國的學術場域是依據「國家的用途」而建立的，也因此，在缺乏文化的指導下，後進國家只能夠模仿最「可近用」（accessible）版本的知識<sup>21</sup>，這種「模仿式的消費」（consumption of imitation）沒有文化隔閡與門檻，而且後進國會相信這些形式主義的學習能創造出和先進國相同學術成就。這些都是後進國家所必然面臨的處境，也是後進國家的學術自主化過程中必然面對的難局<sup>22</sup>。本文將在第三章以台灣爲例說明台灣在分析學術發展時獨特的後進國風貌。

#### 第四節：研究與實驗設計

本文最重要的意圖是回答「學術場域和外部社會的關係是什麼？」因為學術

---

<sup>19</sup> 或者，如受訪者A7指出：「台灣一直到他們這一代，才有所謂的學術問題。」

<sup>20</sup> 例如，以爲廣泛接受了英文，就可以廣泛近用與接取英文的資產。

<sup>21</sup> 也就是最具有立即可接近的，或是一種具有明顯的文化合法性標誌的東西，是最容易被持有文化善意的後進國家所接受的學術思想。

<sup>22</sup> 這並不能保證保證學術自主化的實現，但又不得不做，因為沒有文化背景下的學術發展勢必透過這種形式模仿來學習。

是現代生產知識重要的一種方式，而知識又是人類精神文化的高度表現，無可避免的，學術必定是一種文化問題。因此，斷不能將學術問題化約成經濟問題下的反映。

既然是文化問題，儘管受大環境所影響，也不能用「決定論」的模式來解釋文化問題，若不把文化的意義說明，恐怕無能學術的文化邏輯。爲了不落入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困境，必需要同時了解台灣影響學術發展的脈絡或學者與生俱來的家庭教養<sup>23</sup>，和每個學者從事學術的態度之間的關係；要同時了解台灣學術發展的鉅觀結構和學者的家庭教養到底給每一位學者多少的選擇？這些選擇的吸引力和抵抗力是平均的嗎？若不是，那是什麼樣家庭背景的學者選擇什麼類的學術態度會得到比較大的阻抗，選擇哪一類的學術態度會得到比較大的吸引力。本研究不認爲這些看似「個性使然」的學術生涯選擇是天生的（given），文化階級的作用勢必明顯的看出它刻寫在學者身上的痕跡。

朱元鴻在（這雙腳所經驗的階層：審美語言分析）分析了審美判斷的語言如何隨著社會的不同階層而分化，對不同的階層而言，審美語言是不同文化資本<sup>24</sup>的階層所面對生活的具體表現。如Bourdieu在*Distinction*中，分別以必要性（necessity）、文化善意（cultural goodwill）和文化貴族（the aristocracy of culture）來描述審美判斷在不同文化階層中扮演的意義。如前面所提，知識和藝術同是人類精神文化的高度表現，文化教養不只會對審美判斷產生影響，也會對學術態度產生影響。不同的學術態度是否再現了不同文化階層的學者對生活的想像，是本文從中得到的啓發。

但必需斟酌的一點的，是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概念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描述，而是在一個看似無法以金錢衡量的場域中，具有拒斥金融經濟資本邏輯的力量，而且衍生出一條獨特的、這個場域所慣用的、通行的資本累積方式。也就是說，文化資本必然要有相應的文化資本場域作爲文化資本交易兌現的市場才能產生。因此無可避免的，文化資本的概念絕不僅止於這個特定資本的特性，還必需要能夠描述或說明這種看似無法被化約成爲可視的、可計量的利益，是如何透過這個特殊場域的生成法則（場域的煉金術）兌現爲特定的文化聲望或是文化地位。但就本研究的分類對象而言，（學術）文化資本的兌現和需要長時間追縱學者的社會實踐和學術實踐，也要能清楚的掌握不同領域中最傑出學者兌現文化資

---

<sup>23</sup> 當然，家庭教養和社會脈絡之間的關係又是一個問題了。本文爲求問題明確，不擬對這個問題著墨過深。

<sup>24</sup> 這裡必需要說明，由於Bourdieu的文化資本概念不只涉及家庭教養所傳承的文化習性，也包含了學歷證照，或是文化產品這些有形的東西，而本文只涵蓋前者；加上Bourdieu的文化資本概念，涉及到資本的兌現方式和路徑，這個部分需要更大規模的研究範圍，對那些分析中的學者類型，他們在學術界中的表現和成就（教授職、傑出學術獎項、院士資格），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實現／兌現」的，這個部分研究也未能呈現。因此爲了避免帶來概念上的模糊不清，研究中一律以教養過程（cultivation）這樣非經濟學式的字眼，來描述不同學者的家庭對他們的期待，是如何影響到他們學術態度上的表現。

本的期刊、研討會、學術獎項、就職單位的差異、甚至是成爲院士的過程。這條完全的 Bourdieuan 文化資本再生產過程需要更深刻的追縱和掌握，但本文的問題意識僅止於透過台灣的特殊時空背景回應康德的教員鬥爭概念，因此對於文化資本概念的應用勢必要割捨兌現的精悉部分，留待後續更豐富的研究。所以爲了用詞的精準度，只得割捨文化資本的概念後半部兌現過程，保留前半部「文化教養」的過程來分析本文主要的問題意識。

研究的方式是進行訪談，總共訪談二十九位學者，平均分配在理、工、生／醫、商、社、文等六個領域上。會這樣的分配是因過去區分學科劃分，如教育部或國科會的劃分都把理工分在一起，商社文法分在一起，這完全是依照這些學科在知識上的普遍化和特殊化與否決定的，這條古老的知識類型區分並不適合拿來分析學術的社會學問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學科明顯是「兩種文化」可是卻可以被輕鬆跨越，例如訪談中許多工學院、醫學院教授都表達他們日常喜愛閱讀的書籍有不少是財經管理，但是自然科學學者則有不少讀過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的著作，甚至有不少把康德和法蘭克福學派對啓蒙和大眾文化的著作看完的，這很明顯的，知識內容的區分方式並不明顯，也看不出其社會學意義。因此我擴增爲六個領域，其中一種分法是傳統知識論對律則性知識（nomological knowledge）和個殊性知識（idiosyncratic knowledge）的區分；但是這六個領域還隱含了「有用的」和「不知道作什麼用」的區分（理、文 VS 工、生醫、社、商），同時放入實驗，看看是否能創造出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新學術區分架構。

訪談的選擇並不是隨機的，但會儘量在每個類別中尋求年資的平衡。唯一的一個訪談中無意圖的限制，是受訪對象全是北部（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學者，沒有中南部的學者。這主要是因爲經費不足，無法負擔中南部以上的車資和旅費。

訪談的問題分成三個部分：

- 一、學者的個人與家庭背景。這個部分的問題主要在得知學者過去家庭的教養過程。文化教養的傳承是如何進行的？嚴格的紀律，還是開明的管教？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家庭的教養方式（如誰決定填選志願？）之間的關係如何？大學的填選科系和出國留學的決定背後的理由是什麼？是個人事業考量、對於某種價值理想的冀求，還是純粹對一門學術從小就有興趣？
- 二、學者的學術態度。這個部分的問題在於區分學者投入學術時，他的對學術工作的定位是什麼？我們以三個問題來測試：一個是學術行政工作的好惡，這是用來區分學者對行政體系實際貢獻的個人意見和經驗，行政工作沒有任何的學術意義，不需要學者的學術能力，而是需要學者的人際關係和社交手腕，以及他對行政事務的耐心；第二是學者的非學術性

社會參與，他參與的社會活動或團體是什麼類型的，他為誰而寫作，發表公開言論？是上層經濟、政治菁英的社交圈，還是為下層民眾蒙受的不公不義而發聲的社運團體，還是什麼都不想參與？第三個問題是他對學術的社會角色定位在哪？他希望學術能提升人民物質生活水平，還是引導社會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或只是為自己的學術問題而寫作，不在乎外界對學術的看法？這個部分的問題將和第一類型的訪談問題結合，以處理本文的一個重要問題意識：「什麼因素決定了什麼樣的人參與什麼樣的學術工作？」

三、學者的社會位置。這個部分的問題在於區分出學者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是處於靠近社會的，還是疏離的。如同我們在前面問題意識中提到的：「學術場域不能憑空存在，它必須要給外部環境一個存在的交代，讓外部環境知道它的存在並不是沒有作用的。」那麼勢必有一群學者，他的文化氣質會親近於一般社會大眾的需求，所以他的價值判斷也會親近於一般社會大眾，以便在精神上同意社會大眾的需求，為他們服務。因此這個部分，我以一般時事上的價值爭議來測驗。我選擇指紋資料庫和全島毫無死角的監視器這兩個廣受爭議，但民調支持度相當高的社會價值爭議事件<sup>25</sup>，來測驗學者在學術場域占據的位置是（在文化氣質上）親近於外部社會，還是疏遠的？如Bourdieu在*Distinction*的後記“Toward a ‘Vulgar Critique of Pure’ Critiques”<sup>26</sup>提到一種「否定測量」。這原本是取自康德*Essay on Negative Magnitudes*中，討論如何測量「善」的大小，康德認為：「要透過克服惡的大小來測量善，要透過衝動的否定強度和粗魯的拒絕強度來測量純粹品味。」同樣的，我們也以一般社會所接受、關心的議題方式來對學者們做否定測量，這個測量的目的在於透過學者們對社會化的、大眾化的、一般生活需求中粗魯（vulgar）認知的否定程度來得知學者的價值判斷離異（alienate）社會的程度。我們才能為不同的學者標定位置。

訪談的設計並不是意圖一個問卷調查的結果。在社會研究下的量化問卷調查中，所有受到社會理論啟發的意義全部會轉化成統計變項，然後依照對變項的數學意義決定出計算變項和變項之間適當的統計推論方式。所以會有樣本大小、抽樣方式的不同和效度的問題。在研究中試圖建立的關聯—家庭文化教養和學術態度—關係如果以統計上的變項相關性（correlation）呈現時（如家庭教養程度和

---

<sup>25</sup> 在指紋資料庫上，根據TVBS民調中心在民國91年8月8日及9日，以電腦隨機抽樣1218位全省20歲以上之民眾中，有七成（71%）民眾贊成政府基於安全考量將全民指紋建檔。同樣在TVBS於民國94年5月的民調中，也有七成四的民眾贊成換發新身份證時按捺指紋。在監視器議題上，在《中國時報》〈議員民調 市政 民眾最關心治安-最恨住宅竊案 近九成認應建置全市錄影監視系統〉，2001年6月2日第18版中也指出，監視器是一般市民高度期望的政策之一。這些俗民的要求，將被本研究放在「粗」的一端，以測量學者對粗魯的拒斥程度。

<sup>26</sup> 參見Bourdieu, *Distinction*, p490。

學術態度之間的相關性)，則會遭遇到一個困難：研究者必需以有限的項目來定義出家庭教養高低的判準和學術態度的範圍，然則有限的項目則預先框限了項目可能表達的意義。例如本文訪談中一位被分類為「知識貴族型」（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術態度）的學者，其父親只是一位高中教師，以變項的方式來處理這位學者的父親對他的教養影響（如父親的職業、教育程度），可能會忽略或無法衡量這位父親在文化創作上的傑出表現（佛教界三十餘本的著作）是無法以任何形式上的證書或資格（如學歷證書、職業項目）來代表，而使得這位父親和這位學者的學術態度之間例子成爲一個例外或是「離散」。但如果透過訪談，研究者可以透過受訪者的回憶，清楚的知道父親在文化上無法被形式化約的表現對受訪者童、幼年的影響過程。於是，這位學者不再是例外，而是一個很好理論的經驗說明。

訪談的目的也不在於探求受訪者對訪談問題的心中答案，否則訪談很可能因爲無能察覺和確定受訪者是否誠實的情形下宣告失效。對以訪談來進行的研究來說，受訪者的心理（psyche）內部是無法考量的，訪談者沒有任何的辦法來辨別他從受訪者口中得到的答案是不是受訪者心中對這個問題的原始答案，還是爲了某種立場或位置所強加的妝飾。對本研究來說，學者在外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和論述力來源才是考量的重點，而這個問題早已是社會條件所構作過的結果。也就是說，如果匿名的受訪者連對學術資歷較爲低階的訪談者都無法說出「心裡的真話」，那麼他在外部社會更嚴格、正式、必須爲論述負責的；必須考量社會效應和場域作用的論述機會中當然也更不可能說出來，那麼他純粹心裡的真話將不會有任何的社會效果，也不是本研究企圖透過訪談所得知的資訊。本研究的意圖不在於受訪者心中的真話，而是早已認定了受訪者對外部的發言和論述資格／效果乃是發自於他所屬的社會位置，他的論述早已是社會提煉後的效果。

爲了避免受訪者的困難，訪談的學者一律匿名、匿工作單位來呈現。在引述受訪者的話時，會先取得受訪者再次的確認和修飾，而後才會全文摘錄。

## 第二章

### 學術空間：康德「系所鬥爭說」的探討

康德的系所鬥爭模型是本研究理論架構的一個重要來源，比較洪堡德（Humboldt）所提倡的為教養（*Bildung*）人性的大學和拿破崙式為提供國家實力和物質富裕的工藝學校，康德式的大學較為貼近現代大學的情形。因此本章將著重在討論康德的概念劃分和理論架構的問題。

#### 第一節 康德的想像

##### 一、為何而寫？

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於 1788 任命 Woellner，取代了原來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書序中獻題的 Baron von Zedlitz，成為新任法務部長和國家教堂與學校部門長官。他一上任即頒佈禁止任何對聖職教義批判的新審查制度，如此一來，康德之類的啓蒙哲學家（so-called enlighteners）將不能在著作中處理任何的宗教、道德、甚至是善的問題。這明顯就是針對剛於 1788 年寫作的《實踐理性批判》而來，其後果就是 Woellner 明確的向康德出生地科尼斯堡城（Koenigsberg）的學術評議會下命令，禁止所有的教授講授康德的宗教哲學。

隨後，康德在《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mere Reason*）序言中提到哲學神學家的責任，是執行一項實驗，看看神的天啓（divine revelation）是不是最後會和宗教的純粹理性系統十分類似，如果是，那麼理性和聖經就不再是矛盾的。而康德認為，這項實驗是成功的，因此他希望能出版書籍告訴腓特烈威廉二世，和其他在審查委員會中的神學家們這個令人興奮的消息。1791 年，康德把《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手稿寄給《柏林人月刊》（*Berliner Monatsschrift*）編輯 Biester，計畫分成連續四期出版。第一期得到了同意，但是第二期卻被審查委員認為侵犯了聖經神學的領域，拒絕出版。康德得知後，要求 Biester 退回他的稿子，因為他有別的計畫。為了要滿足司法的要求，康德打算把手稿寄給國內大學（特別是科尼斯堡城）的神學教授們，目的不是為了審查的問題，而是為了討論這本書到底是侵犯了聖經神學的領域，還是屬於哲學領域<sup>27</sup>。

最後康德寄給耶那大學（University of Jena）的哲學教員們審查，並且得到了通過，並且出版。這使得耶那大學的神學教員們十分的不滿，和康德引起了論戰。而這本書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得到哥廷根一個神學期刊的編輯 Staudlin

<sup>27</sup> 康德寫作 *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 的始末，可參見由英譯本譯者 Mary J. Gregor 所寫的導讀。in Kant, 1992, *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 p. vii-xxix。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原本意圖向腓特烈威廉二世爭取言論自由的態度，在後來投稿到耶那大學和神學教員論辯後，已轉成學術自由。

的重視，在保證完全無限制的出版自由，康德答應了。於 1797 年，威廉三世繼位，解除了之前威廉二世不准討論宗教教義與事務的禁令，康德的 *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 才得以出版。

## 二、康德的系所鬥爭隱喻

曾經因為觸怒神學家和國王而受到出版和教學限制的康德，在最後出版著作 *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 中，想要解決一個問題：一個社會為何要支持一個沒有任何實用性，純粹只是從事知識思辯的社群，而又不會害怕這個社群墮入無政府主義<sup>28</sup>？或者直接這麼問好了：如何讓一間大學擁有自主性，又不會完全的落入無政府主義，以接受社會的資源挹注？

要解決這個問題，康德設想一個大學，將系所學科區分成兩種，一種是專門教導訓練政府所需要的人力，也就是康德所謂的服從於功利（utility）「實業家」（businessman of high faculties<sup>29</sup>）的高等系所（high faculty）；另一種則是完全（只）服從於理性（reason）的基礎系所（low faculty）。康德稱高等系所為大學議會中的右派，而基礎系所則是左派，為權力服務的右派們，其教學和研究只能依據政府的需要，將他們的知識傳授給實業家，所以它們無法也無力反駁政府的觀點；而左派會透過訴諸理性和高教員展開論辯。一旦高教員在知識社群中受到理性左派的反擊（因為只有學者才能對學術問題展開質疑和判斷），那麼他就必須不斷地修正他的知識內容，同時也不斷地改變他傳授給高教員實業家的技能，從而也幫助政府，阻止行政官僚了腐敗的機會。

康德的學術社群模型主要是建構在現代大學的社會角色雛形上。他認為大學一定要面對是否能被外界合理化的正當性問題，但是這個問題並不能直接訴求外部社會，而是必須以大學內部的議會和政黨對立的方式運作，因此必須要在大學系所中區分出高等／基礎系所來，一方面讓大學能夠提供政府所需要面對的務實性問題，另一方面也讓大學能夠保存不為任何目的，只為理性本身的理性基礎。如此一來，康德即認為，大學是生產知識的機構，而理性則是這個機構能有別於其他社會機構的核心元素。

但，康德並非天真的以為理性作為仲裁一切知識生產的標準，並不需要任何的制度。因此必須要設定鬥爭的方式，讓學院之間的鬥爭不會像社會階級的戰爭一樣的血腥和暴力，不會充滿詐術、利益關係和政治陰謀，因為一旦如此，將是把鬥爭的武器交付在個人或團體存在的毀滅上，戰爭的手段也無法使學院的知識

---

<sup>28</sup> 結合第一段陳述康德寫作本書的經過，可以知道康德過去曾經深深的受到「非法鬥爭」的困擾。

<sup>29</sup> 即 *intelligentsia*，也就是「大學畢業生」。他們是政府治國的工具，他們關心的事務並不是知識的增長，而是人民的福祉。但，他們並不是「自由地」將他們的學識運用到公共使用上，而是必須臣服於教員的審查之下；因為政府必須要依賴他們行使法制的力量（*juridical power*），而這種依賴沒有制衡的話，將會是絕對的腐敗。

有所進步，反而是毀滅了學院的知識。要將社會利益的全面戰爭縮減成學院內部的知識鬥爭，必須要約限學者們將鬥爭的武器給象徵化，也就是學術化。前者，血淋淋的戰爭，訴諸社會資源、人際關係、社交禮儀、法庭審判、甚至武力相抗的方式，皆為康德所言的「非法鬥爭」<sup>30</sup> (illegal conflict)，這種鬥爭在內容上之所以不容許對公共命題展開辯論，是因為它不容許「公開地」(publicly) 對此命題和其對立面有所「判斷」(judge)，因而是內容的；這種鬥爭在形式上，是因為辯論的進行中，並不依賴雙方理據的客觀基礎，而是依賴試圖透過其中一方的主觀「愛好」(inclination) 來行使他們的判斷，並透過欺騙(行賄)和豪奪(威脅)來獲得對方的同意(Kant 1992)。

康德認為，人民想要被領導，也所以容易被欺騙(以煽動家的言論來說)。但是他們並不要被基礎系所所領導，因為他們的智慧對人民來說太高深了，他們只想要被高等系所的實業家(高等系所的畢業生們，也就是官僚人員)所領導。這些官僚實業家有良好的本領(savoir-faire)指導人民生活知識的一切，也因此獲得人們的信心，而政府也唯有依賴他們行使法令的力量才能治理國家，所以使得國家以一種由實業家對人民影響力的計算，而不是以純粹學術的洞察(insight)來干涉學者(Kant 1992)。人們只想要最小的自我職權行使(self-exertion)和最小的自我理性使用(use of their own reason)，就能夠為他們的愛好成就最大功效；就神學來說，人民只能透過信仰來獲得救贖，而不必去檢視他們所信仰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就法學來說，人民只能服從法律的條文，而不想要檢視立法者的意圖；就醫學來說，人民只能遵照醫師的囑咐，而不會想要去檢視醫師所決定處方和器材的來源。人們說：

我想要你做的，是作為一個有學問的人來告訴我這些事：假如我一輩子都是無賴，我要如何才能買到天堂的門票？假如我犯法，我要如何才能勝訴？假如我縱慾浪蕩而傷害了我的身體，我要如何才能保持健康長命百歲？想必這才是你為何研究的原因吧！所以你會知道的比我們這類的人(你稱我們為俗眾)還多<sup>31</sup>。

人們並不要知道基礎系所的思想細緻性(subtlety)，所有基礎系所說的一切都是他們不想也不願知道的大道理，人們只重視知識的功利效果，而不是知識的理性效果，因此人們特別容易把這些具有「本領」的實業家們當成了占卜者和魔法師，一個未來命運的展示者，認為他們具有超自然的知識，所以一旦高教員的實業家們把自己當成了「奇蹟製造者」(miracle-worker)，人民就會群聚在他們身邊，擁戴他們，而且將哲學類系所<sup>32</sup>拋棄在一旁。因此，高等系所的實業家

<sup>30</sup> 康德認為，造成這些非法鬥爭除了政府的自我毀滅外，也包含了學者的自我欺騙。教學的批判不能交由友善的求和，與法院的訴訟來「平息」(settled)，除非哲學教員自己隱瞞了糾紛的原因，讓自己被「說服」。然而這又直接違背了具有揭露真理的哲學教員精神。

<sup>31</sup> 參見Kant, 1992,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p. 49。中文為筆者自譯。

<sup>32</sup> 康德所謂的哲學教員並不是單指主修哲學的學者，而是那些將學術關注焦點放在純粹理性增

必定是這樣的奇蹟製造者，除非哲學類系所被容許公開地以理性批判「抵消」<sup>33</sup>（counteract）他們的魔力效果；如果只是被動地擁戴他們的「技術性指導」（skillful guide），人們將會無法從事任何他們真正所擁有的活動，而是以悠閒和舒適的方式，被導向完成他們所欲想的目的（Kant 1992）。如果高等系所也支持這樣的活動，那麼也將會永遠地與基礎系所鬥爭，因為高等系所設定政府所實用的準則並不是依據任何私人的目的，法學家不能依據任何個人的喜好而製定法理，而神學家也不能依據任何私人的目的來詮釋聖經；高教員如果這麼作，將會把大學教員之間的鬥爭交付給社會力量的全面對抗來仲裁，其結果就是哲學系所的教員們全面消失，學術議會的兩黨制宣告破敗，高等系所也將和外部社會機構沒有任何不同，因為它不需要受到理性的監督，結果就是大學體制的消失；這是最快終結鬥爭的方式，也同時是一種危及學術系統生命的嘩眾工具（a heroic means）<sup>34</sup>。

而合法鬥爭（legal conflict）方面，康德認為任何由高等系所所給予政府向公眾說明的教學（teaching）都不會是絕對正確的（infallible）。所以政府絕不能對理性毫不關心，在這一點，政府仍然要臣服於理性<sup>35</sup>之下，要彰顯這種理性，就必須容許公開檢視這些教學的自由，如此一來，由優勢權威所批准的武斷命題就不會與將理性視為必要的教學一致了。所以這就產生了高等／基礎系所之間，既無可避免地，又是合法的鬥爭。而哲學教員，不只是有資格（entitled），同時也有義務的（obligated）以「批判的慎察」（critical scrupulosity）研究和說明所有被權威所加持，也被人們視為神聖般擁戴的學說<sup>36</sup>。

### 三、康德系所鬥爭說的問題

康德對於大學系所間的鬥爭模型比起史諾的兩種文化要來得具有一定的理論體系化，主要原因在於史諾沒有提到知識的不同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哪；但是康德這一點談得很清楚。高等／基礎系所的社會角色之間的差異在於前者追求功利，後者追求真理；雖然功利能夠像財富一樣提升整個國家的競爭力，保障了一般人的需求，但是功利也像財富一樣，需要依賴真理所追求的自由作為先決條件才得以保障。因此，康德強調基礎系所所擁有的理性是大學重要核心的

---

長上的人；包含了哲學家、史學家、人文學者、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和形上學者。

<sup>33</sup> 中和，並不是去「推翻」（overthrow）他們的教學，而是去「否定」公眾迷信般地将這些教學和儀式歸功於他們的一種魔力。（Kant 1992）

<sup>34</sup> *Ibid*，康德強調heroic means指的是一種醫學名詞（in medical terms）。醫學上，如英雄式的手術（heroic surgery）指的是不合乎醫學上對手術的要求，必須維繫整體生命體在事後運作的完整性，而只是炫耀自己的技術，看似華麗，但卻實際上大而不當、嘩眾取寵，而危及生命安全的手術。康德以此隱喻高等系所挾外部社會的需求光環來迫使基礎系所全面消失，也是看似華麗，但實則危害自己的動作，因為基礎系所一消失，高等系所也不再成為大學中的系所。

<sup>35</sup> 理性，在康德的教員鬥爭模型當中，是哲學教員所捍衛的利益之所在。

<sup>36</sup> 康德認為，任何被視為法則般的教學都是一種美感的（aesthetic），一種基於超自然影響力的篤信感覺（pious feeling）。而感覺不會產生客觀的原則，它只能在主觀層次上合理，無法為普遍法則提供基礎。因此官僚的務實性所吸引大眾的魅力是基於特定團體的私人目的，是服務局部性、暫時性的利益。

元素，雖然他並不認為大學能完全免於權力的腐化，但他認為只要大學的核心理性不是由權力而來的，大學內部的理性精神自然就會引導基礎系所對權力的不滿，而以公開<sup>37</sup>的方式對高等系所提出批評，這樣一來，為政府背書的高等系所會審慎地反省他的教學內容，影響後來的官僚實業家，而且大學內部的鬥爭也不會直接引起社會和政治的動盪，更不會引起全面的社會大對抗（Kant 1992），所以兩種系所學科之間的鬥爭不會變成戰爭，因為他們就像兩黨政治一樣，都是為了一致的共同目的，任何准許給高等系所的權利其實都也一定容許基礎系所能夠在有學養的公眾的前面，就先提出他們（基礎系所）對這個（高等系所）的權利疑慮，以阻止政府中有太多奇蹟製造者而形成的腐敗，使人民不滿，終究造成暴動。這不僅僅是一個大學模型的理論建立，也是具有歷史動力的進步計劃（Reading 1997）。它讓大學的自主性，建立在透過自我批評而得到的理性自主，得以在社會中扮演一個吃重的角色，以禁止任何直接社會和國家對大學知識研究與教學的直接干預。

康德式大學的社會任務存在著一個弔詭。大學的任務之一是為國家生產官僚，也就是「事務之人」（men of affair），同樣的，這些官僚最後一定會運用大學教給他們的本領（savoir-faire），服從國家，而把權力行使在大學上，最後行使權力到哲學類系所（基礎系所）上。一方面，國家又必須為了保護理性在公共生活中的統治而保護大學；另一方面，哲學又必須要保護理性，免於國家權力的濫用，而限制高等系所依照官方利益的統治。在這裡，康德所說的理性似乎同時脆弱到需要完整制度的保護，又強壯到任何制度的權力都能瓦解的雙重性（ambivalence）。但是，因大學的制度化而誕生的理性如何就一定是基於理性的尊重，而不是迷信的目標？Bill Reading 在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中討論到，當康德在書中開頭提及普魯士人民接受了這種機構時，他認為這是「純粹偶然」（purely by chance）的。根本上，康德建立了一個生產理性的制度，可是當理性運作時，可以把大學的存在制度當成虛設，毫不在意理性是否危害了大學的存在，這使得大學的理性知識和大學的法政制度變成了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惡性循環的問題，因為康德讓大學成為生產理性的制度，又讓理性成為大學的核心。

德希達在 *Mochlos*<sup>38</sup> 中也提出了對康德的質疑：「這個法理型（juridico-rational）的大學系統，其正當性是什麼？」（Derrida 1992）康德意圖以邏輯分工和民主議會的方式讓大學區分成左派和右派，卻讓大學機構形成的基礎訴諸交付給完全的民主制衡設計。德希達認為，法律為什麼擁有權力的問題，或是法律的正當性基礎問題本身不是一個法律或司法問題；哲學制度的基礎也不會是一個哲學問題。因此，大學正當性基礎的問題不可能憑空出現，也不會是一個純粹理性或是民主制衡的問題，它是一個無法與傳統斷裂的歷史事件。德希達接著說，只有在法律

<sup>37</sup> 指公開辯論、出版、投書等活動。

<sup>38</sup> 參見 Richard Rand ed., *Logomachia: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pp.29。Logomachia 意指「口水戰」。

存在的時代才有「合法鬥爭」或「非法鬥爭」的問題，康德也才能將學院鬥爭與戰爭區分開來（Derrida 1992）。這意謂著大學作為保障理性的制度，它的發生位階至少必須高於（學術）理性才有可能。

德希達以古希臘字 *Mochlos* 作為解釋「基礎」的來源。*Mochlos* 意指槓桿作用時，以下壓的力道撬起東西來所需要的支點，這意謂著不管是左腳（左派）較有力還是右腳（右派）較有力，都需要找尋一個牢靠的地面，一躍而起，降落到另一塊地面。大學要能夠進行對高教員的理性批判，難道不需要找到它的 *mochlos*，就能夠有十足的正當性對高教員進行批判嗎？大學的著力點 (*Mochlos*) 為何？是什麼讓大學擁有如此的特權，（暫時性的）悠遊於政治或市場之外？

德希達的提醒使得康德的「兩種系所的合法鬥爭說」必須回到一個相對的立場上，以同樣找尋高等系所權力基礎（國家）的好奇心，去追尋基礎系所的權力基礎為何？

## 第二節 構成學術「合法鬥爭」與「相對獨立性」的正當性基礎

帶入康德的論點，並不意圖為大學的立基點找尋一個更原始或更正確的觀點，德希達的討論早已分析了康德對大學基於理性的寄望所存在的弔詭，正如德希達引述 Friedrich Schelling 所言：「某物之為萬物，絕非任何特定之一物<sup>39</sup>。」（Derrida 1992）理性既然是知識發展的核心，就不可能為基礎系所所壟斷地擁有，不能也不可能讓理性（哲學）成為一門學科，也不可能只有在基礎系所與高等系所發生合法鬥爭時，才會展現的神秘能力，更不可能基礎系所的「理性」天生就擁有合法批判（*legal critique*）的正當性（*legitimacy*）：難道說，基礎系所能夠秉持著理性的原則，不受任何利益的影響，只是因為基礎系所的教員們道德情操較為高尚？因此，決不能假設康德式的純粹理性為先驗的存在，而是必須讓「理性」成為一個動態形塑過程，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找出「理性」如何獲得「正當性」才能同時在理性的內部解釋和外部解釋之間，找出一條拒絕二選一的路線。

對 Bourdieu 來說，以科學為例，科學的學術場域要建立，不能只依賴經濟、社會、政治條件，因為這會將學術視為完全受功利性決定的社會產物，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將無法理晰出學術事業不同於其他營利事業的差異；同樣的，也不可以將學術場域的獨立性，以英雄聖徒傳的方式，建立在少數英雄式科學家的理論奧秘上，也會將科學誤判為一種純粹的冥思。為了要融合外部分分析和內部分分析之間，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的無限爭執，必須要同時考量二者。所以，科學社群的獨立性是建立在外部經濟、社會、政治條件所構成的「社會權威」和由內部科學社群的同儕所認可的「嚴肅科學權威」，兩者之間的不斷鬥爭。一

---

<sup>39</sup> Something which is everything cannot... . . . , be anything in particular., quoted by Derrida, in *Mochlos*, p.26.

個科學社群的獨立性必須由外部條件賦予其正當性 (legitimacy)，以避免科學問題被政治化，又同時讓內部的科學家們依據內部的學術慣例提出質疑時，不會被視為一個政治反叛受到打壓 (非法鬥爭)，而是被視為一個合法 (legal) 的科學提問。簡言之，學術社群的獨立必須有：1、外部條件為社群提供的正當性 (legitimacy)；2、內部條件為社群提供的合法性 (legality)。

結合康德和Bourdieu的場域生成說，高等系所和基礎系所之間恰恰扮演不同的角色：高等系所是一群盜取 (知識) 天火的普羅米修斯，因為他們要讓國家和社會贊同他們的特殊存在，同意他們的特殊作為，所以高等系所必須具備良好的社交能力和行政能力，不斷地去處理世俗性的工具性效用問題，同時他們也必須擔負起國家和社會期待他們生產出來「事務之人」的技術水準，當這些高教員所教導出來的官僚們愈是具有能力為人民解決實際的問題時，官僚們的魔力效應 (miracle-effects) 就愈高，而高等系所為這個社群所爭取的存在正當性就愈高 (所以他們通常關心大學競爭力問題、排名問題)；相對於高等系所，基礎系所則是一群站在高等系所提供的合法基礎上沉思者，他們早已享有高等系所為他們打下的社會正當性基礎<sup>40</sup>，所以能夠非常純淨地思索學術問題，也因為他們的「純淨」非工具性，使得基礎系所能夠不去理會「如何獲得門外漢支持」的問題，以理性 (學術特有的分析方式) 對掌有權力的高等系所進行批判 (所以他們通常厭惡被排名、量化、評估和管理等需要向外界交代的方式)。其主要原因在於高等系所和基礎系所兩個群體的學術位置是不同的：高等系所的位置所賦予他們的任務在於建立制度的正當性，因此他們必須將學術中所追求的「終極真理」，選擇性地翻譯成外部國家和社會所重視的需求，就如同康德所舉的例子中，聖經神學家 (高等系所) 和哲學家 (基礎系所) 的鬥爭並不在於有神無神的爭論，而是在於聖經神學家 (biblical theologians) 容易視聖經文本為追求上帝啓示的唯一方法，而基礎系所 (哲學家) 則會反駁聖經神學家混淆了手段 (聖經詮釋技術) 和目的 (上帝的啓示)；同樣的高等系所也習於制定學術上的標準就是追求卓越 (excellence) 的標準；而基礎系所則會批判卓越計畫和學術真理上的混淆。

如此一來，也回應了德希達對康德的問題：「合法鬥爭的基礎是什麼？」正如同沒有社會對倫理和法律的定義存在 (正當性問題)，即沒有犯罪和守法的行為區分 (合法性問題) 一樣，學術場域的相對自主性並不是一種完完全全獨立於社會、經濟、政治條件的象牙塔；但是只有這些外部條件還不夠，科學場域還需要另一條軸線來構成一個完整的平面，以區別學術實踐和其他社會實踐的

---

<sup>40</sup> 這裡使用「正當性」與「合法性」，是為了解決學術的相對自主性問題，一部分依賴外部社會的教員透過製造外部的需求而建立正當性 (因為正當性只有社會能賦予)，另一部分獨立以理性思考的教員建立學術場域自己的規則，稱之為合法性。因此康德稱高教員挾外部需求以令學術社群的動作為「非法 (不合法) 鬥爭」，但實則透過德希達對康德的反省，需要再補充為「正當但不合法的鬥爭」，所謂正當，指的是符合社會外部對學術的需求；所謂不合法，指的是不符合學術內部的規則。

不同，而學術實踐正是以理性為核心，對所有具有因為外部利益而傷害了科學原則的高等系所提出「你違反了學術的原則」(you against the law of academic)的控訴和批判。在這個意義下，高等系所是正當性（外部邏輯）的保守者，而基礎系所的合法性（內部核心邏輯）的保守者；高等系所守住了科學場域的外部規則，而基礎系所則謹守科學場域的內部規則，兩者各持有科學場域得以相對自主地存在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學術場域的獨立需要高等系所對外部環境的「戰爭」，同樣的也需要因為高等系所對外的戰爭邏輯而對高等系所發動學術「鬥爭」的基礎系所，也正因為在學術場域中如此的左右位置不同，彼此會如同磁鐵的正負兩極一樣，永遠而不停互斥著，而且互相離不開對方。

### 第三節 與康德斟酌

康德對高等／基礎的區分是以系所學科屬性來辨視的。他幾乎就認定了哪些學科就是高等系所，哪些學科就是基礎系所。似乎兩種系所就是因為學者屬於什麼系所學科所致，如果我們完全按照康德的說法，可能會忽略了學術專業分工後，學術系統的成熟讓不同的學科都會出現不受外界價值影響的核心邏輯。也就是說，如果以台灣為例，並不是電機工程學系因為台灣在產業策略上的選擇，受到政府大量資源挹注和人民的重視，所以全台灣的電機工程學系就不會存在著秉持理性，只作研究而不問獲利，不關心競爭力消長與否，只是沉浸在自己研究天地的教授。

我們可以看到，自葛羅斯（Paul R. Gross）和李維（Norman Levitt）的《高級迷信》對「學院左派」的大加撻伐，以及約紐大學物理學教授索卡對「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期刊《社會文本》的愚弄後。以學科的不同來看待學者們的屬性就不是那麼清楚了。

在爭議中科學家們批評，當這些學院左派、社會建構論者批評科學和國家官僚的操作結合起來，建立了科學權威時，學院左派就像康德的基礎系所一樣，批判了官僚與科學利用強大的技術性指導，和日常的實效性所魔幻化的奇蹟製造者（miracle-workers）；另一方面，當學院左派對科學家嚴謹的科學研究本身，而不是嚴謹科學研究的社會效應產生質疑時，學院左派透過新聞、沒有學術審查的期刊、流傳在只有憤恨卻沒有深究的基進團體和社會運動宣言中，宣傳社會建構論的教條化宣言<sup>41</sup>，這時科學家對科學實在論的維護卻像基礎系所一樣，痛斥社會建構論者為時髦的奇蹟製造者，沒有遵守學術上的嚴謹性<sup>42</sup>。科學和學院左派都有部份的成員擔任過高等系所的角色，也都有另一部份的成員擔任過

<sup>41</sup> 比方說，任何東西都是社會建構的。

<sup>42</sup> 如Alan Sokal, 1998, *What the Social Text Affair Does and Does Not Prove: Any philosophy of science -- or methodology for sociologists -- that is so blatantly wrong when applied to the epistemology of everyday life must be severely flawed at its core.*這是很明顯的基礎系所學術態度。

基礎系所的角色；差別的地方在於康德過去所設想的「高等系所」，必須要因應學術界不只和政府有密切交流而容易受到控制，它也容易和市民社會建立依存關係，而成爲民主的道德和改革美感的學術代言者，市民社會對社會建構論、女性主義，後殖民學者的追求嚮往難道就不是「神奇」、「魅惑」的，難道受到學院左派影響的社會運動者、婦女運動者、勞工運動者、動物保護運動者、環境運動者、小眾基進刊物的記者就不是會製造魔幻效果，讓人沉醉在世人皆醉我獨醒中的「奇蹟製造者」和「高等系所的實業家」？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科學研究、社會建構論難道不會對市民社會提出教條式的「技術指導」？當科學家的研究接受了國家資金的佐助，爲特定的政策背書時，就如同社會學者的研究爲社會運動團體背書一樣，都是意圖以外部的神奇魔力產生學術影響力。更有趣的是，當學院左派斥責科學家沒有反思性地緊守科學和國家的區隔時，學院左派正是透過市民社會對「科學霸權」的不滿所累積而成的「社會權力」作爲支撐著力點，撬起權威的大廈。爲何權力的奇蹟唯獨國家能展現，市民社會的崇拜能量就不算？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十八世紀法國沙龍和英國咖啡館的出現，公開討論時事、接收知識分子的評論和分析也就不再是貴族的特權了，平民的力量漸漸展現出威力，理性執政的雅各賓（Jacobin）和提倡「行動比思想更重要」的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都是依賴平民力量建立政權的。這是一種在康德死後才愈發茁壯的新權力——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興起讓永遠的基礎系所的教員們（哲學家、文學家）得到拿破崙的理工學院才能得到的權威，自 1749 年法國工藝學校出現後，國家對大學的關心就早已不放在哲學家和文學家身上了，這些哲學家和文學家紛紛轉向這個新興的言論市場。我們可以看到十九世紀英國著名人文社會哲學期刊《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 since 1802），其創辦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休謨（David Hume）、James Mills 等都是因爲高水準評論文章閱讀市場的興起而鹹魚翻身的人文社會哲學家們。《愛丁堡評論》一出版，立刻受到新興中產階級的熱烈反應，第一期創刊號出售了 2000 本，以後每一期都有 5000 準的水準。在十二年的時間內，當《泰晤士報》每天的印數是 8000 份時，《愛丁堡評論》達到了相當可觀的 13000 份<sup>43</sup>。《愛丁堡評論》的稿費相當的可觀，每頁平均的稿費大約在二十個幾尼（Guine）左右，而編輯每期的薪資是五十個幾尼，當時一個紡織工每日只掙 2 個先令<sup>44</sup>。當時的輝格黨的《愛丁堡評論》和邊沁功利主義的《威斯敏斯特評論》彼此的筆戰吸引了不少熱愛於政治討論的中產階級。實用性和工具性高的工程學、商學取代了人文哲學，在經濟上依賴政府；而被政府趕出去的人文哲學家們，則因爲十八、九世紀大眾媒體的解禁和流行，而得到了新的市場和新的崇拜者。

因此，本文在理解康德的「系所鬥爭說」時，不應將高等系所的魔力光環

<sup>43</sup> 參見 Lewis Coser, 《理念的人》，郭方等譯，台北：桂冠，頁 83-84。

<sup>44</sup> 同引上書，頁 87。1 幾尼等於 21 先令。

和基礎系所的理性當成某些系所學科的專屬性質，也就是說，並不是理工科系的教授就是「高等的」；而人文社會學科的教授就是「基礎的」。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理工或是人文社會，學術場域所生產的學術性論述都有可能供外部所使用，只是理工的學術會被官僚當成增加國家競爭力的工具來使用，而人文社會的學術會被市民社會的知識分子當成增加反抗與革命力量的思想根源來使用。就本文來說，這些都是「高等的」，因為他們都是在外部社會中被世俗化成為社會或政治象徵鬥爭工具的，都是在學術的「社會使用者」(政府官僚和自由公民)以便直行事的態度，以社會外部最小的「自我職權行使」和最小的「自我理性使用」下被直接套用的：例如被勞工團體使用的馬克思主義、被企業管理者使用的知識經濟概念、被婦女團體使用的女性主義、被科技新貴使用的自由競爭概念。這種學術知識的社會使用(即使是一種精神和信仰上的實用)，其目的在於進行社會的象徵鬥爭，並且經由這種鬥爭為自己所屬政治信念：階級、性別、種族、團體、意識型態獲得較大的正當性；而不是在於學術真理的追求<sup>45</sup>。所謂「基礎的」則是一種心態和精神，是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也是一種無論理工科系或是人文社會科系學者，在面對同僚們因為傾向於將學術視為某種社會政治目標的過分參與，誤解或是簡化了學術上的論述時而提出的批判精神。

康德對基礎系所的定義放在現在的脈絡下來看會出現矛盾的解釋，主要是因為康德所處的時代權威的來源是國家，因此對國家進行批判是不會和任何的價值產生關聯的，但是十九世紀後發展出來的市民社會概念，讓受過教育的一般人都擁有討論和分析的基本能力，公民的關心一樣也會形成一種龐大的價值。市民社會的歷史發展傾向迫使過去依附在「純粹理性」中而不會有任何矛盾的民主化和科學化信念被迫和純粹理性分離出來。純粹理性不只不應該同物質利益的價值服務，也不應該為任何「進步」意義的民主價值和「科學價值」<sup>46</sup>而服務。如果稱之為「基礎的」的判準因為歷史的原因，愈來愈嚴格到只剩下韋伯式的「為學術而學術」。唯一能指涉學術活動的價值也只有學術本身。純學術，必定是不斷自我指涉的。他們不能直接或主動對社會或國家宣揚或是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即使這個宣揚的行動是一種基於(科學或民主)善意的理念都會使他們帶有特定的價值立場，試圖改變這個社會或國家些什麼。這也意味著，基礎系所要成為康德意義下的批判者，必定不能是「主動」批判，不能因為他被教導些什麼，而又去「教導」別人。他只能是被動的批判者(因為主動的批判是一種價值宣導)，等待著外界的人們主動來挖掘他的知識作批判的運

---

<sup>45</sup> 例如，我們可以看到管理學界是如何使用「韋伯」的科層制概念的。在管理學界中一本有名的教科書Ricky Griffin, *Management*, Bos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Co中，就將韋伯視為一個發現現代科層制，並且是首先提出科層制對生產力提升的樂觀主義態度，然而這完全與韋伯對科層制的悲觀態度相反。

<sup>46</sup> 「科學價值」在本身中是一個矛盾的用法，一來因為科學的範圍幾乎就是知識的範圍，二來因為科學本身就被定義成不帶價值的東西，所以在運用這一詞中容易產生誤解。「科學價值」在本文的意思是指涉一種「信念」，因為儘管經過嚴謹的科學程序，科學家們「相信」了某種說法，而試圖將這個說法在社會上「宣揚」時，就是一個將「科學」賦予「價值」的過程。

用。基礎系所並不意圖推翻政府，或是打擊任何的權威機構，而是相反的，透過學術場域內部理性批判，以學術論文或專書的形式發表，以避免學術知識上的對立激化成爲一種政治上的對立，目的並不在推翻任何的政府或體制。

在康德的大學分工方式中，因爲面對的時代環境不同，所以他所設想的權威來源只有國家，但是在市民社會的興起後，能夠爲大學賦予外部利益就不只是國家政府了。而且他所設想的區分方式也是以系所學科爲主，但是在學科專業化和分殊化後，無法再設想有一個萬能批判的理性能夠對所有的知識問題提出學術上的判準，而是必需想像有無數個理性核心，不同的理性核心彼此間的交流十分有限，而且學術交流活動也甚少憾動各自學科的核心知識。在大學學科專業化後，理性其實是座落在不同學科的學者中，形成一種精神態度，無法爲特定的學科所擁有<sup>47</sup>。

因此在理解康德的理論架構時，必須要考慮歷史和國家條件的因素，否則一方面容易先入爲主的以爲某些學科可以擁有純粹理性，而某些學科則無法，所以「合法鬥爭」的學術性批判就專屬於某些學科的特權；另一方面也將過去的（康德）理論架構限制在它所專屬的年代中，無法爲當下的情境提出任何有見地的貢獻，也無法爲當下的學術情境提供有意義的理解。康德的系所鬥爭說中，康德亦早已說明，高等系所總有一天會變成基礎系所，可見兩者不是一個固定的指涉。也就是說，高等系所和基礎系所是一個隨時代變化而改變的相對化的（必然）緊張關係。真正區分高等和基礎的，不是它所屬的系所學科，而是它所屬的內部結構受到外部結構（國家、社會、市場）的影響而構成的相關方式。如第一章所示，真正讓康德區分高等／基礎的，是純粹理性的有無，而不是系所學科本質，只是因爲康德所屬的時空情境下，純粹理性容易成爲某些系所學科的本質，而混淆了兩者的差異。所以在理解康德的教員鬥爭說上，隨時空條件而改變的、彈性的、概念核心的理解是必要的；也因此，在本文的運用上，康德的理論架構並不僵化的限制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上，而是隨歷史、國家的條件而變化的。所以，回到最根本的康德中，不專屬於特定學科或系所的純粹理性才是一條區分的主軸。在本文其後的說明中，也將擬照這條彈性的理解，將康德的高等系所重新挪用爲高教員（high faculty），將基礎系所挪用爲低教員（low faculty）。他們各自在學術場域的分工角色和康德所描述的一樣，只是高教員和低教員的區分並不由系所學科而來，而是由他們對學術的態度和從事學術的精神是否有其所服務的價值目的來區分。

---

<sup>47</sup> 如第一章所述。在價值多元的現代社會形構中，任何看似無用的學科中都可提煉出有用的知識爲外部而服務。康德的「高等」／「基礎」指涉早已無法以「系所」或「學科」的方式來理解，而應該是每個參與學術活動的人（學者）對學術活動的態度。

### 第三章

## 後進國台灣的學術場域建立

自從成功地從過去的無產階級中脫困出來，並且渴望在未來進入布爾喬亞；為了要累積這段上升所必需的東西，他們一定要在某些地方找到資源來妝飾這種資本的缺乏。

——Pierre Bourdieu

台灣的國際地位，作為一個剛剛脫離貧窮、落後的國家，其學術發展有特定的規則。大體上從胡適、吳大猷、李國鼎，再到卓越大學計畫、大學評鑑爭議，台灣的學術發展有一種Bourdieu所稱為「上升中小資產階級的制慾稟性」(ascetic dispositions of raising petit bourgeois)<sup>48</sup>。台灣所有發展學術的政策規模，全都是採取形式主義的學習態度<sup>49</sup>，這種如Bourdieu所說矯飾(pretension)態度，是由於經濟資本的累積成功，而且必須要和無產階級有所區分，小資產階級必需要上升。但是由於資本不足以全部支應布爾喬亞階級的文化消費，所以會採取一種節約的態度，因此在實踐上會貫徹犧牲、受苦、自制，來讓自己在階級的文化區分具有「事倍功半」的邊際效果。這除了需要對布爾喬亞文化有所欽羨外，還需要不斷的對布爾喬亞文化進行選擇，選擇出符合邊際效益的文化實踐。這種選擇，因為成本和績效的考量，也因為對布爾喬亞文化的認知不足和自卑，會不自覺的被召喚出<sup>50</sup>一種「自願性嚴格」(voluntaristic rigour)<sup>51</sup>的形式主義路線。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慣習侷限，完全符合「小」的意義，不管是小資產階級所做的、說的、想的、是的、擁有的，全部都表達出小資產階級和社會空間之間的客觀關係<sup>52</sup>，因而呈現出一種自律嚴格、認真、苦幹的態度來進行沒有文化高度、廣度、實質性，也沒有文化博大性的社會實踐。

由於自己的過去來自重視鄉里關係、家庭價值、友情關係的無產階級連帶關係，小資產階級無可避免的要成為傳統連帶的背叛者，進而倒轉整個過去沿習下來的價值觀、文化態度，因而傾向於組織一個核心家庭而不是大家庭，對未來的一切投資也傾向於被國家制度化、規範化的學歷、證照，因為過去的連帶關係無

<sup>48</sup> Bourdieu, 1994, p.333-339。

<sup>49</sup> 此為受訪對象H4(歷史學者)對台灣學術發展的意見：第一個就是說，雖然是學術界，但是還是脫離不了一般社會文化的畸型，心理上很大程度是一種官本位階層化的東西，聯考就是這樣，什麼國科會、算點數啦！這都是形式主義，坦白說我在別的學術界都沒有看過這種風氣，你用形式化的方式來建立一個階層，這很畸型，這是第一個我不喜歡的。

<sup>50</sup> 是被召喚的，而不是被選擇的。這也就是說，當Bourdieu在思考小資產階級的慣習時，是放在一個同時拒絕主觀主義的「選擇」和客觀主義的「被選擇」的位置上。召喚意指「個人配合結構決定的意見」。

<sup>51</sup> *Ibid*, p.339。

<sup>52</sup> *Ibid*, p.338。

法提供給他階級上升時所需要的保證和保護。

將台灣在國民黨遷台後的國際位置比擬成小資產階級，可以有效的看出台灣在這五十餘年對學術政策的態度，以及這個態度背後的客觀結構成因。主要是因為「學術」是一個自我矛盾的（paradoxical）場域：因為它一方面學術追求的是知識和真理，而不是這個知識和真理所帶來的社會效益，若非如此學術的腳步將在社會需求被滿足後停滯，而變成一種爲了某個目的而進行的訓練，這種學術類似消費品，社會或國家挹注學術不爲任何目的，或是不爲任何可以被市場、國力所計算的一種純消費；而另一方面學術又是先進國家和後進國家之間最有區辨力的國力表徵，是極爲耗費成本的投資，而需要大量的經濟成本，也需要整個社會的包容。對一個資源和文化發展有限的後進國來說，爲了避免它成爲一個沒有再生產可能的行爲，變成一種「浪費」，必需無時無地對它進行管理和調節，所以台灣的學術和教育幾乎無所不管，從學生的學習到道德審查，和學者研究計畫的審查，全部是中央統籌形式的。於是台灣的學術活動就變成一個有目的性的投資品。由於台灣在短短的五十年間完成了國力的大躍進，所在學術的實踐上，把學術的雙重性拉扯演繹得淋漓盡致。本章將討論分析和討論這段歷程。

### 第一節：節省、侷限的學術獨立

1947年，反共立場明顯的胡適發表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胡適所謂的「學術獨立」有四個條件<sup>53</sup>：

- 1、中國<sup>54</sup>應該有大學可以作學術的基本訓練。
- 2、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足夠的設備和師資，可以繼續做專門的科學研究。
- 3、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工業問題、醫藥問題和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問題等等，在國內都應該有適宜的人才與研究機構幫助社會國家尋求解決。
- 4、對於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能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負擔人類與學術進展的責任。

並且胡適認爲，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中國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畫，在十年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養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成爲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我們可以把胡適的學術獨立區分爲二：教育獨立和大學教員獨立，四個條件中的1和3項，指的是教育獨立；2和4指的是學術獨立。無論是何種，胡適的學術獨立其實都是一種民族的學術獨立，他所強調的意涵在於讓國家的學術有自由性，所以掙脫的是國家民族對另一個國家民族在學術上的依

<sup>53</sup> 參見胡適，1966，《胡適的一個夢想》，台北：胡適紀念館。頁27-33。

<sup>54</sup> 這是胡適用的字詞。將它突顯出來不是突顯胡適的意識型態，而是表示胡適的「民族」學術獨立意圖。

賴，而不是學術本身獨立於國家的一種夢想。

胡適自 1949 年十二月政府遷台後，在 1956 年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以下稱中基會）幹事長<sup>55</sup>，開始運用他的影響力，首先對台大提供了美金兩萬元的補助，傅斯年於 1950 年去世後，胡適推薦錢思亮為校長，而錢思亮於 1952 年就是中基會董事了，他更將補助擴充到研究生獎學金、40 個研究補助金，台大當時占中基會對台灣所屬大學的補助百分之七十以上。後來更以六千美元的高額津貼，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以客座教授的身份來台講課一年，第一位獲邀的，就是吳大猷。<sup>56</sup>

吳大猷於 1957 年發表【如何發展我國科學】，認為要發展科學首先就要先建立科學的環境，強調：1、學術工作者之間學術上之接觸，討論之機會。2、圖書，尤其是國外學術期刊；我們須藉書刊以保持與世界學術進展之接觸。3、實驗室工作之設備。4、工作者之合理生活條件。並再強調學術「環境」的營造，目的在於有一個適宜之風氣。環境對受過基本訓練的學人來說可能不是很重要，但是對研究研習之青年，環境更為重要。<sup>57</sup>這個觀點，頗受胡適贊賞。以吳大猷所擬定的「綱領草案」，與陳誠副總統面談。

1958 年，由陳誠、教育部長梅貽琦、王世杰、李濟（代胡適為中研院長）和各大學校長，通過了「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畫的綱領草案」；1959 年<sup>58</sup>通過章程，成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長科會）。由中研院長為主席，教育部長為副主席，下設執行委員會，而執行委員會是數理科學、生物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三組加集人所組成。

長科會的經費來自美援、政府原訂的「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畫經費」和各種教育文化基金的捐助。其中以美援占多數<sup>59</sup>，因此美國變成了台灣在學術上（形式主義的）學習的主要對象。在計畫綱領中明示「暫以自然科學、基礎醫學、工程基本科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為主。而用之自然科學、基礎醫學、工程基本科學者，不得少於總額之百分之八十。」而其中人文與社會科學「並不包括文學、音樂、藝術，但包括文學史及語言學。」這是胡適所主導的長科學中，對「科學」和「學術」最明確的定義了。

長科會所訂定的「國家發展科學專款運用辦法」<sup>60</sup>主要以公立學校為主，其

<sup>55</sup> 參見楊翠華，1991，〈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sup>56</sup> 參見楊翠華，2002，〈胡適對臺台科學發展的推動：「學術獨立」夢想的延續〉，《漢學研究》，第二十卷第 2 期。頁 331。

<sup>57</sup> 參見吳大猷，1990，〈如何發展我國科學〉，收錄於《科學與科學發展》，臺北：遠流。頁 12。

<sup>58</sup> 1958 年即通過，只是因金門砲戰發生，台海開戰而擱置。

<sup>59</sup> 參見楊翠華，2002。頁 339。

<sup>60</sup> 主要有八項：1、研究設備；2、設置「國立研究講座教授」；3、設置「國家客座教授」；4、設置「研究補助費」；5、造學人住宅；6、補助各大學及研究機關之學術研究刊物；7、研究經費

原因在於長科會大部份的經費來自美援會，而美援經費主要以公立機關為限，所以公立私立之分從此開始。

美援的運用條件非常的嚴格。當時的執行委員王世杰就多次致函外交部和美援運用委員會，希望能簡化程序，但多沒有下文，而且美援也逐年遞減。胡適去世後，王世杰接替了位置，就遇到這美援這方面的困難。美援公署（Aid Mission to China）於 1962 年後開始調查台灣的科學教育和研究事業，他們認為，因為美援經費而供應的科學設備和建築已有一定成效，接下來應該由中國政府負擔起吸引科學人才回國，並訓練新人才。次年，美援停發，原先政府所給予的經費不足以執行計畫，王世杰即向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以下稱經合會）求助，希望能一次撥款台幣八千萬元原立基金會，以其利息補助科學研究。但為經合會秘書長李國鼎拒絕。於是轉向行政院長嚴家淦籌募基金，同意每年編列正式預算六千萬元為長科會經費。

但 1967 年宣布成立「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以下稱科導會）。科導會的目標比起長科會要來得多元。除了學術制度的建立外，是國防、經濟、教育、農工、科技等國家全面性科學技術政策作的檢討研究機構（楊翠華 2002）。科導會由吳大猷擔任主委。主要原因在於吳大猷早已不認為當前的問題需要再討論「發展科學」、「培植人才」、「建立科學、工程、技術基礎」的句語。<sup>61</sup>而是需要談一些切實的問題。所謂的切實問題，就是科導會不能再像長科會一樣，毫無節制地任憑經費的開銷，卻從來不監督成效。<sup>62</sup>吳大猷並且認為，「由於財力和人力的限制，如好高騖遠、期圖在高能物理（基本粒子物理）或熱核子核合能等工作致力，則是極不合理，亦為不可能的事情。」更於第三節（進一步的期望）中提到，國家政府支持「科導會」和「科學中心」愈來愈困難，因此：

「我們希望社會能給予直接的支援。科導會及各研究機構主持人，亦當謀與各工業聯繫，俾從事工程或應用科學研究的人知工業實際待決問題的所在，庶能有所致力。我國工業界不乏遠見的人士；深望能和科學工作者共同擔負起這個為國家建立科學、工作、技術基礎的責任！」

吳大猷

企圖擺脫科學工作對國家的依賴，是吳大猷和胡適最大的不同。1967 年，

---

及其他補助；8、遴選科學技術人員出國進修。

<sup>61</sup> 參見吳大猷，1990a。頁 15。這篇文章一直在解釋科導會取代長科會的原因在於「我們進入實行階段了。」

<sup>62</sup> 同上引書：「我們不要統計式的粉飾或自我陶醉的答案，而要誠實的，從合理的標準分析我們的實況，作為我們一切計畫的根據。」

科導會將長科會改組為一直沿用至今的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國科會主委不再是中研院院長、中研院的各所也不再是國科會的各處室召集人。自此，正如吳大猷特別強調的：「學術（包括一切學問）可以說是一個國家興亡的關鍵……學術工作的支持，即使直接來自政府，到底還是來自社會。」<sup>63</sup>宣示了胡適模式的「學術獨立依賴政府資金挹注」不再是學術政策的主要考量，學術制度必須要社會化，要面對到當前社會的困境，不能再像過去依賴美援一樣，把錢花在不切實際的項目上。

集中經費在該花的事項上，是胡適和吳大猷都同意的方向，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國內經濟實力不足以投注在沒有經過選擇的學術研究上，而荒廢了其他的國家建設。因此，必須拿有限的經費挹注在刀口上。但是在科導會成立初期，吳大猷改變胡適學術政策最重要的一點即在於應用科學和技術上的發展。科導會和國科會許多的學術政策都雷同，最大的不同在於分配的類別中，由國科會主導的「重點發展」項目愈來愈接近社會實用性和國家競爭力的用途上。吳大猷於 1972 年【我國科學發展計畫實施經過和檢討】<sup>64</sup>一文中首先揭露一種「對我國科學現況的了解不深」，即政府官員以為國科會過度地發展科學，而不理會技術（其實和史諾以為英國科學的衰弱一樣，是反事實的），結果不是「對科學發展計畫敬而遠之，就是以為國科會過重於人才培育、科學研究而輕於實用性項目者。」（吳大猷 1990）在這裡，充份表達了即使如吳大猷這樣強調科學發展必須深植於社會、依賴於社會的純物理學家<sup>65</sup>，也感受到國家官員和社會對國科會的誤解。在 1982 年民生報發表的【科學、技術、人文學】中更是清楚地解釋了他對科學和技術之間的看法：「應用科學略如枝葉，純粹科學則略如根；忽視基礎的純粹科學而祇謀應用科技的重大進展，亦猶任使根枯腐而望花實繁茂的不可能也。故即從實用的觀點而發展科技，亦不能偏廢純粹科學。這個道理甚明，是無容爭辯的。」<sup>66</sup>而後於 1984 年聯合報，由徐梅屏紀錄口述的【基礎科學在臺灣的發展】中也表達了「我們科學的成長，遠不如我們在經濟上的成長，這是事實！我們最優秀的青年，二十年前多志向於基礎科學，近十年則多趨向於應用科技，這也是事實！」<sup>67</sup>同年，於聯合報發表【社會富裕反導致學術下降】一文，直指「以社會環境及政府政策措施言，無論獎金、徵文、皆係以錢為研究或創作的唯一酬報。筆者以為過度的物質性氣氛，對學術研究或文藝創作，都會有不好的作用的。……培育人才所需的環境、設備外，更須有『學術氣氛』，而這不僅非錢可買得來，且和急利壓力是不相融的。」<sup>68</sup>

<sup>63</sup> 同上引書，頁 19。

<sup>64</sup> 同上引書，頁 76。

<sup>65</sup> 吳大猷的專長是量子物理和相對論。純粹屬於理論物理的層次。

<sup>66</sup> 參見吳大猷，1990b，（科學、技術、人文學），收錄於《人文、社會、科技》，台北：遠流。頁 83。

<sup>67</sup> 同上引書，頁 87-88。

<sup>68</sup> 同上引書，頁 121-122。

從 1962 到 1984 年，吳大猷意識到由國科會所推動的學術政策，現正處於一種「社會功利」氣氛壓力的影響下，開始不重視科學「人」的問題，而是重視科學對社會有無實際貢獻的問題。於此，學術人開始被導向致「工具性」學者（instrumental scholars）的方向，傾向於將關心學術和真理的問題，用學者的位階、符合標準的論文多寡、通過學術行政機構審查的計畫多寡的計量的方式來「代表」（representation）；也就是說，一種企圖以「學術價格」（academic price）的高低來代表「學術價值」（academic value）的高低。這種工具性學者的學術民主化傾向，最明顯的就是學術機構的科層化、學術審查制度的管理化和學術創作的產業化。此時，台灣的學術獨立問題不再像是胡適所面對的那麼簡單了。胡適所面對的民族學術獨立問題，但是吳大猷卻意識到了學術除了要獨於立其他的民族之外，也要獨立於自身民族的社會風氣。

從 1962 年到 1984 年間，台灣學術領域在獨立的過程中究竟有了什麼政策上的轉變，使得學術所欲獨立的「對象」（學術意圖區隔的對象）從其他的強勢民族轉向自己內部的強勢壓力？是什麼樣的政策，即使吳大猷當時任國科會和科導會主任委員二職，他的身份理應處在「掌權者」的位置上，但是卻無法運用他的權力修正他所看到的弊病，使得他從一個掌權者（官僚和實業家）變成一個權力的批判者（低教員）？這些政策又是誰；在什麼樣的理由下主導這樣的政策？這些問題留待本章第二節說明。

## 第二節：主導台灣學術和教育的實業家官僚現實心態

目前個人提倡「因材施教」、「學以致用」，以往「有教無類」，從教育與投資的觀點來看，實在有待商榷。<sup>69</sup>

李國鼎

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sup>70</sup>

張忠謀

對台灣的教育演進來說，一直是服從於國家經濟政策的，這個情形可以從早期台灣主導教育政策的官僚，其實和主導經濟政策的官僚是同一批的事實中，很明顯的看出來。按「科技教父」李國鼎的話來說，他所希望改革的舊習，就是不為任何現實目的而服務，只是純粹為了培養「人格」（manhood），啟發智慧的教育理念；相對的，他想要與之替代的，是站在分工與專業化立場下的「人力」（manpower）訓練。簡言之，「教育是一種投資而非消費，我們必須確認這個前提。」（李國鼎 1964）<sup>71</sup>。根據張清溪、吳惠林的解釋，李國鼎對投資和消費分

<sup>69</sup>李國鼎，1987，《工作與信仰—台灣經濟社會發展的見證》，台北：天下。頁 151。

<sup>70</sup>引述自王成聖「一代國士李國鼎」，收錄於《李國鼎先生紀念文集》，台北，李國鼎科技基金會，民 91。頁 110。

<sup>71</sup>李國鼎，1964，《經濟發展與人力資源》，《人力資源問題論叢》，國際經濟資料叢書第 25 輯，台北：國際經濟資料中心。頁 5-22。

類其實有種誤解，即視投資為把資本花在有用之物的再生產上，而消費則是花在無用之處上；故且不論這種觀點是不是如張清溪或吳惠林所說的錯誤<sup>72</sup>，重點在於李國鼎對教育的見解是十足具有影響力的。

李國鼎，1910年出生於南京市，1934年考取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赴英國劍橋大學進修，研究核子物理與低溫超導現象，他的指導老師就是史諾在瑞德講座中極力推崇，發明現代原子模型的拉塞福（Ernest Rutherford）。取得博士後，卻因為蘆溝橋事件的發生，而婉拒拉塞福為他爭取的獎學金，於1937年回國報效，擔任防空學校照測總隊修理所所長。1953年應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尹仲容先生之邀，擔任專任委員兼一般工業組組長，1958年美援運用委員會改組後，由李國鼎任秘書長。1963年9月，政府試圖從美援之外找尋資金，乃將美援會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由李國鼎任秘書長，同年12月，李國鼎任副主任委員。其後，李國鼎歷任財政部長、經濟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總統府資政等要職，獲國內外十二所大學頒榮譽博士學位，獲頒菲律賓1968年麥格塞塞政府服務獎，1993年獲天下雜誌贈予「資訊工業特殊貢獻獎」、台灣四十年企劃典範金象獎，2001年獲工研院RCA技術團隊贈予「矽土生金」晶圓獎，由陳水扁總統頒贈，亦曾得到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設立專名講座。於2001年五月病逝於台大醫院<sup>73</sup>。

李國鼎是國民黨時期台灣最具有代表性的技術官僚，他和比他資深的尹仲容，或是較資淺的陶聲洋、孫運璿等人都有些明顯的特徵<sup>74</sup>：都是留外大學深造後的專業人士、沒有長遠的家世背景、純粹的公務員，本身並不經營官商資本，因此形象非常的清廉（吳宏志 2002）<sup>75</sup>、信奉由尹仲容主導的「計劃式的自由經濟思想」。計劃式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主要分兩個階段：首先，尹仲容認為台灣最大的經濟問題在於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的原因在於生產供給小於進口需求，所以在進口替代時期，政府應該各種汲取農業資源的措施來扶植民生工業的發展，以達減少進口與節省外匯的目的；其次，於在出口導向時期，繼續以農業資源來支持工業的發展，並以外匯改革措施刺激工業品出口追求工業進一步的成長。這兩時期的基本精神，即是對內透過從農業到工業部門的資源轉移，提升整體經濟資源的有效利用；對外則求台灣整體經濟發展與強化，而達到獨立自主的經濟型態<sup>76</sup>（黃子華 1995）。李國鼎是科學與工程出身，但尹仲容的經濟思想對

---

<sup>72</sup>見張清溪、吳惠林，1996，《教育應以經濟發展為目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頁8-11所分析，在經濟學上，投資和消費的區分不是有收益的花費的和無收益的花費之間的差異。消費乃是當期享受的效用，而投資包括以後各期之享受，且均不區分物質或精神面、市場或非市場。

<sup>73</sup>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為李國鼎設立的紀念網站，裡頭有十分豐富的史料。

<http://ktli.sinica.edu.tw/>。

<sup>74</sup> 這個特徵其實還包含了「不會對威權時期的政治作出任何的批評」。這部份留待本章第三節討論。

<sup>75</sup>原出處為許介麟，1998，《戰後台灣史記（卷二）》，台北：文英堂，頁30。

<sup>76</sup>參見黃子華，《尹仲容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他影響頗大，隨後力主高中教育體制必須含有 70% 的職業學校、五專制度的推廣、新竹工業園區的規劃都可以看得出計劃式自由經濟思想的影子。尤其是 1978 年，李國鼎任國科會委員時召開全國第一次科技會議，於次年擬定「科學技術發展方案」明確地規劃台灣科技發展要以建立學術界與產業界的聯繫通道、加強培育科技人才、以及引進技術與人才招攬為方針。1982 年，第二次全國科學會議指出國內科技人才大量不足與美國的 29／萬人、日本的 27／萬人、法國的 14／萬人相比，台灣只有 5／萬人，比例的差距都在兩倍以上；而且多數畢業後出國的留學人數回國服務者太少。台、成、清、交理科畢業生平均有 53.7%、工科有 30.7% 出國，但回國者理科僅 11.1%，工科僅 9.4%。第二次全國科學會議後，行政院請時任經建會委員、資策會董事長的李國鼎負責招開「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科技人才方案」，人才方案的內容非常的廣泛，涵蓋了教育、國防，甚至學術的未來發展<sup>77</sup>。首先在教育與學術上，人才方案要求全國所有科技類研究所增加招生名額，同時也要求系所的經費與教師員額必須按學生人數來核定；而且也大量延攬海外留學生回國服務，從事教學和研究的工作。在國防上訂定了科技預官制（後改制國防役），吸引大學畢業生到國防相關科技單位服務四年。我們可以看到表 3-1 中，七十學年度和八十學年度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毛額（GDP）提高了 2% 以上；而表 3-2 更突顯出，由李國鼎的自民國七十年代起提出的人才方案中，於民國七十學年度後，理工大學生加生醫大學生的部分就一直超越 50%，甚至從八十學年度後，兩者的總和都超過 55%。

表 3-1 臺閩地區教育經費概況							
(一)教育經費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別	教育總經費				政府教育經費		
	金額	占國民生產毛額比率 (%)			金額	平均對每國民 支出(元)	占政府歲出比率 (%)
		公部門	私部門	...			
40 年度	213082	1.73	1.73	...	213082	28	9.93
50 年度	1671962	2.52	2.22	0.30	1470169	136	13.32
60 年度	11236766	4.57	3.69	0.88	9065121	614	16.51
70 年度	74112578	4.54	3.69	0.85	60262157	3373	14.71
80 年度	300965051	<b>6.49</b>	5.34	1.15	247488080	12131	17.77
83 年度	428109963	<b>6.80</b>	5.56	1.24	350053223	16672	18.58
84 年度	449691445	<b>6.57</b>	5.36	1.21	366902255	17325	19.36

<sup>77</sup> 從第二期經建計劃開始，人才培育納入計劃內容的構想就不曾斷絕過。

85 年度	500863136	<b>6.72</b>	5.47	1.25	407595911	19085	19.50
86 年度	533672566	<b>6.61</b>	5.21	1.40	420905497	19554	18.91
87 年度	550309889	<b>6.29</b>	4.92	1.37	430675819	19808	18.54
88 年度	581536145	<b>6.31</b>	4.92	1.39	453089741	20662	18.80
89 年度	558968090	<b>5.70</b>	4.35	1.35	401537000	18175	19.18
90 年度	601358531	<b>6.20</b>	4.54	1.67	409307000	18268	18.02
91 年度	639876507	<b>6.40</b>	4.69	1.71	438074000	19452	19.76
92 年度	634853400	<b>6.23</b>	4.51	1.68	423266000	18724	20.76

附註：公部門教育經費包括政府教育經費支出及國立大專院校自籌校務基金支出；私部門僅包括各級私立學校部分。

資料來源：教育部；<http://www.edu.tw/EDU-WEB/Webs/statistics/index.htm>

學 年 度	人文(含藝術)		社會科學(含大眾傳 播、商學、教育、 法律、家政)		醫學衛生		理工 <sup>79</sup>	
	人數	比例 <sup>80</sup> (%)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70	37446	10.53%	134712	37.89%	38530	10.84%	144820	40.74%
75	40010	9.09%	161611	36.71%	51548	11.71%	187075	42.49%
80	46241	<b>7.60%</b>	212153	<b>34.87%</b>	73194	<b>12.03%</b>	276867	<b>45.50%</b>
81	47640	<b>7.34%</b>	227653	<b>35.08%</b>	79010	<b>12.17%</b>	294694	<b>45.41%</b>
82	48736	<b>7.12%</b>	240627	<b>35.15%</b>	83817	<b>12.24%</b>	311449	<b>45.49%</b>
83	51922	<b>7.26%</b>	253215	<b>35.40%</b>	89052	<b>12.45%</b>	321173	<b>44.90%</b>
84	55476	<b>7.43%</b>	267418	<b>35.83%</b>	92380	<b>12.38%</b>	331123	<b>44.36%</b>
85	61033	<b>7.72%</b>	283520	<b>35.88%</b>	99665	<b>12.61%</b>	345927	<b>43.78%</b>
86	70400	<b>8.28%</b>	307089	<b>36.13%</b>	107461	<b>12.64%</b>	365102	<b>42.95%</b>
87	79902	8.79%	331968	36.51%	113950	12.53%	383418	42.17%
88	91958	9.32%	363520	36.85%	120900	12.26%	410108	41.57%
89	105317	9.72%	403324	37.23%	133553	12.33%	441217	40.72%
90	118735	10.09%	444333	37.75%	146211	12.42%	467788	39.74%
91	130388	10.61%	467675	38.05%	153149	12.46%	477989	38.89%
92	140465	11.17%	478706	38.06%	155359	12.35%	483118	38.41%

這種高等教育政策往往是為了解決一個現實的政策問題，如科學技術基本法

<sup>78</sup> 本表修改自行政院主計處，「全國統計資料」的「教育、科學、文化及大眾傳播：統計年鑑資料」。

<sup>79</sup> 我們可以把 1981 到 2003 年高等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學生比例。

<sup>80</sup> 「比例」指的是當學年該學科占總學生數量的百分比

第十條中所提及，「政府應考量國家發展方向、社會需求情形及區域均衡發展，每四年訂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作為擬訂科學技術政策與推動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依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之訂定，應參酌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部門、產業部門及相關社會團體之意見，並經全國科學技術會議討論後，由行政院核定。前項之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每四年由行政院召開之。行政院應每四年召開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我們可以看到從早期爲了要解決進口替代問題時，使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1963-1973），著手規劃重化工業及機械、資訊、電子等策略性工業之發展，到 1980 年代後，爲了因應工資大幅上漲、勞動力短缺、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工業逐漸喪失比較利益和比較優勢，而導致民間投資意願低落，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因此利用人才延攬的方式，從教育的領域提高勞動力的技術成份；由經濟需求產生人才需求，再由人才需求產生教育需求，由教育需求產生學術研究需求，然後再由學術產出反饋到經濟需求的循環模式。

在民國 86 年《中華民國科技白皮書》的第一章前言：「邁向科技化國家」一文中提及，三位國際級財經學者的說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 Kuznets）教授指出，人工及資本累積對平均生產力之成長率貢獻不到十分之一，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是技術進步。哈佛大學波特(M. Porter)教授在《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書中指出，在全球競爭激烈的世界，傳統的天然資源與資本不再是經濟優勢的主要因素，新知識的創造與運用更爲重要。」因此，這套「知識經濟」的理論頗能支持台灣政府發展科技產業，以及辯護台灣政府積極從教育和學術的角度切入協助經濟發展並不是一種干預行爲的說法，其主要原因是在於台灣的天然物資和國際政治環境均對台灣經濟發展不友善，因此「知識」就變成了突破國際階級困境的一大助力。按此，使教育爲經濟<sup>81</sup>服務，提供源源不絕的人力「資源」就成爲十分正確的目標了。

一直到94年1月10日的全國第七次科學技術會議中《策略二：提升學術研究水準，發展特色研究領域報告<sup>82</sup>》提到，以第六次全國科學技術發展會議的共議與結論提出國家發展的六項目標，分別是：強化知識創新體系；創造產業競爭優勢；增進全民生活品質；促進國家永續發展；提升全民科技水準；強化自主國防科技。而針對這六項全國發展目標計定八項策略：

- 1、加強科技人才培育、延攬及運用。
- 2、充實並有效運用科技經費。
- 3、加強學術研究、追求卓越發展。
- 4、加強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升級。

<sup>81</sup> 按張清溪、吳惠林的說法，經濟一詞並不是指十分狹隘的金錢或財貨問題。而是指十分廣泛，包含物質、精神文化層面的所有生產、分配和交易機制。如果「教育必須要爲經濟服務」，則經濟的定義必須是後者。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從李國鼎到知識經濟，台灣歷年來人力資源計劃對教育的影響，其企圖中的「經濟」明顯是前者，而非後者。

<sup>82</sup> 參見國科會網站，全國第七次科學技術會議報告<http://www.nsc.gov.tw/pla/tc/>。

- 5、增進民生福祉與環境生態品質。
- 6、促進科技與人文社會互動發展。
- 7、推動全民科技教育、提昇國民科技素養。
- 8、建立自主之國防科技工業與研發體系。

李國鼎時期的「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科技人才方案」和94年1月行政院國科會全國科學技術會議中的人才政策的過程變化，最大的不同在於李國鼎的「人才方案」中「學術」的位置並不在於直接對經濟有助益，而是輔助性的，幫助訓練科技人才，讓這些人才為國家提供本領，為國家的目的而服務，因此這些高教員和權力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距離，只是要求學者的教學為國家服務，沒有要求學者的研究也比照辦理；然而在89年起，教育部和國科會推動「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劃」開始「引導」學者從自由型研究轉向目標型研究（中華民國科技白皮書民93，頁23），以至到94年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開始將過去學術界和產業界之間的遠距離視為一個必須「檢討」的問題，而除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和加強知識的產業化外，還試圖在學術界上建立仿自產業界的績效制度，打破大學教師同工同酬模式，並且在大學評鑑中考慮產學關係的績效。簡言之，94全國科學技術會議之後開始提出「知識經濟」的概念，相信產業創新直接源自於科學研究或因科學研究而深化<sup>83</sup>，大學教員正式納入為國家生產力的一環，他／她的研究興趣必須就是產業的利益所在，因為國家是以大學教員和產業界之間的合作績效來評量大學教員的學術水準，所以大學教員和勞工的定位並無區分，在「知識經濟」的概念下，所有的知識活動都必須是一種勞動，無法脫離金融經濟的影響，所以必須納入自由經濟式的勞動市場予以規畫和安排，透過升遷、學術期刊得分評鑑、國科會計畫申請的數量來判斷學術勞動者的績效。而且無論科學、工程、商學、生命醫學、人文社會科學，或許有不同的評量方式，但是都必須接受為了國家競爭力而做的評量管控。

這裡，學術人和事務之人、教員和實業家（businessman）之間變得並無分別。過去只有「教育」必須為社會目標而服務的模式起了變化，而今，多數由工學（少部分的理學）、商業管理科系<sup>84</sup>的學者所主導「科技政策」，連教育的施教

---

<sup>83</sup> 必須注意一點，在所引的文獻之前的部分提到「過去因應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強調發展高科技產業，科技人才的定義偏重於理、工、醫、農四大領域，是分類上的定義；隨著知識創新研發知識體的發展，科技人才需求的範圍從『科技產業』之需，擴大為『產業科技』需求的概念，簡單的說，『科技人才』幾乎是強調跨領域、創新、整合等特質，跨雙科技與跨科技與人文社會領域甚至包含跨職場所需人際互動與團隊帶領等人際技巧等等。因此，科技人才所需培養的類別與能力指標定義，亟需有創新的界定。」（第七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參考資料2：六項策略之現況與措施，民94，頁56）這其中「科學」一詞的定義，在「知識經濟」的概念下早已不是五四運動時，意圖去除蒙昧的概念了；而是服從於產業發展的一種要素。所以只要是能夠幫助產業發展的要素，不管過去是不是把它當成科學，都受中華民國全國科學技術發展會議的結論所支持和贊助。

<sup>84</sup> 這裡必須先行澄清一點，這裡所指的理工科系、商學管理科系教授不是現在所有的理工、商學管理教授們全體，而是指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下，使得理工科系和商學管理科系成為具有高教員的傾向。許多在訪談中的理工科系教授明顯地反對以SSCI作為評鑑的方式，或是追求卓越的方

者（大學教員）也納入此一體系，成為政府體系的一份子。

在 1970、1980、1990 年代的李國鼎時期以務實性的教育方式，訓練出大量精良而廉價的技術勞工，為台灣的經濟打下了良好的人力資本基礎後，台灣漸漸開始意識到儘管自己的經濟能力接近了先進國家，但是那只是在技術性的複製先進國家的路徑，其表現就是大量而占主要國民生產毛額的資訊產品代工業和品牌等創新概念的缺席，而且在技術上的專利、學術的創新和影響力、公民的政治文化能力、素養上，似乎並沒有距離更近：

30 年前，我國在國際期刊的論文量幾乎是掛零，現在我們莫名其妙地締造出世界第一的輝煌記錄，可是論文的相對影響力仍是原地踏步。我們的「世界第一論文」之相對影響力績效，與那些國民平均所得和我們有相當差距的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等國家，是落在相同的範圍<sup>85</sup>。

同樣的現象表現在台灣的留學生變化當中。從 1980、90 年代「來來來，來台；去去去，去美國」的對英美語系國家的留學熱潮開始（見表 3-3），台灣對英美語系的國家留學意願要高於其他國家許多，這種留學情形明顯的受到自李國鼎以後的人才政策施行所影響：

表 3-3：1950-2002<sup>86</sup>年台灣留學生國家比例

	美國	日本	澳大利亞	英國	法國	德國	加拿大	紐西蘭 <sup>87</sup>	其他 <sup>88</sup>	合計
總數	258953	24782	27939	71122	6984	7242	28428	6025	4106	435581
比例(%)	59.45%	5.69%	6.41%	16.33%	1.60%	1.66%	6.53%	1.38%	0.94%	100.00%

式來提升學術發展。因此，這裡指的是一種propensity，一種由理工和商學管理的教員們治理的傾向和潛質。也就是說，在台灣爲了要在任何一個領域中脫離舊有的模式，追上英美，所以必須大量學習英美的學術制度，甚至只學習英美專長的學科和知識（如資訊工程和管理），這個結構性的成因使得理工和商學科系的教員們比起人文社會學科的教員們要來得更有機會參與學術政策的制度。

<sup>85</sup> 參見文化研究月報（2003）：「台灣學術教育國際化的迷思」，第二十四期。曾孝明教授的發言。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24/journal\\_forum18.htm](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24/journal_forum18.htm)。

<sup>86</sup> 本表由教育部統計處留學資料，和《中華民國教育年報》，民 92：第十二章：國際文教交流，頁 413：我國學生留學各國獲簽證人數統計表總和而成。但本資料缺 1990、1991 兩年。

<sup>87</sup> 雖然紐西蘭於 1987 年將官方語言從英語修改為毛利語。但多數的大學仍以英語為教學語言。而且，台灣前去留學的華人們「應該」不會毛利語才是。

<sup>88</sup> 「其他」的數量應該大於本表中所顯示的數目。主要原因在於 1989 年自費留學生不需向教育部報備，所以只能從各駐華機構了解出國留學人數。按 92 年到其他國家簽證人數：新加坡 700 人、義大利 209 人、西班牙 206 人、韓國 89 人、愛爾蘭 17 人、比利時 28 人、瑞典 56 人、丹麥 13 人、泰國 65 人、俄羅斯 78 人、土耳其 1 人、荷蘭 119 人、印度 29 人、南非 16 人、瑞士 85 人、捷克 5 人、菲律賓 3 人。這些數量都很少，且其中新加坡這個英語國家還占多數，應該尚不致影響我的推論。

雖然胡適曾說明，學術獨立不代表「可以沒有留學外國的中國學生了。」但這裡對於解釋這五十年來留學生現象仍然存在著許多模糊的空間。首先，如何區分「依賴」和「交流」呢？如果說胡適意圖的「民族學術獨立」成功的話，何以交流的形式是透過國外大學授與學位，而不是台灣授與學位的學人出國發表文章呢？其次，如果留學生出國的意願是出自交流，何以交流的國家幾乎都是英語系（90.10%）的呢？

胡適的學術獨立之夢，經過李國鼎等技術官僚以務實化結合國家發展和國家競爭力的需求，成功地獨立於日語、德語、法語和其他的非美語系教育系統

### 第三節 暫時性高教員（先知型學者）的浮現

低教員是理性的批評者，亦是大學的核心。沒有低教員的存在，大學和公司或政府機關將沒有任何分別。但是，低教員們的批判有沒有來自時局的極限？難道低教員真能一下子直指出當局的最終錯誤，一下子修正到最完整的階段？

正當台灣的高教員為國際的科學與技術（其實是經濟）從屬地位擔心和奮鬥時，台灣的低教員正為著高教員所不曾擔憂的政治自由問題受到流血和監禁。台灣的例子說明了康德的基礎系所<sup>89</sup>能夠以理性批判高等系所，進而影響官僚和實業家的架構，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種本性的展現，而是Bourdieu所說的因為社會位置的不同所形塑出來的慣習。從光復初期的台灣來說，學者就很少批評高教員，而是直接批評政府官員。康德所謂的大學中「合法鬥爭」，以及藉由合法鬥爭來同時保障基礎系所的生存與政府的進步，在台灣光復初期並不存在。低教員，他們的知識本來與任何的社會實用性沒有關係的學者們，卻因為台灣早期的學術場域未能成熟到足以獨立自主（其實是相對自主性），紛紛轉型成具有某種社會理想性格，企圖批判或改革台灣的社會環境的高教員。這些暫時性、或是隱性的高教員常常被誤視為擁有純粹理性的低教員，主要是因為他們所從事的活動無法獲得任何的實質利益，也無法和任何國家企求的物質務實性結合，但是他們所從事的活動其實含有非常強烈的價值取向和理想性格，都試圖以他們所留學國外的生活方式和知識習慣為基礎，批判或甚至改革國內的政治、社會、教育上的問題。這種理性其實並不「純粹」。也代表著學術場域的發展需要一部份的成員將某種價值視為目標才能存在，在定義上也不是獨立的<sup>90</sup>。

<sup>89</sup> 如第二章所述，為什麼康德的基礎系所能以純粹理性批判高等系所，主要的原因在於基礎系所知識是沒有辦法被權力所籠絡的，因為哲學、數學、自然科學、人文學是沒有目的性的，所以不為任何目的而服務，自然也不會受到權力的青睞和人民崇拜的眼神。

<sup>90</sup> 過去描述學者在立場光譜上的不同，經常習慣以「左翼」或是「右翼」來指涉與國家結合或是反對國家立場；但左／右翼又有意識型態上的差異，通常指涉的是自由立場的立場與主張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前者要求的是建立一個言論自由、政治自由的制度；而後者則是要求階級平等，在光譜上，前者相對較右，後者相對較左。但是過去屬於威權體制下，無論是相對較右的自由派澄社，或是相對較左的台社，放在台灣的脈絡都是以批判政府為職志的學者團體。因為台灣的政

本章將這些教員們定義為「暫時性的高教員」（或第四章更貼切的名稱：先知型學者），有兩個原因：一方面他們的知識屬於低教員性格強烈的學科，無法直接被市場或國家使用，除非必需經過某種「實業家」的應用轉換才行，所以如果將他們完全等同於高教員並不公允；其次，他們會成為高教員誠因時代和社會的因素，如果台灣在政治、社會、教育成熟，這些曾經有留學經驗，或是閱讀廣泛的他們不會有著手投入社會改革或是教育改革的機會和可能。正因為台灣過去在教育與學術上完全依從於經濟發展，也正因為台灣過去仍然是威權體制，媒體、非營利性團體受政治掌控；這些全面性的社會千瘡百孔使得飽受影響學術場域無法提供他們安穩研究的空間，迫使他們必需投入「價值改造」的實踐，而不能以純粹理性進行學術研究。這是時代和社會的過渡現象，因此，本文中稱之為暫時性的高教員。

### 一、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暫時性高教員

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在光復初期至今投入社會改革的人相當的多。

在光復初期的政論家中，殷海光是相當為特殊的。殷海光師從金岳霖，在清華大學哲研所專攻西方哲學，後來在陶希聖的引介下在中央日報任職。因為寫了一些文章受到國民黨的圍攻而離職。1949年，在傅斯年的引介下任教於台大哲學系，同年，亦參與《自由中國》的編輯和撰文。

對《自由中國》而言，從籌畫創刊之初，即是支持蔣介石總統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以對抗「叛亂」的中共政權。「自由中國」這四個字所指涉的，就是與極權共產主義對立的自由主義中華民國。然而《自由中國》在成立當初還不是很能清楚地區分，「自由中國」究竟是國民黨當局的真正目標，還是為了蔣介石為了美援而求生存的手段：

在闡明反共抗俄的意義以外，我們最要緊的任務，就是督促政府的改進。…我們批評政府，有兩戒條：一、不作無謂的謾罵；二、對事不對人。在這樣的範圍中，我們因為要盡「知無不言」的責任，我們並不怕得罪人。……我們以督促為手段，以改革和民主自由為目的。我們以為必有督促乃有改革，必有改革乃能漸進於民主。或忠告善道，或提撕警覺，或當頭棒喝，都是我們督促的方式。我們所可自信的，我們出言雖慤直，然滿腔忠誠，無非為國家民族計。間有衝犯「各級政府」的地方，然

---

治脈絡，左／右的定義容易產生特殊性，很難與慣稱的左／右概念清楚的結合在一起。因此本文不擬以左／右的方式來形容「與國家結合的高教員」和「不與國家結合的高教員」。

只就事論事，絕沒有私人恩怨摻雜在裡面<sup>91</sup>。

過份理想而天真的期待，在國民黨遲遲不肯開放自由組黨、選舉、處處箝制言論自由、定期閱兵的作為下落空了。國民黨和共產之間的差異愈來愈小，愈來愈像個極權政府，「自由中國」的目標也愈來愈不存在。殷海光於 1959 年《自由中國》中提到，在 1958 年中美公報後，協定「不使用武力來反攻大陸」後，中華民國過去強加在學術、言論、政黨、經濟上的限制理由何在？

時到今天，幾乎台灣的一切官方機構，黨員享盡一切特權與便利，而非黨員則想謀一碗飯也很困難的事。台灣雖小，可是在世界實行黨化的國度中，卻是很占地位。凡些等等，都是藉「反共抗俄」這一項大帽子來進行的<sup>92</sup>。

殷海光

從反共產黨到反國民黨，《自由中國》中的論述幾乎是最早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其中殷海光的言論頗能表現出《自由中國》是如何與國民黨決裂的。

殷海光於 1952 年【我為什麼反共？】<sup>93</sup>提到「反對極權政治」，可算是他持以反共的基本語句。又於 1954 年【這是國民黨反省的時候】<sup>94</sup>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底下所實行的控制力量反過來傷害了民主。而分析得最清楚的是 1956 年【個人為國家之本】<sup>95</sup>中明白地說明「認為國家應為個人的利益而存在的，是民主政治。認為個人應為國家利益而存在的，是極權暴政。」將他對極權與民主之間區分說得非常的清楚。同年十月，於【教育部長張其昀的民主觀－君主的民主】<sup>96</sup>更是直接挑明了攻擊教育部長張其昀的「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諦，一曰愛民，二曰教民，三曰養民」其實都是一種君權思想下，將個人下屬於國家或君主的說法：

愛者與被愛者…是像老子和兒子之間的關係嗎？……如果不是的，那麼「民」不願被「愛」是否有罪？與愛民說一樣；誰來教「民」呢？…經濟的事，經官方過手，就變得事事限制…又如何「培養民力」？綜觀上面所說的「愛民」、「教民」，和「養民」說，其中含有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復古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國民經濟主義，尤其是

<sup>91</sup> 〈我們的立場〉，《自由中國》第5卷第1期。

<sup>92</sup> 參見殷海光，1990，〈自由中國之路〉，收錄在《政治與社會》（下），頁 771-780，台北：桂冠。

<sup>93</sup> 參見《自由中國》六卷十二期。

<sup>94</sup> 《自由中國》十卷十期。

<sup>95</sup> 《自由中國》十四卷五期。

<sup>96</sup> 《自由中國》十五卷七期。

「牧民思想」。然而卻找不到一絲一毫民主思想的痕跡，這是很令人失望的事。

（《自由中國》15卷7期）

儘管殷海光不只在《自由中國》撰文批判國民黨這十年（1949-1959）來所立下政治秩序是如何的同國民黨過去的政敵同流合污，甚至也認為「在野黨的出現，乃中國政治民主化之所必需」<sup>97</sup>，但是在雷震 1960 年 5 月發表的（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中，主張「這個新黨的“功用”，就是要用選舉的方式以求獲取政權為目的。」<sup>98</sup>之後，仍然表明他個人不從事任何實際的政治活動，因此也不會參與反對黨。其主要的的原因在於對殷海光來說，反對黨的存在只是為民主的政治秩序提供一個邏輯清晰且能「自由講理」的制度（錢永祥 1988：96），有了反對黨雖然不一定會講理，但是沒有反對黨肯定沒有講理自由。簡言之，殷海光認為講理的科學方法是要高於任何民主制度的。（錢永祥 1988）

<sup>99</sup>

殷海光作為「永遠的批判者」，非常類似於低教員的角色。在政治上，殷海光占據一個十分古典自由主義的位置，他所強調的「民主要能真正實行，必須講理。」<sup>100</sup>也就是說，講理是為了民主的價值，不是不為任何目的的。這樣的想法開始吸引當時生活在威權體制下大學知識分子的欣賞<sup>101</sup>。

《自由中國》在雷震和李萬居等人組成新黨，遭國民黨停刊後，學院中的批判力量漸消，此時的學院在生產出駁斥政府的知識時，是被視同叛國的。學術場域仍然無法建立起一種不會因為立場的不同而取消討論空間的局勢。學術依然無法自外於政治權力的威脅和影響。

《自由中國》之後，批判政府的聲音沉寂了一陣子。直到 1971 年發生釣魚台事件，由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講師王曉波，學生錢永祥<sup>102</sup>為主的保釣運動，抨擊國民黨無力保住釣魚臺列島；法律系學生洪三雄和錢永祥主持的《台大法言》（1972）訴求校園民主和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政治系學生吳叡人和許傳盛《大學雜誌》（1975）要求不要審稿的校園言論自由，一直到 1987 年解嚴後的野百合學運（1990）為止。批判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由這群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所發動的<sup>103</sup>。而對政府的批判仍然無法脫離言論自由和民意代表改選等憲政層次的問

<sup>97</sup> 《自由中國》二十三卷二期。

<sup>98</sup> 《自由中國》二十二卷十期。

<sup>99</sup> 亦可參考殷海光（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有思想自由不一定會有自由思想，但是沒有思想自由肯定不會有自由思想。」

<sup>100</sup> 《自由中國》，第十九卷二期。

<sup>101</sup> 例如第四章受訪者So4。

<sup>102</sup> 三者都是殷海光的學生。

<sup>103</sup> 這裡並非有意的忽略 1976 年《夏潮》雜誌社在人文領域中的重要性。這是個左派意識和批判帝國主義立場強烈的刊物，幾乎是最先介紹鄉土文學，以及第三世界發展理論和依賴理論之間爭

題。

1989年成立的澄社才算是一個完全由學者所組成的政治、經濟、社會改革團體。澄社的組成份子主要是留外（多數是美國）的社會科學家，當中除了張忠棟以及何懷碩分別是史學家和藝術家，比較傾向於人文學科外，其於創刊人士都是社會科學家<sup>104</sup>。

澄社創刊時，社長楊國樞在【我們為什麼要組織澄社？】一文中提到「過去的論政方式，大都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相互從未試圖統合。」也提到了「我們組織澄社的目的，就是要超越傳統『散兵游勇』的作風，凝聚多人的智慧，統合不同的知識，以發揮集體的力量…。」換言之，澄社與過去政治社會批評的方式最大的不同並不在於論政的角度<sup>105</sup>。事實上，澄社成立的要求有三：要求政治民主、社會公平和化解族群衝突；在實踐上要求「執政黨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放棄對政治與社會資源的特權壟斷、停止對社會體制的泛政治化控制，以反切實地回歸憲法與憲政<sup>106</sup>。

在活動的方式上，澄社並沒有自己的刊物，而是讓社員掛下「澄社」的名義，在各大報刊雜誌投稿評論時政。這種活動方式頗為類似胡適所謂的知識分子反對黨，或是費邊社（Fabian Society）<sup>107</sup>，在知識分子和官僚之間的界線定下的嚴格的區分，澄社並不要求社員不要參與政黨活動，只是一旦社員參政了，就必須退出澄社。在訴求的內容上，澄社與過去的《自由中國》、《大學雜誌》沒有太多差異，多從自由派的思考方式出發，要求政府撤回對人們自然權利的控制。

換言之，不管是從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的表現，或是1970、80年代學生運動所舉辦的《大學雜誌》和《自由之愛》來看，人文社會的知識分子和威權傾向的政府之間的鬥爭耗費了非常長久的時間和精力；結果當台灣在政治、社會上的威權力量褪去後，政治上漸漸脫離威權，符合一切自由主義想要的程序合理，有了定期的正當選舉、民選議員、強勢的反對黨後，讓國家成爲一個維持個人自由權利的工具性角色後，人文社會的知識分子似乎隨著國家擁有民主正當性愈來愈高而變得愈來愈沉默。正如瞿海源在（澄社十年）中所言：「在國會全面改戰

---

議的問題。只是這群人並非學院分子，雖然他們之中多數的學歷資格足以進入大學任教（例如總編輯蘇慶黎，台大哲學系畢，紐約大學社會學博士），但爲求資料說明的簡潔，在此留下一個遺憾，也算是本文未來發展時所可以伸展的路線。因此儘管《夏潮》對保釣運動之後的學運分子影響頗大，也很難將它考量在內。不過《夏潮》的立場和學運的立場就算不是非常接近的，至少也十分的支持學運。

<sup>104</sup> 其中，社長楊國樞是心理學，執委文崇一、葉啓政，財委蕭新煌、瞿海源是社會學，執委胡佛是政治科學，財委張清溪是經濟學。

<sup>105</sup> 事實上，澄社的社會政治評論一直都和殷海光一樣的自由主義精神。而自由主義精神同時也是澄社在創社時所依據的意識型態。

<sup>106</sup> 參見瞿海源，1999，（澄社十年），《當代》，141期。

<sup>107</sup> 澄社和費邊社的最大差異即在於參政與否和意識型態的不同。費邊社是積極參與的社團，但澄社是拒絕參政的；而且，費邊社是溫和的社會主義，但澄社是現代的自由主義。

乃至總統直選後，台灣表面上成爲一個民主社會，以爭取權力抗議威權的政治運動甚至是訴求，都已經沒有什麼空間。」<sup>108</sup>瞿海源所言的「空間」指的是澄社的「生存條件」，換言之，澄社即是透過「對政府的批評」，投稿在各大媒體中，才能在社會中占有位置的（低教員的出版）。

與澄社同期，甚至當時只有少數成員與澄社成員有所重疊<sup>109</sup>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88，以下簡稱「台社」），與澄社理念上不同，但從事相同的社會改革運動。正當澄社仍以民主政治作爲論述正當性的建立時（最後因爲民主正當性漸漸獲得而逐漸消去了論述的威力），「台社」開始出現大量與殷海光以來的自由主義論述不同的左派論述以及與解嚴初期的國家女性主義立場不同的性解放論述<sup>110</sup>，來爲公眾指出一個新的威權所在，並依賴對這個新權力的批判取得社會位置。

澄社和台社之間的交替<sup>111</sup>，可以從兩個層次上來區分：一、台社的成員組成有很多是助理教授和副教授，而澄社多由教授組成，而且許多甚至都是擔任學術行政工作多時，有豐富年資的學者；二、台社的論述早期和澄社差不多，但是自國民黨威權性格褪去，民粹主義興起後，台社開始有系統的出版關於台灣民主轉型，和新興的民粹式威權政體的問題<sup>112</sup>、科技與社會的問題<sup>113</sup>、性工作者、全球化議題、新自由主義的學術生產<sup>114</sup>。這些都是過去澄社很少碰觸的問題。澄社和台社雖然立場不同，但都是因爲對台灣社會的某些不滿而產生的學者團體，他們的活動足以標示台灣學者在選擇純粹理性的研究和社會實踐時難以區分的情

---

<sup>108</sup> 同上引書。

<sup>109</sup> 根據 2002 澄社資料和 2002 台社季刊第四十五期上所刊載的（含國外部份和編輯顧問）。同時參與兩個團體的成員有夏鑄九、李永熾。但是從早期《解構廣電媒體》的作者群看來，至少馮建三（傳播學）、王振寰（社會學）兩位學者應該也是重疊的。

<sup>110</sup> 如何春蕤，2003，〈從反對人口販賣到全面社會規訓的台灣婦幼團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與甯應斌，2003，〈排斥的公民社會：對近期台灣社會與國家之變化形勢的一個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兩文均指出自由主義所期待的市民社會的威權傾向。

<sup>111</sup> 其實很難將兩者有系統性的比較。因爲台社主要以學術性期刊發表爲主，它不僅僅是一種批判的力量，同時也是發表的學者們積累學術資本的地方。但澄社完全是以社會運動爲主。兩者都是以學者爲主要組成份子的團體。而且台社的學術發表通常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性，儘管是以學術論文形成發表的，其社會實踐的意圖仍然不可忽視。

<sup>112</sup> 如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期，17-55；趙剛，1996，〈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一期，頁 1-72。

<sup>113</sup> 如傅大爲、王秀雲，1996，〈臺灣女性科學家的九零年代風貌--試析「科學/女性/社會脈絡」諸相關領域〉，第二十二期，頁 1-58；蔡篤堅，2000，〈生命科技、衛生政策與市民社會：論文化霸權移轉之倫理意涵〉，第四十期，頁 181-223；第四十五期，「科技與社會」專題；周桂田，2004，〈獨大的科學理性與隱沒（默）的社會理性之「對話」——在地公眾、科學專家與國家的風險文化探討〉，第五十六期，頁 1-64。

<sup>114</sup> 同上引書，2004，第五十六期。陳光興、錢永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瞿宛文，〈反思學術評鑑與學術生產：以經濟學學門爲例〉；顏崑陽，〈再哀大學以及一些期待與建議——當前高教學術評鑑的病癥與解咒的可能〉。

形，以及人文社會科學在台灣發展的特殊脈絡。

## 二、科學家的暫時性高教員

因為李國鼎主導的人力計劃，台灣的「理工」一詞有了它的獨特意義，傾向於高教員式的社會位置。但事實上批判力道並不為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所獨有。以科學家和少許的科學與技術研究學者（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為主所組成的《科學月刊》<sup>115</sup>與《科技報導》<sup>116</sup>（因為兩個刊物都是由科學月刊社所出版，所以提到科學月刊社時，統一簡稱「科月社」）在 1980 年末和 1990 年代初期<sup>117</sup>連續兩次和國科會引發激烈的辯論。分別是 1988 年的人造衛星計畫和 1991 年的「SSC計畫」。

1988 年 9 月，李登輝總統命經濟部研究人造衛星計畫的可行性；同年 10 月，國科會和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組織了一個以成功大學航空暨太空研究所所長趙繼昌為首的人造衛星計畫小組。但經濟部的報告指出，自行發射人造衛星計畫的可行性非常的低，就連科技顧問組的外籍顧問也都不贊成台灣發展人造衛星計畫。然而，行政院長李煥於同年 8 月指示國科會進行科學用人造衛星計畫；9 月，李煥在立法院宣佈科學用人造衛星計畫成為正式的政策。政府將在五年內投資一百億元，計畫在 1994 年 7 月發射第一顆科學用人造衛星。結果便引發了大辯論。<sup>118</sup>

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於科技發展，理應科學家們雙手贊成才是。但是以科月社成員為主的科學家們，卻對科學用人造衛星計畫的決策過程提出質疑，而不是質疑計畫的可行性和投入經費的分配問題。科月社強調科技政策的決策過程應該要公開，而不是黑箱作業，這意味著科月社並不是以「科學」的觀點批評人造衛星計畫的可行性，而是訴諸民主；相對的，為人造衛星計畫辯護的成大航太所們，則是不斷以火箭和太空技術的科學理性作為論述中心。其後因為美國的壓力使得政府放棄了人造衛星計畫，但不管是成立計畫，或是放棄計畫，都沒有理會科月社要求民主程序的聲音。

---

<sup>115</sup> 科月社的科學家們和人文學者並非是可以孑然劃分的兩條線。事實上，《科學月刊》早期是由 1969 年，芝加哥大學物理所博士生林孝信等海外留學生，在「科學報國」的精神凝聚下成立的。在林孝信等人參與海外保釣運動後，海外留學生的護照被取消，學生身份也無法維持下去，生活條件受到威脅後，《科學月刊》遂將編輯重心移往台灣。保釣運動後的《科學月刊》，以「普及科學、介紹新知、啟發民智、培養科學態度」由上而下的「專家態度」為主軸。在內容上《科學月刊》十分的素樸，許多的文章都是將科學期刊中的公式、圖表、流程詳細的刊印出來。簡言之，《科學月刊》早期是一本標準專家教育民眾的科普讀物。

<sup>116</sup> 兩份刊物都是「科學月刊社」所出版的。

<sup>117</sup> 《科學月刊》和國科會之間的大辯論發生時間，幾乎和澄社、台社同期。不同的是，《科學月刊》早在 1969 年由一群留學美國的學生發起。其發刊詞中說道：這本刊物「不僅要作為學生們的良好課外讀物，也要成為一項有效的社會公器，不但要普及科學，介紹新知，並且要啟發民智，培養科學的態度，為健全的理想社會奠定基礎。」可見早期的《科學月刊》所定義的「社會公器」指的是一個科學普及的角色，培養人民的「科學素養」。

<sup>118</sup> 參見林崇熙，〈台灣科學用人造衛星計畫早期大辯論〉民八十二年九月十五日，《科技報導》第 20 版。

另一個事件，是 1991 年，旅美的中研院數理組院士李政道致函吳大猷院長和國科會主委夏漢民，促台灣加入 SSC 計畫。SSC 是美國所力主高能物理實驗的「超導超級對撞機」(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 縮寫。根據當時任職於中研院物理所，同時也是台灣投資計畫撰寫人的副所長李世昌說明，SSC 計畫是一個大的粒子加速器，建在北德州達拉斯附近。它是一個周長 87 公里的隧道，在地下平均約 50 公尺的地方，對撞機就是在地下。隧道的截面約兩人高，中間有 2 個空管子，粒子在裡頭跑，一個順時針，一個逆時針。在規畫中，兩個粒子會有兩個對撞的點，對撞時會發生物理現象，觀察這個物理現象就是計畫的目標。整個實驗室的建造部份有四個，台灣分配到的就是一個叫中央軌跡定位儀 (central tracker)，central tracker 的作用在於精確測量帶電粒子的軌跡，到了外面是測量光子、電子和所有強作用粒子的能量。這個部分美國估價是 5 千 6 百萬美元。我們參與的方式，除了費用外，還可以派遣一組 50 個人組成，其中 20 個是技術人員，30 個是高能物理人才，以十年的時間到美國實驗室學習。除此之外，也由中研院和大學教授成立一個工作組，每年 2-4 位學生讓李政道院士安排到美國各主要大學及國家實驗室，接受台灣最缺乏的高能物理博士訓練。<sup>119</sup>

當時，國科會內部投票，以 12：4 否決了 SSC 計畫。但是後來卻又重新召開公聽會，試圖重新凝聚共識。屬於科月社成員的劉源俊在公聽會上提出了程序問題：「國科會以前也辦過討論會，也經過的審查程序，再經過諮議會議，才做了決定，現在想要翻案，才有今日的公聽會。這個程序，是需要檢討的。」<sup>120</sup>

無論是「人造衛星計畫」或是「SSC 參與計畫」，都可以看到科月社的科學家們所佔據的社會位置是過去所看不到的一個改革者。這個社會位置，十分接近於《自由中國》、《大學雜誌》、澄社處境，是一種先知型，不為任何物質利益，而是為了一種理想而努力的學者類型。此時的科學家們處在一個相對於非民主式的威權決策模式中的對立位置，一個相對於威權決策模式拒絕告知、協商、取得共識，以少數占有權力的優勢位置恣意決定公共問題的對立位置。過去的科學家長期地處在受掌權者的優渥對待中，而科學家也長期習於接收掌權者的任務，作一個服從於國家科學獎勵系統的「素樸」科學人，不會對政策的決策過程有過如此公開且集體的質疑和監督。

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暫時性高教員一樣。自然科學的暫時性高教員也一樣具有不為物質利益而服務的傾向，從教改、科月社、人造衛星計畫、SSC 參與計畫來看，科學家們所從事的社會改革活動儘管不同於人文社會科學者所從事的民主化改革，但他們秉持著科學素養的信念正和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民主素養信念互相輝映著，都是因為市民社會對民主和科學的渴望而產生的驅動力。

---

<sup>119</sup> 參見民八十二年四月十五日，《科技報導》136 期，第 5 版。

<sup>120</sup> 出處同前，第 12 版。

## 第四章

### 台灣(北部)學者的學術態度與價值測驗分析

#### 第一節：學者的意見

訪談學者和其他以訪談進行的研究最大的區別，在於很難區分你到底是在進行學術研究還是在學校上課、受教。一般而言，社會科學研究者需要建立自己的研究主題和問題意識，研究者也需要有自己的理論架構和研究方法，而這些部分通常不會有問題，因為除了純粹的理論性研究外，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研究對象幾乎都是學術資本低於自己人們或團體，他們也許會拒絕研究者的問題，但是較少能夠挑戰研究者根據學術理論和方法而建立起的客觀位置。

但是研究最精於研究的人們會動搖原來研究者的位置，使研究者原本應該處在的「旁觀者」位置變得難以拿捏，有時候受訪對象會以反諷或是逐客的態度回應研究者的訪談問題，這完全是一種學術資本的優越條件所造成的反應：

多謝您的信，也請給我你的資料，如家庭背景、求學歷程、人生志趣等等，以便決定是否適合接受訪問。另也請提供所及老師之電話，以便確證。

謝謝。祝好。（未訪談，生／醫類學者）<sup>121</sup>

受訪者：我常常在想，既然台灣的科學思考那麼不發達，大家都相信占星、風水的，我不如來創一個科學教…。

訪談者：你認為你過去出協助出版這麼多的科普書籍，跟你的這個想法相關嗎？

受訪者：你想太快了！好了，你今天擔誤我一個下午的時間了。（訪談問題尚未結束，離約訪中預定時間也還有半小時）（Sc4，大氣科學學者）

有時候，受訪者所說的話很難區分到底是研究者處理的資料還是上課的講義：

雖然是學術界，但是還是脫離不了一般社會文化的畸型，心理上很大程度是一種官本位階層化的東西，聯考就是這樣，什麼國科會、算點數啦！這都是形式主義，坦白說我在別的學術界都沒有看過這種風氣，你用形式化的方式來

<sup>121</sup> 在我回信允諾接受他的問題後，這位受訪者最後並沒有回信，因此並不是受訪者之一。

建立一個階層，這很畸型，這是第一個我不喜歡的。(H4，歷史學者)<sup>122</sup>

法不是倫理，你要注意一件事，在法理學上法不是倫理，法在某些地方比倫理的要求高，有些地方比倫理的要求低，就是其情可憫，其刑也可免，但是只要他的行為造成社會的恐慌，法律一定要制裁，楊儒門事件就是這樣。  
(E5，工程學者)<sup>123</sup>

所以我覺得你的問題有點龐雜，我沒有辦法答你，不是拒絕答，因為我感覺不出來這有任何的意義。(Sc3，化學學者)<sup>124</sup>

受訪者：那你要證明什麼呢？

訪談者：我要提出的是知識的基礎在於社會，所以要去問學者們他們的出生背景是什麼？他是怎麼選擇他的專長的？他的價值判斷是什麼？他的社會參與又是哪一類？

受訪者：可是你問我的大部分問題都不回答這個問題，我不覺得有啊！（C3，商管學者）<sup>125</sup>

在研究進行訪談的題目中，有許多都是受訪者專精的研究項目，尤其是對史諾的兩種文化議題高度關心的科學家 and 人文學者們，以及對某些社會問題多年研究的學者<sup>126</sup>，當問題落在他們身上並且提出他們的看法時，研究者要如何看待這些「訪談內容」？這到底是一種知識，亦或是一種意見？如果視其為知識，那麼無可避免的，受訪者的回答便需要被拉高到一個客觀的位置，使他個人存在於社會上的出身、背景、利益、策略、位置全部和他對問題的回答脫勾；如果將他受訪的回答視為意見，那麼他個人存在於社會的一切便可以建立起關係。

因此，為了把學者降格，把學者們的回答變成不是來自客觀邏輯分析下的知識，而是個人過去的家庭、學校、社會養成下的意見和態度，研究者必須要時時提醒受訪者必須根據他自己的個人意見來回答。許多時候，受訪學者們會

---

<sup>122</sup> 在「在台灣最反感的學術風格？」問題下的回答。H4 歷史學者的訪談內容成為第三章分析台灣學術與外部社會結構時一個重要的概念。

<sup>123</sup> 在「對犯罪問題的關心」問題下的回答。受訪者連續兩次告訴研究者這個問題不明確，以及為什麼這個問題不明確，並且透過這個問題給研究者主動的上了一課，告訴研究者你所問的犯罪在法理上和倫理宗教上的不同。

<sup>124</sup> 在「什麼事是做研究時最感到被打擾？」問題下的回答

<sup>125</sup> 這是受訪者主動詢問的。新細明體是研究者的回答，標楷體是受訪者的詢問。兩人的位置和決定問題正確性的角色並不若單純訪談一般受訪者那樣的穩定。研究者的問題和推論反而成為受訪者的興趣，研究者反而成了受訪者。

<sup>126</sup> 如E5 曾經受邀到國外演講兩種文化的討論，So3 則是澄社的成員，也出版過不少關於社會問題的分析。

分不清楚這一點，而希望研究者把問題侷限到他能夠逃避個人意見或背景的范围：

研究者：「你」認為華語世界出現過你心目中的知識份子嗎？

受訪者：你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是什麼？

研究者：那要看你個人的定義了。(E3, 電信工程學者)<sup>127</sup>

甚至有受訪者會拒絕所有個人範圍的問題：

你去請我的助理談，我不能夠寫這些東西，因為這牽涉到我的配偶，我太太不會肯的。你為什麼談這個東西，這個東西無關啊！這東西牽涉到我父親的隱私，這關你什麼事呢？你為什麼要問這些東西？(E1, 資訊工程學者)<sup>128</sup>

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得逃避或拒絕任何指向「你個人」的問題，也逃避或拒絕任何以「我自己」為出發的回答，使得學者的論點失去了主觀性，進而建立起客觀性，這是因為受訪者不自覺得召喚出「學者」在社會上的位置，而對所有出自於自己的語言，全部加以知識化，讓意見變成脫離說話者自己社會關聯的知識。不過多數的受訪者不會對訪談問題採取明顯而直接的拒絕，而是以一種「知識的修辭」來隱藏他的意見，例如利用分類、條件化來回避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絕對喜好，甚至忽略了原來問題的重點在於「你的看法」而不只是「你的分析」：

你對學者上媒體有什麼看法？

我不會覺得不好，但是有兩個 condition，第一個 condition 就是他必須誠實，他必須誠實的原因是說，因為他專業的成就，讓他具有某種程度的可信度，為什麼人家找學者上電視，而不是找政府官員，因為他覺得政府官員講白賊，所以才會找學者。……第二個 condition。就是他對事情必須有充份的了解，我常常跟學生講，好的教授讀書半年可以講一個小時，可是電視上有些人讀書一小時可以講半年，任何事情他都是懂皮毛而已。(E2, 力學工程學者)

這並不是說學者們以自己具有邏輯性或思辨力的回答是一種逃避自我的謊言，所以才需要被揭露，而是說學者在社會上的角色本來就是「以超然姿態發表具有影響力言論的人」，他就是講些話的人，而他的話就是知識的候選人，因

---

<sup>127</sup> 在「你個人最欣賞的知識份子」問題中的回答。

<sup>128</sup> 最後E1 受訪者的個人資料和背景並沒有完成。

此研究者必需把學者的地位降格成受訪者、把他的訪談內容降格成一種意見，並且利用這種「社會還原」(social reduction)的動作，描繪出學者身處的社會上的意見光譜位置，我們才有能力掌握學者的論述(知識)背後生成的社會條件，也不會落入純粹邏輯性的討論知識內容的區分，把知識當成毫無社會背景的產物。

## 第二節：初級分類

第一、第二章的部分曾經討論過，史諾的兩種文化並不是區分兩種知識，而是兩種知識的社會效應或社會貢獻(能使國家富強的知識 VS. 不能使國家富強的知識)，這和高教員和低教員的區分十分的密切，主要在於高教員具有一般人所關心事務的本領，一般人關心所及事項雖然不同於國家富強的事務，但必需注意到十八世紀以後，拿破崙式的工藝學校在全歐洲興起，各式軍事、工程、金融等對國家實力有直接幫助的學科，部分或全部的取代了傳統的高教員學科(法學、醫學、神學)而成爲顯學，因此康德的區分方式以現代的情形來說，高教員的本領就是能幫助國家富強的學者，也是史諾心目中骨子裡有未來的科學家。

但是康德的區分只是首先概念上的，但是在現實上來說，許多的學科知識未必能清楚的掌握出和它們在社會位置上的不同，而這是完全隨時間或地域變化的。最明顯的就是從二戰後期美國物理學的昌盛，到八〇年代、九〇年代末期的失去國家的重視；以及從台灣在七〇年代後半導體產業所帶動的電子、電機、資訊工程學科的發展，一直到二〇〇〇年後開始重視材料科學和生命基因科學後，都可以強烈的代表「高等系所有一天會變成基礎系所」的預言，沒有什麼學科知識一定會永恒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青睞和關愛，也沒有什麼學科一定永遠被國家和社會忽視；被忽視的知識依舊還是真理的表現，只不過沒有實現的空間和條件。所以首先這個概念上的區分應該被放在歷史資料上來討論，以展現不同時間點，不同地點的高低教員區分會有不同的學科組合。但是其次，如果只是把高教員和低教員以學科(而不是學術的態度或精神)的方式區分出來，恐怕無力掌握不同的知識對學者個人稟性上的內化影響，這樣的錯誤不是容易把學者在學術之外的社會表現或社會意見，以不是「知識」爲由排出分析之外，視它爲不會影響個人親近特定知識的特質，就是視知識爲不需要社會條件或沒有社會作用的東西，但而這些「個人」部分所能呈現出來結構訊息並不下於任何的「結構」分析。

這裡首先可以看到，在個人層次上，由於高教員的學科和國家競爭力或是社會實用性密切相關，所以無可避免的，高教員必然是忙碌的一群(相對於低教員來說)，或至少是學術領域中時間緊湊性和彈性最接近學術領域外的一群。

在這裡分析的方式並不需要完全約束在訪談的內容上，對研究者來說，訪談的邀請一寄出，受訪者無論是否允諾進行訪談，或是拒絕，或甚至是不回應，研究的對象就開始透露出可作爲研究資料的訊息：

表 4-1：訪談結果比例

	科學	工程	生／醫	商管	社會	人文	總數
寄出	9	23	13	60	17	19	141
同意	6	5	5	4	5	4	29
不同意	0	2	5	15	3	6	31
未(明確)回應	3	16	3	42	9	9	82
同意／寄出比	66.67%	21.74%	38.46%	6.67%	29.41%	21.05%	20.57%
明確回應比	66.67%	30.43%	76.92%	31.67%	47.06%	52.63%	42.55%

按康德區分高教員的知識，是親近於國家和社會實用性的，因此其學者從事學術的時間安排比較接近一般事業或職業的運作，因為他必須不斷的應付國家官僚和市場上資源來源的需要，因而生活的相對時間非常的緊湊，所以必須慎選和安排他每一天的時間，以應付這個領域短週期性的競爭。我們可以看到表 4-1 所示，商管類學者顯然在同意的比例（6.67%）要遠低於其他類組，而商管類學者忽視的比例（68.33%），以及工程學者忽視的比例（69.57%）也一樣要高於其他類型的學者。外部競爭的壓力、時間上的緊迫、日常事務的繁忙會給他們造成多少的壓力，使得商管和工程類學者傾向於將研究生的學術性邀訪視為等同於其他的廣告信件？我們是無法以心理學的動機來看待學者拒絕或不回應的原因，而是要以社會學的觀點來分析。因此必須更加細緻地處理人文和商管拒絕的方式上和內容上差異：

您擬訪談內容因部份涉及私人讓我覺得不自在. 因此經再三思考, 覺得還是歉難接受您的邀請. 我深知研究工作相當重要, 而研究資料之取得也自然相當重要. 如果您只談台灣哲學界近年來之發展, 我倒十分願意提供一些管見. (未訪談, 哲學學者)

我覺得在您的研究中，所訪談的對象應該是台灣人文與自然科學界裏各個領域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我個人十分慚愧，毫無學術成就可言，更遠不足以代表台灣的歷史學界發言，實在不敢輕率接受您的訪談——貽笑大方尚屬小事，若影響到 先生論文的成敗，則罪無可逭也。盼望 先生再仔細考量一下採樣訪談的標準與對象。(未訪談, 歷史學者)

I have a tight schedule and need to say sorry to your thesis interview. Good luck on your thesis. (未訪談, 會計學者)

Many thanks to your interest. I don't think I have time for such a long interview. There are too many students waiting to be graduated and this is the most busy season for me. (未訪談，管理學者)

I'm honored to be chosen as your interview subject. Since I'm pretty busy for the coming two months, I may not have time to meet with you. I hope this won't cause any inconvenience to you and your thesis. (未訪談，會計學者)

形式上的客套禮貌、接近商務談判式的口吻，例如「很抱歉」、「祝你好運」、「我非常的榮幸」、「謝謝你的注意」，卻沒有任何個人興趣與否的陳述，是構成商管類學者主要的拒絕方式，這是一種由外務或工作上的純粹匆忙所構成的理由，完全沒有任何個人對此邀請的興趣判斷；然而人文類學者拒絕的理由則是來自個人對此主題的「不欣賞」或「個人不安」。對於拒絕理由的發動，商管類和人文類學者的差異在外部工作和內部個人習慣之間出現明顯的不同，這是兩類學者所處的社會位置下的產物，由於商管類一直將學術的目標指向外部社會或國家的實質獲益，因而在稟性（disposition）上呈現出類似業務員、或企業主的模式，傾向於一種形式上的熱情拒絕，拒絕的理由是他很忙，而不是沒興趣；相反的，人文學者則呈現出一種實質的冷酷拒絕，拒絕的理由明顯的是來自他個人的判斷，而不是外務的受迫。

並不是所有的人文類或社會科學學者都會以同樣的理由拒絕？

看了你的訪談問題，覺得沒有什麼可說。謝謝來信。  
(未訪談，人文類院士<sup>129</sup>)

您好！我是 X 教授的助理，X 教授不擬接受您的訪談，謝謝！（未訪談，社會科學類院士）

老師覺得你所選擇得題目確實深具意義，很值得鼓勵並協助。然而由於擔任 XX 社長之故，工作時間壓縮的緊，恐怕無法配合張先生的訪談規劃，還請您諒解。希冀張先生的研究一切進展順利。(未訪談，哲學學者，院長兼重要社會運動社團主持人)

---

<sup>129</sup> 由於中央研究院人文類院士人數少，如果標列出未受訪者的學科或學門，恐有被指認的可能，故以「人文類院士」保護未受訪談者。

謝謝你的訪問計畫。不過我最近非常忙，恐怕無法長談，是不是暫作罷論？（未訪談，人文類院士）

只有院士或是外務工作繁忙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才會用這麼形式上的禮節來應對，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似乎必須要到達一定的學術成就（院士或院長），或是一定的外務繁忙才會出現以形式為理由的拒絕。學術成就和外部事務的累積會使得人文學者的拒絕方式接近商管類學者的拒絕方式，高低教員之間拒絕方式的差異因為學術成就和年資的增加而消失，這明顯的呈現出某些特性是高低教員之間的顯著差異，而當這個特性的差異消失後，知識沒有社會立即實用性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類學者會接近於商管類學者。那麼到底人文學者透過官方認定的學術成就和年資上的增加後，到底獲得了什麼東西，使得能使他的稟性接近於商管類學者？

這個簡單的比較在於為下面的分析作一個暖身，由於過去區分知識差異或鴻溝的討論多半著落在知識內部或是學科的差別，因而容易受到誤導。這個初步分析的目的，在於說明高教員和低教員的差距不在知識的內容，也不在知識的對象，亦不在知識的進行過程和方法。例舉商管類學者和人文、社會科學類學者的目的在於突顯出知識內容接近的兩個類別<sup>130</sup>卻在心性上、處事態度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差異並不是出自於某些「個人習慣」<sup>131</sup>。對社會學來說，生活習慣、對話習慣、甚至拒絕的習慣經過了漫長的家庭和學校的社會化，早已不是一個個人單子式的產物了。

在國科會或是教育部的統計分類上，人文和社會科學類中一直將商管放入其中，如果看到九〇年後大學基測的錄取方式，商管類只計算國文、英文、數學三科，而不接受任何第一類組學生在歷史和地理科上的教學成果，我們就能夠知道，商管學科與人文社會科學在知識和方法近親其實是從完全不同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社會條件中生產出來的學科。活在這個學科，或是靠這個學科而活的學者儘管從事一樣的對象認識、進行類似的方法和研究過程，但兩者對知識的社會目的有著極大的差距，這樣的差距會對他們的生活慣習產生什麼影響嗎？

### 第三節 訪談分析

訪談的內容主要的問題是：文化教養的差異和學科選擇和學術態度有何關聯？來自家庭的期待（經濟的或文化的）又會對學科選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決定要走理、工、醫、商、社會、人文甚至藝術，是「個人性向」或「天性」的自

---

<sup>130</sup> 兩者的知識對象都是人事，而不是物；知識的構作有其強烈的特殊性和地域性，沒有完整的普遍性。

<sup>131</sup> 對社會學來說，生活習慣、對話習慣、甚至拒絕的習慣經過了漫長的家庭和學校的社會化，早已不是一個個人單子式的產物了。

由發展嗎？又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去合理化他的選擇？這些理由，又是從哪裡學到的？社會學無可避免的要把所有個人化的事物全部社會化，指認出它的社會條件：家庭出身、家學、教育、文化養成，這已是一整套社會過程了，只是覆蓋在「個人性向」之下被掩蓋，委婉的表達了科系決定的差異。

問題也許不若研究者天真設定的那麼簡化：階級文化、專長知識的選擇、社會的實踐、價值意見的判斷也許不是一條直直的線，且也許一個小小的經歷會使得人人羨慕，讓學校驕傲的貼出大紅榜，本來擁有大好前程的理工科學生變成一個積極的社會運動者，和他那科技新貴的大學同學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擁有不同的理想；人生充滿著不確定，不是嗎？可是，這樣一個不確定性若沒有某種特權的寬容或是自由的信任，又怎麼會被把握住？誰的家庭能給寬容，誰的家庭不能給？這當然涉及生活條件的緊張和急迫是不是會直接衝擊著家庭。

學術和藝術同樣在十八世紀受到布爾喬亞民主化的影響，慢慢的不再是貴族的特權所唯一享用的，普及到社會、大眾上，成為從事各行各業的分類基礎，也成為意見發佈的來源。大眾藝術的興起和普及大學的興起一樣，慢慢的將人類文化最燦爛一部份分配到整個社會中，當然也一樣的分配不均。只是因為學術傳達的是真理而不是美感，它比起藝術更積極的說理和證成，因而也普及化的最快。但是普及化並不代表同一化，例如 Bourdieu 所分析的美感品味再現了階級的生活位置，儘管因為藝術的大眾化，卻不代表所有人都有能力和機會感受一樣的美學意義。同樣的，文化階級的差異是不是也會產生不同的學術態度？

文中的分析，受訪者回答的內容一律以「標楷體」呈現，訪談者的問題則以「新細明體」呈現。分析中共訪談 29 位學者，其中 28 位都是在大學或是研究機構任職，有一位是退休教授。訪談的學者依科系種類劃分：自然科學 (Sc): 6 位、工程 (E): 5 位、生命/醫學 (MB): 5 位、商學管理 (C): 4 位、社會科學 (So): 5 位、人文 (H): 4 位。

### 一、務實型學者 (Scholars of Practicality)

若說工(程)學是台灣的經濟命脈，一點也不為過。從李國鼎創立的科學園區而使得電子、電機、資訊產業成為國際間首屈一指的代工國家開始，工學任務就是經濟的，而不是知識的。商學的情況也是類似的。這兩個分居國內大學聯考第一、第二類組最高分排行榜內的學術領域，有別的學科所沒有的高度社會期望，他們所生產的知識，是和一般國內人民的想像最沒有差距的，也是最容易再現根本需求的。這些康德所言的「光環」(miracle circle) 會不會影響他們從事學術行政、和學術研究的態度呢？<sup>132</sup>

---

<sup>132</sup>在本章第二節的部分也可以看到工學和商學都是接受(比自己學術資歷低下)的研究訪談意願最低的一群。而且事實上，本文雖然訪談了五位工學教授，但其中一位自稱「本來要讀哲學系，是因為台灣的文科沒有社會關係就沒有前途，而理工科起碼還有一技之長可以混飯吃」，選理工

E2，應用力學學者，高中就讀建國中學，父母親皆是勞力工人。小時候功課良好，大學填志願時家裡並沒有意見，因為他自己也沒有意見，大學志願完全是按照得分落點分發下來的。之所以會出國攻讀博士，E2 有一個很戲劇性的轉變：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想到要出國，因為我大學時我父親有很多債務，那時候就是想我趕快畢業，就是就業，就去賺錢還債，其實會誘發我出國真正的原因是一個偶發事件，我在圖書館唸書，我有一個同學就坐在我前面，女生不同當兵嘛！所以他們大三就在唸托福了，準備考出國的考試…，所以那時候就想想，如果能申請到獎學金，就出國看看，就是這個原因，我回家就跟我爸媽講說，結果我爸媽就跟我講說，反正家裡是經濟情況不佳，但是如果你有辦法靠自己的能力去，你就去，就這樣。(E2，應用力學學者)

讓他出國的理由是因為同班同學準備出國考試的刺激。這不會是因為華人可以拿物理學獎的民族偶像刺激，而是人與人在社會地位上的競爭的刺激。

上進的 E2 最讓他得意的行政工作是成立奈米研究中心：「那個研究室 set up 起來，一年大概有兩百個研究生在那個實驗室 research，所以對我來講，這是一個有意義的事情，你是在培養下一代，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實驗室的話，他沒有地方去，不然他就要去新竹，這個實驗室 set up 起來，他就可以留在這裡，我會覺得這對下一代的教育是一個 contribution，所以我會花時間。」讓學生有一個好的環境是他投入學術行政的原因。

E3，工程學者，高中就讀台中一中，父親是日據時代的商職畢業，在台糖工作。和其他的學者一樣，小時候功課就很好。大學選填志願時是「因為我是民國五十多年的時候唸高中，哪個時代會認為男孩子比較可以唸的，就是唸理工，不可以唸的，才是去唸文法。……那個時候沒有落點，因為沒有電腦，爸爸選好志願我照抄而已。」選科系並沒有明確的目的，完全是依照升學主義的期待。因為大學畢業時沒有申請到獎學金，而暫時工作。會投入學術工作是因為在工作期間「我發覺在那個時代唸博士好像滿有效力的，不管他有沒有那個 talent，博士的光環確實是…，唸了個博士好像得了個諾貝爾獎，講出來的話像聖旨一樣，所以我們就來…當然還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大學、碩士學辛辛苦苦學的東西幾乎

---

科只是為了混飯吃，事實上他的重心是在社區大學上；另一位是著名都市社會運動團體「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的要角之一，他所挽救的建築和都市景觀比他蓋得還要多。這兩位都不是我們所列入的低教員，因為他們對學術行政的態度，以及對學術目的性的態度完全不同於另外三位。如果扣掉這兩位，工學教授同意接受訪談的比例只有 14.28%，和商學的 5% 同為領先群。

快忘光了，做事又用不上，覺得很可惜。」無論是攻讀博士之後的光環，或是學有所用，都指向了將知識工具化的傾向，和知識經濟的論述一樣視知識為提升地位的工具。

沒有任何社會運動參與的經驗的 E3，儘管他坦言行政的工作讓他感到不自由，但是他仍然歷任所長、系主任，甚至主管學校研發計畫的最高職位。而且認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因而他願意去做：

研發長就是跟教務長一樣，而且這是研究型大學，研發長非常的重要，我個人覺得非常重要的，它管學校的智慧財產權，管學校的國際合作，管學校的研發計畫，建教合作、創新育成，替學校賺錢，就是因為太忙了，我做了兩年就跟校長請辭了。當研發長我是自願的，那是一個比較高的位置。(E3，工程學者)

在提到他對犯罪問題的意見時，他對這種議題成為社會爭議有一種不滿：

我是不曉得為什麼當兵要留下指紋，但是如果為了治安的目的，這已經做了呀！這是一個作法上的問題，為什麼要把這個問題弄得好像這是一個嚴重的議題，我就覺得，為什麼每次一件不是太困難的事情，都變成這麼嚴肅的問題？弄得大家花費很大的成本去討論這個問題，就好像一個家庭一樣，每次都把一個不是很重要的問題拿出來討論，大家都是精神緊繃的在討論這個問題，我覺得我不願意再看到任何消息是這樣子的。很奇怪，為什麼很多的問題都要動用這麼多的力量去完成他，好像這樣這件事才有辦法做得成，為什麼不會很簡單就做完了，我們社會付出很多的成本，我們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人家國家都在進步，我們都沒有在進步，或者是說進步緩慢，我當兵時印象最清楚的一句話，就是進步緩慢就是落伍，我們的國民所得已經十幾年沒有增加了，為什麼每件事情都要耗費這麼大的成本來完成它。你要按指紋我們當兵時都已經弄了，有前科的人叫他多按幾次啊！腳趾也都按，他也不會有意見，就把它建檔啊！為什麼這東西還要按指紋，我就不太懂。(E3，工程學者)

「這種問題有什麼好討論？討論這個問題不是需要很大的社會成本嗎？拿

這些力氣來解決更務實的（經濟）進步不是更有用嗎？」這是一種卡西勒（E. Cassirer）稱之為物理主義的態度，面對著錯綜複雜的「戈爾迪之結」<sup>133</sup>（Gordium knot），捨棄了從事仔細拆解的方式，而是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把問題去除掉，這個問題根本不需要拿來討論就可以作了，因為以前已經有指紋資料建檔了，可以直接把這些資料給數位化即可。

因為行政對學校的將來重要，而強迫自己接受了兩年的行政工作；因為我們的社會成本有限，而不去理解指紋資料庫在國家治理上的妥當性。他的知識和判斷都有化繁為簡到極點的為一個目的而服務的傾向，因而具有清晰和明瞭性，但也因為目的清晰和明瞭，而失去了一個沒有目的的討論空間，斷絕了思考另一個目的的可能。

C3，管理學者，高中就讀師大附中。父親是貿易商人。國中讀師大附中升學班的他，沒有過高中聯考的升學壓力。他說小時候讀書非常的自由，運動時間很多，反正不必考高中。是一直到高二要考大學，才開始認真讀書。會選擇管理，是因為那間學校企管系的「師資是全國最好的，家裡很鼓勵，唸什麼都可以。」

在問及他對指紋資料庫的看法時，他坦承他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太多的了解，不是很清楚這個事實的因果性，他不是那麼了解一個指紋資料庫如果被破解了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或是這樣的資料到底會被挪作何用？但是他個人並不認為有什麼很嚴重的後果：

基本上我初步覺得，應該不是很嚴重吧！因為人家偷你指紋很容易，你杯上就有指紋，大人物的 DNA 很容易，到理髮廳去，不是很容易嗎？你大人物不是拒絕驗 DNA 嗎？理髮的頭髮找來就有 DNA。監視器的部分也還好，不是那麼嚴重。我不會覺得反感。

（C3，管理學者）

到底會造成什麼傷害呢？這個何等直接的挑戰！頂多不就是個人資料被賣出去，家中的信箱多出了一些廣告，逃稅時政府很快就會寄補稅單給你，犯罪在逃時可能很難出入境，不就如此而已？對他而言，知識再現的是立即的需求，連於著他所運用的知識判斷都是為著這樣的目的而服務的，也因此他認為國內的學術最大的問題不在學術無法創造新的知識，而在於知識無法回應社會立即

---

<sup>133</sup> 參見Cassirer, 2004,《人文科學的邏輯》，p69。戈爾迪之結出自亞歷山大大帝的故事。傳說古代有一個Gordium的城邦，曾經編織出一個非常錯綜複雜的繩結，並有巫師預言若有人能解此結，他便將成為亞洲的統治者。後來亞歷山大看到些結實在太複雜，便揮劍將結斬開。有暴力而不是用智慧解決問題的隱喻。卡西勒以此暗諷以自然科學的態度來解決文化問題時，表面上剛毅果決，但實則簡化魯莽的意味。

的需求：

高等教育不是研究高深的學問，我們高等教育應該是「培養國家建設的人才」，這比較重要，國家建設的話你就要了解什麼是國家建設，從經濟、政治、社會的建設需要人才，我們需要怎麼樣的人才，你怎麼樣去培養這樣的人才，我們的老師需要教什麼東西，資金應該怎麼樣分配，理念上應該是這個方式過來。(C3，管理學者)

所以大學評鑑應該：

指標不能太 bias。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市場力量要進來，學生的就業、學生的滿意應該把他放進來，學生的就業，跟 employers 的滿意應該要把它放進來，那才是國家積極的作法，employers 就是說，政大的 MBA 台大的 MBA 到企業去做事，如果你的樣本夠的話，你可以看到我們這些 employers 們，MBA 的滿意程度，他的滿意程度可以給我們看，我們再去改，我們會去看我們吃虧在哪裡，這個數值出來以後，可以讓很多考生知道，所以你常說名校好，我們迷信名校，就是因為資訊不全，如果 employers 覺得社會系、心理系畢業很好，我們就不要 MBA 啊！很簡單的事。我個人覺得就業，跟 employer 的意見才是最重要的，雖然不是唯一的一個評鑑的指標。那才叫培養人才嘛！否則你說我很棒，我一年發表十篇文章，那又怎麼樣呢？我又沒有教學生，不然就是教的學生莫名其妙。這樣的教授是國家應該去鼓勵的嗎？(C3，管理學者)

和品味的文化資本理論不同的是，這些把知識的目的放在再現社會（立即）需求層次上的學者，在面對這些社會上爭議的問題時，回答得一點也不謙虛，我們完全看不到朱元鴻在《這雙腳所經驗的階層：審美語言分析》中，對黑白照片中的雙腳只能侷限在天真再現的內容的文化階層，因為自己對這張照片的回答過於侷限，而感到不適合發言；只看到戈爾迪之結再一次被斬斷。面對龐大而未知的知識文化沒有任何的疑惑，沒有一絲的猶豫，直接以立即的社會需求來斬斷這些問題的原初脈絡。

MB1，藥理學者，高中就讀北一女。父親是地方警察單位中階警官。從小功課就好，父母很少管。考高中時是全校四位北上考北一女的學生其中之一，

因為家貧，其他的兄長都去從事軍職，只有他靠大學時家教的工讀過活。對於為什麼選擇藥理系，是因為過去「丙組裡面，醫學系是第一志願，藥學是第二志願，而我不敢填醫學系的原因是我怕打針和解剖，那時候很多怕打針和開刀的學生，所以就填藥學了。」沒有其他非學術性的社會參與經驗，但對於學術行政工作也非常樂意投入，因為「這其實是一個服務，我也樂於作這些服務啊！有時候不能一直在實驗室作，有時候也要作一些服務。」得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的他坦言「人文學科有成立的必要，但是台灣的人才你去算，就像我們醫學院要培養多少個醫生它也會去算，所以醫學院不會讓你一直蓋一直蓋，將來醫生培養出來超過你台灣能夠負擔的，那就不好了，所以我覺得整個台灣能培養多少個人文的，你教育部要去算，中文的、社會的有多少個畢業生，要去算啊！算一算如果也飽和了，也不要再去增設了，不然這些學生畢業出來要去哪裡？」學科的發展是需要從社會需求的角度來決定是否繼續下去，而且國家也應該對這些系所的成立予以管控，大學教育本來就應該為市場做準備：「難道不是這樣嗎？他去讀大學、讀研究所，難道不是為了他的就業作準備，以後更好升遷嗎？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像王永慶那樣的人很少吧！」而且不只教育，學術也是：「我們台灣的生技業要發展，生技學者一定要幫助他們，一定要幫助產業的啦！所以台灣的生技好像還在起步，沒有那麼蓬勃，所以我們的國家型製藥才要研發什麼樣的產品，讓那些廠商來承接，這也是經濟部的考量啦，它是希望來扶植台灣的生技業，我們的電子業不錯嘛！可是我們的生技業也明顯不夠，這是需要努力的。」

務實的態度不只反應到他選擇科系、從事行政義務性的工作和對學術發展的意見，也反應在他對爭議性的價值問題上（指紋資料庫和監視器）：

預防不了啦！我覺得那些東西預防不了啦！我如果真要犯罪的話，我可以戴頭盔，你什麼也照不到，我真的有意的話，我也可以戴手套進去犯罪。

（MB1，藥理學者）

倒不是因為這項政策過於粗糙，使人們過於依賴政府的指示和教條而讓他感到不安；而是因為這項政策「沒用」（或是直接的說，抓不到犯人），而且浪費公帑。並不是不贊成這種解決犯罪問題的動機，而是不贊成這種不成熟的技術變成一種政策。這種否定，這種批評，完全是內部的（技術成效質疑），而不是外部的（犯罪被定義的質疑）。對技術上數字的成效和態度，完全表現了務實的習性。

MB5，醫學學者（臨床醫學），師大附中畢。父親是政府高官，從小對子女的教育非常的嚴格，兄弟姊妹的社會發展也非常的顯赫。會就讀醫學院一方面是因為成績好，另一方面是「我親戚也有很多當醫生，尤其是我外祖父是南台灣很有名的醫生，我常常到外婆家去渡假，他是我的 role model，做醫生可以

救世濟人，那時候醫生地位很高，非常受到社會的尊敬，這是我選擇醫科的來源。」選擇科系時受到家庭龐大的社會地位影響，因此社會參與十分的少，曾經一度想要參加扶輪社（以社會地位為參加資格的地團體），不過因為學術行政工作太忙而沒有參加。學術行政經驗也相當豐富的他，曾經擔任過醫學院院長、地方醫院院長，投入學術行政的工作二十多年，是因為「整個業務能夠辦得好，所能夠奉獻的層面就比較寬」。熱於投入行政、投入服務這一點和其他的務實性學者一樣，即使明顯感受到行政工作對他的學術研究有害，也「沒有後悔過我走了這條路，我到了六十幾歲了，我覺得我選擇得對。我和一些少數不滿意現實的人不一樣，我大概會是從現實環境中，儘量去適應，有什麼困難的話，儘量想辦法去突破。」適應環境這四個字，多麼精準的描述出他的習性！也描述出務實性在選擇科系時背後的個人理由、參與行政工作時的一致性，也描述出務實習性對於環境或是社會因素而不得不然的事不會拒絕和排斥：

我自己的看法，我最近到美國去，按指紋。我不排斥，他有需求做有效預防的話，他當然有權力要求這樣做事。就算在台灣，如果白天不幹壞事的話，夜半敲門心不驚，為了我自己，為了這個社會，即使是按指紋，我沒有反對的道理。（MB5，醫學學者）

從爲了整個醫學界，犧牲個人的學術成就，到爲了整個社會，而犧牲個人自由；一種強烈爲了治理的方便而樂意捐出個人自由來交換的想法，使得務實的學者在價值光譜上傾向成爲良善的順民，社會上的意見位置接近一般民眾。

So5，政治學者，專長是選舉研究和民調統計，唯一的社會參與經驗是幫張榮發基金會挑選獎學金頒發人選，這是因爲友人要求幫忙的義務性工作。父親是農人。小時候因爲功課優秀，加上父親小時候也是功課優秀的學生，所以特別支持他唸書：「只要你唸得下去，我一定撐」，這種補償心理下，So5 從台中一中畢業後，順利考上造船系。但是因爲在大學一年級時擔任班代表，解決不少班上事務，因爲萌生重考政治系的意願：

其實我滿會協調和溝通，滿會去 push 人家。我那時候就覺得我去唸理工有點可惜。（So5，政治學者，高教員）

So5 選擇轉向政治科學的原因並不是因爲對政治學事先有所理解，或是基於這學門科和他的興趣結合，而是因爲他這個人材在這門學科的最大效益。家裡對此的反應是沒有罵，也沒有反對，而是「他們不曉得該怎麼辦」，也就是說，So5 的父母無法設想唸政治科學的前途在哪，但是又沒有能力說服優等生兒子的意願。這種小到閱讀，大到大學甚至研究所選擇科系或轉換科系的自由度，對學術而言是慣習養成一個重要關鍵，訪談中許多有機會進行不必考量務實效果

的社會運動和低教員的學術活動、從事高度理想性格的事業<sup>134</sup>、義務參與重要社會議題且無關自己學術成就的受訪者，討論都曾經提到家庭對教育和閱讀的培養心態保持開放的態度。家庭為什麼對他們的閱讀、升學都絲毫沒有任何升學主義式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呢？當然，受訪的學者幾乎從小就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從小的課業就讓父母安心的放鬆管制任由發展，這是一個很好的解釋，但這卻不能解釋為什麼一樣功課良好，是全村有史以來第一個讀台中一中的So5 會讓父母不曉得該怎麼辦！如果沒有一種務實的就業壓力，一種把教育或唸書當作就業投資的想法，一個功課良好自動自發的學生，又怎麼會讓父母緊張？

父母的焦慮也許沒有立即的效果，但是卻反應在他的興趣上。專攻選舉研究、曾任政治學會會長的他，至今仍然擔任大學重要的行政長官。參與學校行政工作「不下二十年」的他認為行政工作是「你有這個能力去 create 這個環境，也許因為你的努力，可以讓更多人拿傑出研究獎」。這是一種比較利益的觀點所作的判斷和犧牲：「自己拿傑出研究獎不如更多人拿傑出研究獎」。這二十年的學術行政的努力背後所隱藏的那種務實服務態度，以及選擇選舉研究和民調統計作為政治學上的研究領域，和過去父母因為兒子轉換了一個沒有把握或感受不到把握的態度一樣，是一種生涯上不自覺的趨吉避兇選擇：趨向有實際幫助的路線，避免因為文化上的隔閡而造成的兇險。

也因此，在價值判斷上，「從小就認同重刑」的他同意政府對犯罪措施的指紋資料庫政策：

我會同意，這就是怎麼樣建立一個資料的問題而已，問題在於你怎麼去建立這個資料，我登記一個指紋，和登記一個身份證號碼，在我看來是一樣的東西，哪一天也登錄 DNA，我想它是拿來解決一個法律問題的工具而已，如果朝這個方向來看的話，是沒有太大問題的。我對基本權利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必要的，但是也許有些事情我們在看的角度上，詮釋的角度上可能有些調整。(So5)

So3，留法政治學者，專長領域是法國政治和國際比較政治，除了學術團體外沒有任何的社會參與。父親是一個在工作上與語言密切相關的地方政府新聞單位公務員，他從小的英文就是父親教導的，所以他在大學選則第一類組（文法商社）時，和家裡沒有發生衝突或是任何的意見不和：

完全沒有。一點意見都沒有。當然這可能跟我父親

---

<sup>134</sup> 如下文後會提到的Sc4 受訪者曾經獨力出版他認為的「好書」，就是這類型的活動。

的背景有關，他是公務員，他對英文的掌握也很好，他的英文程度是很不錯的，他的工作跟語言、國際化、姐妹市這些都有關連，所以我唸第一類組對他來講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我從小就是我爸爸教的英文，所以他對語言是很支持的，我去唸語言，唸文學他一點也不反對。

從小就是爸爸教我英文，很早接觸語言的結果，就是代表我對語言接受的程度是滿高的，語言就變成我很有興趣的東西，語言和文學也變成一樣的東西，這是很自然的選擇。為什麼要選法文的話，就是覺得當時英文程度差不多了，就是說同樣英文能力很好的人非常多，所以要在英文的領域跟別人競爭很非常困難的，所以選擇法文。(So3，政治學者)

由於父親的語言專長，從小對語言有極高優勢的 So3 毫無困難的在大學入學考選擇了法文，而不會感到任何的不安，語言優勢的保障同時也帶來語言投資的眼力。對於為何會從法文轉向政治，他是如此回答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既然學了外語，一定是跟對外關係有關，其實本來高中的時候想要去考外交官，可是後來沒有去考，大學的時候去參加國際事務研習會，這個國際事務研習會是 copy 當時救國團的國際事務研習社，我在救國團時參加那個活動，在輔大也是那個社的成員。所以我覺得既然學了外語，一定是涉外，涉外的話，國際關係就變成理所當然的一個選擇關係。(So3，政治學者)

學了外語，讓他想到涉外，而涉外理所當然的就是國際關係。這一條理所當然的邏輯並不如此理所當然。選擇外語是因為父親從小對外語教育的細心培養，So5 只是根據父親的文化教養傳承而選擇了一條不同於社會主流實用價值的路，事實上背後的態度仍然是實用的。當我們看到兩者對學術行政工作的態度時，這種差異會更明顯：

我覺得基本上學校的事情需要有人做，勢必一定要有人願意犧牲…。但是我覺得對年輕人來講這是一種磨練，我也不會去排斥它。跟研究之間的衝突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如果事情要有人做，真正被指派到的話，也只好有人做了。但是我覺得事在人為啦！像我們系主任，他雖然一邊在做系主任，但是也沒有太影響他個人的一個升等計畫，我覺得影響

一定有，那就要看個人能不能發揮超人的力量了，一方面把系務做得很好，一方面又把升等的事情處理得很好。(So3，政治學者)

So3 將學術行政工作視為一種磨練和公共服務，和其他務實性的學者一樣，對行政工作並不排斥，並不會強烈覺得行政工作和自己的個性不合，而是和生涯緊緊結合在一起的必經過程。

對他來說，指紋資料庫也是一樣，一種爲了社會的治安更好，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儘管知道它有資料外洩的危險，但是「兩害權其輕」，還是覺得這件事必須要去做：

過去的人比較有職業道德，在銀行工作的人不會把資料帶走，現在的人爲了錢，他什麼東西都願意去做，他可以把他的客戶資料全部弄出來，然後賣給外面的犯罪集團，讓它們去做偽卡，斷所以現在來講已經是無可避免的，只是什麼時候發生而已，但是兩害權其輕的話，我覺得這種事情還是必須要去做。(So3，政治學者)

務實型學者是在慣習(稟性系統)中最接近社會外部的人們。他們對於政策、議題、學術的目的等問題上非常接近於個人人身的基本需求：物質的、人身安全的、經濟的。他們是學術場域中最接近凡人的一群，從事如何有效的把學院知識化有社會需求下的服務。

## 二、先知型學者<sup>135</sup> (Scholars of Prophet)

先知型的學人是時代的產物，因爲他們所處的社會處於落後的階段，學術系統並不發達，身爲落後階段的知識先鋒在留學歸國後，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將留學國的社會、教育、政治（這裡總歸爲先進國家的生活方式）視爲理想。他們在返國後努力從事社會參與，以先進國家的生活方式做爲基礎，對原生社會的傳統進行批判或傳達福音，希望母國在這些方面有所改進。因此先知型的學人多半對非營利的社會參與有極大的投入，對社會的改造充滿期待，對當前社會開始有一種對照先進國家的民主或教育體制有所不滿。這些人也許在聯考選科系時是和務實的學人一樣，懵懂地按照聯考排名或是家長的期待填選志願，也有的是因爲知道自己將不可能在自己有興趣的知識有所發展，而不得不選擇

---

<sup>135</sup> 會以先知來命名，是爲了對照第三類的學者：知識貴族式的學人。後者是韋伯心中的純粹學術典範，也是唯一能放在康德的「低教員」範疇。按照韋伯在*Science as a Vocation*中的用法，先知是用來指涉以價值作爲知識方向，帶領人們邁向某種生命價值的學者。但是科學的研究和投入，是完全價值無涉的。因此我將積極投入社會參與的學者稱爲先知型的學人。

符合社會期待的學科。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既不是把他的學問當作個人事業晉昇的工具，對國家的物質經濟利益並不熱衷，也不像知識貴族式的學者那樣純粹為學術而學術；他們最終的目的是把台灣社會帶入民主和科學的階段，養成公民基本的民主和科學素養。所以他們出沒的場所很少在學校的行政機構裡<sup>136</sup>，也不都是在專業的學術發表場所，而是在半學術，半社運的情境下出現他們的身影。

先知型學者對於學者的角色，不是賦予它一種民主化利器的期待，就是根本不理解自己的學術發展，只求能繼續維持扮演學者角色的最低投入標準。也因為對自己的學者角色有多重的用途，並不只是限於他們個人的升遷或是為了知識的進步，所以他們往往也是閱讀書籍最廣泛，發表言論的管道最廣泛的一群，在社會運動、改革運動上，凡是跟整個公民社會有關的場所都是他們活動的空間。許多被放在這個範疇的學者都有廣泛的非營利性社會參與的經驗：澄社、科學月刊社、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台社）、大學改革、教育改革、出版和純學術不相關的書籍。他們是國外生活方式、政治方式、學術方式的引進者、買辦、貿易商，而且多半由於對國內政治、社會、教育的不滿而發言：

訪談者：你剛剛描述教育，似乎不是很愉快？

受訪者：誰會愉快？你會愉快嗎？當然不愉快，台灣的教育對每個人的自我都是很大的灼傷，教育本來的主體就是學生，但是現在教育的主導權是放在整個政府的制度生產機器，一個生產線上，並不是把人當作它的目的，而是用最小的成本生產最大的東西，對他們來講這是最有效的方式，反而造成學習過程中非常低效率的方式，所以這裡面是出了很大的問題。（Sc4，大氣科學學者）

我到後來，整個西洋文化我才感受到，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中國文化不一樣的地方，事實上，沒有一個民族不講理性，也沒有一個民族不講人情，也沒有一個民族不講宗教靈性的，可是問題重點是哪一個在前面？哪一個在後面？然而中國人的話就是人情第一，理性第二，靈性第三；印度是靈性第一，他們萬一碰而任何事情，先講靈性，但是西洋文化第一件事情講到理性。我們不是不講理，而是先要把情講完再講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幾千年來沒有人講幾何，就算有也很難成為一種文化。

---

<sup>136</sup> 只有一位曾經擔任學校的重要行政職位，物理學家Sc5，不過那完全是時代的產物，純粹是因為「沒人嘛！」而且，他對於社會運動的參與所投注的時間和心力也更多於此。

(Sc1, 物理學者)

訪談者：所以你會改唸社會學是因為關心社會問題。

受訪者：關心社會的問題，關心社會的改革。那時候受楊國樞的影響，最早當然受殷海光的影響，受台大學風的影響，對社會總是比較關切，比較強調改革。(So4, 社會學者)

但是這裡有個明確的不同，我們可以分成「社會改革」和以「科學報國」的兩種不同動機。因為「科學報國」而投入的學者通通是科學家。在訪談六個科學家中，沒有一位是例外，都是這一類的學者：

我在稍早前就立定志向要學物理，在分析這個問題時，我們那一屆，大概全台灣成績最優秀的學生都要讀物理，不只是全台灣，幾乎是全世界的華人都沒有這個傾向，原因是因為我們讀初二的時候，1957年，民國四十六年，那一年的十月發生那件大事，十月初蘇俄發射人造衛星，美國急起直追；第二件事情，諾貝爾獎頒給李政道、楊振寧，那一年我們剛好在讀理化，就是物理中的浮力、落體等等，我們物理老師就鼓勵我們讀物理，本來對數學就很有興趣，現在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是因為這個背景讀物理。(Sc5, 物理學家)

Sc5, 物理學家。父親是公家機關的工程師，曾經參與科學月刊社的抗議活動、大學改革、教育改革等重要社會活動。過去那麼多物理學家讀物理和化學而得到諾貝爾獎不會鼓舞他選物理，而李政道、楊振寧卻可以，這當然很明顯，Sc5 也自己承認，他之所以會出國讀書和歸國教學，完全就是基於士大夫式的民族主義科學報國的思想所影響。

「第一我並不嚮往這樣的生活（留美教學），第二個我覺得不可以，我是民族主義者，我不願意多一天為外國人服務，我為什麼要在那邊培養美國人呢！我不幹這種事，我對於出生的我要回饋，這是天經地義的，我一天都不願意留在那裡，所以我回來了。」  
(Sc5, 物理學家)

同樣的想法並不孤單：

我想，有一點算是時勢吧！就剛好我們那一代的人，有這樣的機會，第一個我們講升等的壓力沒有

那麼大，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所受的教育，我們談到五四還會感動的，我們對國家、民族、社會的責任感，也許有這樣的共識。在那種環境剛好是台灣在轉型，你也能理解，現在大概看不到了，現在理工科的學者已經完全體制化了，幾乎沒有反對聲音了。這個坦白講，不是民主的問題，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就是科學報國，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是對社會有責任的，這種從五四以來的精神，才是主要的…坦白講，民主就是各管各的。(MB3，生命科學學者)

我是1976年回來的，那時候台灣離開聯合國，留學生都覺得台灣大概完蛋了，很少人要回來。可是我父母親年紀大了，需要我的照顧。而且我又有一種愛國的感覺，就覺得唸書回來就是要報效國家，就是覺得應該回來做一點事。(Sc2，數學學者)<sup>137</sup>

訪談者：你在國外任教了六年，什麼原因讓你想回來？

受訪者：第一個，我一直都想要回台灣的，這是一個我認為最終極的原因，第二個，我對中華文化，注意，我講的是中華，我一是最在意的就是對它一定要有責任，我們出去學，最後一定是個中西的橋樑，而且是在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如果要有更enrich的話，讓它更豐富的話，這是我們的責任。(Sc6，地質科學學者)

科學報國的理想在當時驅動了許多自然科學的學生拿取獎學金出國留學，加上當時胡適的學術獨立計畫的推波助瀾下，鼓勵他們前往英美留學。例如諾貝爾獎得主、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就曾經在《我的成長歷程》<sup>138</sup>中提到：「及至年齡稍長，思想漸趨成熟後，便常捫心自問—我能作什麼？我如何才能有所貢獻？我對自然科學較有興趣，也自認可以做得比較好，於是便立志要以科學救國。這個理想與目標，可以說早在初中時代，便深植我心，驅使著我不斷前進。」

我們將以科學報國為動機的先知型學者稱為科學先知。科學先知和另一類（我們稱之為民主先知）的差異在於他們是以科學的精神作後盾，也因此投入社會運動的層次會比較侷限在教育、科學與科技政策上，而且由於科學報國

<sup>137</sup> Sc2，數學學者。父親為政府官員。

<sup>138</sup> 參見中研院網站：<http://www.sinica.edu.tw/as/ytleee/37.html>。

的意圖，使得面對學術和教育落後的社會時的優先考量是建立秩序，而對其他的社會改革或社會運動的精神反而採取反對的態度。可以看到對指紋資料庫和監視器的意見正反應了這個現象，科學先知型的學者不是贊成指紋資料庫，就是因指紋資料庫和監視器不會有實際上的成效而持否定的態度（精神上的肯定但是卻在技術上否定）：

精神上我同意，但技術上我覺得不會 work。我同意我知道好人是應該被保護的，但是很懷疑，千面人都知道把強力膠撒上去就好了。(Sc4, 大氣科學學者)

這個問題我以前有思考，有人說指紋是個人的東西，所以不能被記錄，這話也不見得說得通，你看身份證，你有照片，出生年月日，所以說因為隱私而不能，我看也講不通。另外一個，因為指紋資料庫而減少犯罪，也有點道理。(Sc5, 物理學者)

我不覺得這是問題。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呢？現在人都知道，去超商搶劫，先把你的監視器卡掉，那沒有用，那是治標的，不是治本的，而且花一大堆經費…。我不覺得這有幫助。(Sc3, 化學學者)

我想我會贊成。我也會同意閉路電視要多一點。  
(MB3, 生命科學學者)

科學先知只有在遇到反科學的傳統或權威時（如填鴨式教育、教條式的教育、因為政治意識型態而執行的科學計畫）才會參與改革活動，進行批判。教改是最好的例子，這個幾乎由自然科學家組成的社會改革運動和一般的勞工運動或女性運動最大的不同在於他的批判對象不是國家的權威，而是社會的集體蒙昧無知（如升學主義、文憑主義、填鴨式教學）。相反的民主先知則是以市民社會代言人的身份，對國家權威進行批判。因此民主先知傾向於對言論自由、解嚴、司法、醫療、性別（含性意識）等國家權威、科層權威、男性權威所構成的治理方式提出批判。民主先知所依持的立場和科學先知不同，前者在於人人平等，後者在於理性，依持的立場其實就是它所批判的權力來源；科學先知以理性批判社會大眾對教育和知識的愚昧，也就等於建立一個理性權威被民主先知所批判，因為理性權威容易轉向不民主；同樣的，民主先知以市民社會的民主標準來批判所有治理活動的權力集中，也就等於建立一個民粹（科學先知眼中的民主）的權威被科學先知所批判，因為民粹權威容易轉向非理性。這一

點我們可以在民主先知的對指紋資料庫和監視器的價值判斷上明顯的看出來<sup>139</sup>：

我都反對，也不會覺得有存在的必要性。(E4，地景建築學者)

因為我不按指印，所以我連投票也不能投票了，我連上飛機都不能，因為要身份證才能上飛機，我沒身份證我就沒護照了，就不能出國了，我所有的權都沒有了，我變成不是公民了。這是很簡單的憲法問題，政府憑什麼強迫我按指印！(So4，社會學者)

受訪者：當然不會同意。第一個當然就是他侵犯人權，第二個是它有別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你政府提高效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比如說你去花更多的人事費，或是花更多的設備費，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是政府效能已經達到極限，而不得不要我們犧牲一部分的人權，這一定是有代價的，目前這種蓋指紋的事情，你就是縱容他懶惰

---

<sup>139</sup> 在先知型的受訪者中，被區分為科學先知和民主先知的學者在價值傾向上趨近於二分：科學先知傾向於同意指紋資料庫和監視器，而民主先知則傾向於反對。這一個二分在受訪者中只有一個例外。這位提到他具有科學報國民族情懷的Sc6地質學者在指紋資料庫和監視器上都投上反對票，他認為這都是違反人權，這一點和其他的科學先知不同，反而接近於民主型學者。本研究的分析架構沒辦法直接解釋這個例子，不過有幾個例子可以看出脈絡上的線索。首先這位學者在其他的價值判斷問題上和科學先知並無二致，離異的傾向並不是那麼的絕對；其次他曾經多次在報章雜誌上提倡科學問題的開放性是需要被保障的，他認為「今天關於李嗣涔的研究，我去解讀他…當然我不懂他那一門，但是我們至少留這個空間，如果那個特異功能是真實存在的現象時，那就是你的常態科學有危機了，你面對危機要去解決，而且是勇敢的人去做這件事，所以在今天科學的funding和reputation這兩個考量下，就是沒有什麼人敢做那件事，從這個角度講，李嗣涔是勇敢的，我把他當作一個開拓者、英雄來對待，不是要說崇拜，這裡面的假設是說，如果他所說的特異功能是真實存在的情形。所以我認為問題的癥結是特異功能是不是真的存在，而不是能不能研究。」對他來說，科學應該是立基在方法上，而不是對象上。這種立場和許多科學家明顯不同，明顯的開放許多，這種立場一樣也可以由他在訪談中提到，他個人對孔恩的「典範說」非常同意，他相信當下以為的科學真理都是鬥爭革命的結果製造出來的：「地質科學二十世紀已經經歷過這個歷程，韋格納作一個氣象學家跑來講大陸漂移，就被地質學家打死了：你氣象學家憑什麼來講我地質學的問題？你還敢講地球物理的問題，所以十四個一流學者開會，投票的結果是七比五，有兩個人棄權，結果說他錯了，說他危害地球科學，可是三十年後，當然他不是全對，可是有些想法是對的，那是地質學自己丟臉，人家氣象學家講的東西後來變成地質學家都在用的假說，那是我們地質學家丟臉。當然我不是說李嗣涔是對的，但是我們總要保持那個彈性，那個開放的空間讓他去證明。」從這些訪談資料中可以知道他對科學真理所置放的位置相對於其他不斷投入科學教育、科普書籍出版、教改的科學先知來說，是要低的，相對的來說，他並不認為現下的科學真理應該被當成永恆的真理來看待。以此來看，科學真理被「當真」的相對程度，會影響他對社會秩序的價值判斷，科學真理愈是被當真，他就愈容易對社會秩序要急迫的要求；科學真理的地位就愈是低落，他對社會秩序的要求愈少，甚至會因為社會秩序對人權的侵害而反對它。並且這個區分並不因為Sc6的離異而有所不足，因為他對科學真理「當真」的相對程度夾在科學先知和民主先知之間，也反應了他對社會秩序的價值判斷夾在兩者之間（反對指紋資料庫和監視器，卻贊成核能發電）。

訪談者：但是監視器呢？很多搶案都是透過監視器找到線索的。

受訪者：監視器…我沒有想過，但是我得好好想。我基本上是到了萬不得已才可以。(E5，工程學者)

政府怎麼可以從一個管理者的角度去掌控每一個人的 data，這是第一個，政府的 authority 在哪兒？為什麼有這樣的權力？當然可以去建立什麼戶籍啦，我們的資料都建立在政府手上，可是到這裡，甚至是基因的 data，這好像超出了日常生活的 boundary，到個人生理層次的內涵，意義又不一样了；另一個是濫用的問題，或是歧視的問題，好像你有什麼犯罪基因，事實上並沒有這種東西，所以這樣是不是一個很好的 idea，而且是用抑制犯罪或是管理犯罪為出發點，我覺得這又更 negative 一些。(So1，法律學者)

正如受訪者 Sc4 所說的「我覺得台灣過度渲染這個議題」。對科學先知來說，一個議題過份的渲染就是使它轉向民粹和非理性，某些問題有絕對的正確解答，不能事事都訴諸民主的，而指紋資料庫和核能電廠一樣，都是沾染上民粹所製造出來的神聖性，而失去了它原本應該有的科學爭議。這種對科學絕對真理的要求讓他們在價值問題上會趨近於務實型的學者：

再來談到反核，我想問問那些反核的人士們，你們夏天暑假要不要吹冷風，我們是不可能再走到回去了。我比較遺憾的是，我們的核能爭議，反核的人士把環保當成一種神聖性，而不是一種科學的技術性爭議，沒有能讓核能的問題變成一種科學問題，是很可惜的。(Sc4，大氣科學學者)<sup>140</sup>

民主先知不同於科學先知，他們同樣是社會的價值引導者，但不同的是後者強調科學真理優先，後者強調民主和公民的優先。訪談中的民主先知都有長期的社會參與，澄社 (So4)、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E4)、社區大學 (E5)。他們不是認為學術最終要對社會有所貢獻，就是直接參與社會運動：

訪談者：你覺得讓你反感的學術態度是什麼？

---

<sup>140</sup> Sc4 在這一點的意見和C3 非常的類似：「因為京都議定書的話，我們燒煤燒油都有困難，那麼如果我們連核能都沒有的話，我們怎麼辦？你怕不怕熱，你又要開汽車，又要幹嘛的。」這都是一種假定現有的價值需求是一個真實，為這個真實的需求而服務仍理所當然的假設。在這個前提之下，核能問題是一個科學的技術性爭議問題。

受訪者：我一直覺得國內，應該要多做理論研究，社會學研究也者，是對這個社會中現象的解釋和分析，而不是去解釋韋伯怎麼說，Durkheim 怎麼說。社會學理論應該是研究這個社會所建構出來的理論，而不是去研究韋伯的理論，叫做理論，研究 Simmel 的理論叫做理論。教學這樣教社會理論還可以，可是做研究，我覺得不夠。到底在作什麼社會學理論呢？都是研究別的社會的理論叫做社會學理論是不對的。應該是研究社會本身，去建構理論，或是用理論或解釋架構去解釋某個社會現象，這才有意義。有人號稱研究韋伯、涂爾幹，德文法文沒有比人家強，現在又流行法國的布厄迪亞，唸得懂他法文的論著？如果沒有這些語文能力去研讀原著，就很難超過西方學者，這樣搞理論就很難有突破。同時這樣搞理論對台灣社會研究沒有什麼幫助，對世界的社會學研究也沒有什麼貢獻。搞理論結果就是對台灣社會的實際現象完全無能為力，完全不置一詞，或者是幾乎不做實際的研究，就拿西方理論來論台灣的社會現象。我認為這不能算是真正的社會學研究。(So4, 社會學者)

或者直接參與社會活動。例如 E5 投入的社區大學活動，就完全和他的工程背景無關，他自認這些社會活動的投入都是作為一個「大學教授」的責任：

訪談者：為什麼你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受訪者：兩個背景，第一個背景是…社會參與是公民的義務之一，第二個是說，我覺得我有很多好的遭遇和際遇，也就是我得到的東西本來就比人家多，社會本來就有很多的不公平，財富的不公平，能力的不公平，際遇的不公平。財富的不公平可以想像一些制度來解決，際遇跟能力的不公平沒有什麼制度能解決，只有得到多的人去幫助得到少的人，就是這樣而已，所以我是這個背景下要去作。為什麼要去從事社會服務，這些東西我把它叫做社會服務，但是社會服務為什麼要做這兩項，就牽涉到其他的因素了，就是我對台灣社會的觀察，認為台灣那個階段需要這種東西。(E5, 工程學者)

又例如 E4，涉入都市改革活動非常深遠的他，更是深切的體會他在學術研

究和社會改革之間的其實是快要到無法共存的地步：

在台灣，社會人文領域裡面，很怪的是，在美國很少有學術界會像城鄉所，老師學生一堆人跑到社會運動去作規畫的，因為這個吃掉很多很多的時間，也因為如此，我們有一個很弔詭情況是，我們其實不太有時間去做我們自己領域的學術研究，假如你把學術研究跟社會實踐去做一個分隔的話，事實上，這是一種真正完成一個計畫，要對未來改變的一個想法，這種東西放在社會科學，它又很像技術報告，它不是探討背後的成因，因為它很真實的，你要拿這個東西變成什麼，它沒有任何學術上的 credit，我必需要這樣講，花很多時間都沒有任何學術的 credit，除非你花時間把它轉化為學術的一環，我自己花很多的時間其實是在搞技術報告的那一部分，我自己最近都沒有很多時間把它轉化成學術內容，我自己沒有這樣作的理由有一點點是因為學術倫理的問題，某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做的是真的人，以及他們的社會經驗，他發生了一些很悲慘的狀況，到最後他就變成了一篇學術報告，我自己慢慢在嚐試，因為不做也不行，老是停留在原地而已，你的學術根本就不會有長進，我總是有很尷尬的，我不知道要怎麼把我這個東西變成我學術上的 credit，打比方說，萬華剝皮寮的事我是涉入非常的深，到最後是建築被搶救下來，可是裡面的人全部被逼走，這是一個非常容易寫的素材，就是你把誰抓進來罵一罵，套一套理論，這東西其實也滿容易寫的，可是我到現在除了那份技術報告之外，我沒有寫過任何東西，我甚至都不太願意去講，就是因為一些個人原因，那個案子讓我從人被趕走的當天晚上回來，哭到整個人快要崩潰，就是我個人的事情和搞規畫的事件結合到一個我沒有辦法 handle 的程度，我記得那個時候就有一些要我去講這個故事的討論，可是這種東西我實在寫不下去，這種東西你怎麼把它變成學術上的 credit，我其實有困難。(E4，地景建築學者)

無論是自身認同學術和社會實踐的結合，還是認同學術和社會實踐的分離，或是根本意識到學術和社會實踐是不可能共存的。民主先知都基於某種對

社會貢獻的熱情和情感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在社會改革上，這也表現在他們對學術行政態度上負面傾向<sup>141</sup>：

我是不喜歡行政工作，一方面我覺得我能力有問題，我事實上不太適合…我看到我們系主任在做一些事情，我看到我去做這些事情我會瘋掉，我覺得那要下很多判斷，如果我要下這些判斷，我要重新來過，作為一個系主任，你在一個私立學校，你要收學生，你要收多少學生，你要用什麼方式找到你適合的學生？你要不要去做宣傳？要不要去做任何有必要的策略？甚至你要一班還是兩班的學生？你要不要博士班？你跟整個教育系統的關係，我覺得我都沒有做過這方面的事，我覺得我沒有這個前提，我不想要去碰這個東西，因為我覺得我對這個系幫助不大，最主要是在我目前的知識上，我沒辦法去下這個判斷，我現在只是做一般的學術和教學。(E4，地景建築學者)

訪談者：沒有指的是沒有人找你，還是你推卻掉了。

受訪者：人家不會找我，找我也不一定會答應。

訪談者：為什麼人家不會找你？

受訪者：我太有意見了，我不會用這個職位跟任何人交換，我的原則性太強了，這個太清楚了。

訪談者：你個人不想從事學術行政工作的原因是什麼？

受訪者：不覺的這會有用。一群大學教授是沒辦法管的，你為了一群大學教授而做行政工作能夠產生的效果很小，但是一個大學教授跑到外面去，對社會是很有幫助的，兩相比較，我寧可出去外面做。

(E5，工程學者)

不為這個系，也不為了個人昇遷，而是為了更大的社會群眾。民主先知在這一點上科學先知一樣。

無論是科學先知或是民主先知，先知型的學者有許多共通的特點：1、家裡對大學填選科系的限制不大，自由空間較務實性學者要來得大；2、也因此轉換學術跑道或涉獵其他領域知識的學者也特別多<sup>142</sup>；3、對學術行政工作排

<sup>141</sup> 除了So4 在研究單位，沒有教學和行政上的義務外。

<sup>142</sup> 這方面的經歷堪稱最豐富的一群。自然科學家、工程學者會讀哲學、科學史的著作在這個領

斥的程度要高於務實性學者（只有兩位學者曾經做過學術行政工作）<sup>143</sup>。科學先知和民主先知唯一的不同是在於價值意見上，而不是他們從學的態度。

先知型學者是一個暫時性的位置，因為他們實際上的社會角色都不是在學術界（除了投入學術行政的不得已之外），實際的活動空間也不在學術界。而是在教育改革和社會改革運動上。一個學術系統發達的社會，例如美國，這樣的角色多半安插在公共型知識份子、自由作家、政論家、記者身上。就像 Ressler Jacoby 所討論的美國大學系統的擴張使得傳統知識分子型的人物被整合裡大學裡，三〇年代時像 C. W. Mills 或是 Edmund Wilson 這類不寫論文，只寫書（而且不是討論學術問題，目標對象不是學術社群而是社會中產階級的書）的知識分子兼學者一樣。台灣的大學中，先知型的學者（倒不如說是知識分子）正扮演過去出現在美國三〇到五〇年代時的知識分子型學者的角色。台灣的先知型學者，沒有一個例外，全部都是留學美國名校歸國的，他們經歷從學術落後的國家迅速跳越到學術最先進的國家，有時候他們把在先進國家經驗過的一切生活和知識體驗當成一種理想，企圖在原來的國家實現；有時候則是因為他們在先國家的知識養成後，回到母國發現學術系統不發達，根本無法開始進行學術研究，而不得不轉換他們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實踐，變成一個社會黑手，自己動手做，而不只是動腦想。所以他們在社會上的表現非常類似 C. W. Mills 所說的知識導師（intellectual craftsman），永遠掛念在心上的是他為誰而寫作、研究、教學。

### 三、知識貴族型學者（Scholars of Intellectual Aristocracy）

康德眼中具有不為任何目的而服務的純粹理性基礎系所，和韋伯所說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熱情，都是知識貴族式學者的特點。被歸類到知識貴族型的學者有一些共同的特色：早慧、家庭對教育自由的支持、完全自主的選擇科系、厭惡學術行政工作、幾乎沒有任何社會參與經驗、在價值判斷上完全反對政府治理的動作<sup>144</sup>，而且更重要的，都認為學術工作不需要回應任何的社會或經濟上的需要。

訪談者：你覺得台灣的學術風氣哪些特質讓你反

---

域不乏少數，其中有自然科學家能夠針對人文學者的科學史著作提出修正，也有人提到他大學就閱讀過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不務正業」的情況要高於其他兩類的學者。

<sup>143</sup>在問及對學術行政的看法時，曾任大學校長、教務長、院長、系主任的 Sc5 提及了「我之後來參與很多行政，我從來也沒有想到要去做這件事，我要做的是科學教育。但是到這來，其實什麼都沒有…，我來這三年，沒人嘛！所以廖化做先鋒，我就接物理系主任」，而歷任所長、副所長和一項總管院務職位<sup>145</sup>的 Sc2 也說「這麼多的行政工作對學術當然是有影響的，但是我也不後悔，因為在不同的時代你的人生發揮了最積極正面的角色。」時局的壓力使得投入學術行政的原因傾向於被迫，而不是個人意願。

<sup>144</sup> 還有一個特點，但並不是本研究中經驗的知識貴族型學者都具有的特色。其中有一人，都是留學歸國，他們都具有美國名校教學的經驗。

感？

受訪者：反感的話有幾點。第一個就是說，雖然是學術界，但是還是脫離不了社會文化的一般形態，心理上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官本位階層化的東西，聯考就是這樣，不斷盯著什麼國科會的獎助、算點數啦，都是形式主義的性質，坦白說我在別的學術界都沒有看過這種風氣，用形式化的方式來建立一個階層結構，這是第一個我不喜歡的。第二個我比較反感的是功利心比較重，基本上來講就是說…當然功利心每一個人都有啦！但是只把學術當作個人事業，知的樂趣不是很強，這我也是不太喜歡。我不是說別的社會沒有類似的情況，這是程度的問題。

（H4，歷史學者）

H4，歷史學者，專長是唐史和中國思想史，父親為著名佛教自由作家，著書出版三十餘本，後來以同等學歷的方式取得高中任教資格，母親則是護士。這在民國四〇年代來說，是高學歷的一群。由於從小對聯考制度和升學教育的反抗感很深，「所以一直不能自覺聯考的重要性」，所以選擇了私立中學就讀。在問及為何選擇歷史時，H4 回答：

我因為從小對這個有興趣，我也沒有發現這有什麼特別，直到考大學聯考時我才知道，怎麼考乙組的人那麼少，小孩的世界，我以為跟我一樣興趣的人很多，所以我大概高中時就很清楚知道要唸文科，要唸乙組，我不知道別人要唸法商，我都不知道，等到要考聯考那一剎那我才知道怎麼那麼少人。

（H4，歷史學者）

家裡對他選擇科系的約束力幾乎不存在，而他在高中時也無法感受到「考乙組的人那麼少，而乙組裡面唸文的人更少」的社會壓力。是什麼樣的特權讓他感受不到，或是不需要感受到？父親文化教養的雄厚，使得他在高中選組時不必也不能感受到社會上對於就業壓力的形式需求和急迫性，這種與生俱來的文化特權讓他能夠自由培養出「升學教育」的反抗感，而且從來沒有想過未來就業的問題，因而選擇了歷史。

家裡對教育的開放態度，使得 H4 從自初中時就能獨立閱讀大量的報紙，他宣稱沒有任何人的教導就會感受台灣威權體制的特點：

就是非常敏感啊！我從十歲開始每天到圖書館看十份報紙，三份香港、七份台灣的，你去一比就知道，

訊息就會從字裡行間夾縫中出來了，再嚴密的，除非像是共產黨這種 totalitarian 體系，在台灣這種比較 loose 的威權體系，很多訊息都還在公開領域，只是因為一般人比較不敏感，被一個 program 操弄當然就不行，比較敏感的人還是能知道一些事情。譬如說有人說國歌有問題，國歌有什麼問題？想一想，第二句話就有問題了，敏感的人就會知道，不需要人家教，就像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你只要聽人家講一次你就知道了。(H4，歷史學者)

也因為這樣的閱讀習慣讓他對知識和獨立求知敏銳。大學時因為認識到漢學是國際性的學門，而萌生出國的想法，靠大學供給的獎學金出國，取得博士學位後，並沒有立即回來，而是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任教，甚至取得長聘教授 (tenure) 的資格。

訪談者：你是人文學科的學者，你認為人文學科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我覺得人文思想的東西，和一些文學理論的東西…我覺得外文系的同學常常需要一些心理建設，就是會有這樣的疑慮：我們除了英文這個技能之外，好像沒有具體的貢獻，可是這樣跟唸語言學校又有什麼差別？所以我們唸文學有什麼用？我覺得透過文學得到的領悟，會豐富對生命經驗的感受，也有助發展清楚的思辨能力，這是一個別人都拿不走的東西，我自己是這樣看待文學的功能，如果能夠就這個面向去影響別人的話，我覺得是滿重要的；台灣現在檯面上吵來吵去的很多議題其實都是社會泛政治化造成的結果，很多時候不是真正在討論 truth，如果能加強整個人文或是文學的訓練，理想上，會讓你的頭腦比較清楚，看問題的時候，也就比較不會用一種簡單的二分法。(H2，外文學者)

爲什麼他不需要有任何實質的貢獻（如務實型學者），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民主或科學的理想作爲基礎（如先知型學者），只需要有他的生命經驗領悟，就可以證明他的學術存在的價值。「這是一個別人都拿不走的東西」；這句話何其明瞭的說明了知識貴族型學者的特權。這樣的特權需要有什麼樣的社會條件呢？

H2，外文學者。父親爲醫生，母親是師大畢業生。從小讀資優班，北一女畢業的他小時候功課非常優秀，因爲喜愛物理和化學而選擇了甲組（文法商社），直到大一下學期因病休學後，在復學的階段受到就讀外文系的姊姊影響而

轉了系。家裡對於轉系沒有任何的意見：

我母親她從來就不管我們的學業，因為她覺得我們都會自動自發，她當然會有覺得什麼系比較好，但是我印象中並沒有身邊什麼人叫我考慮要不要轉，反而是系主任，資訊系系主任覺得怎麼會要從我們系轉到外文系，或是系上的老師會覺得不可思議，還有外文系的學生碰到我要轉到外文系，會好奇我為什麼要轉到外文系，可是家裡是滿讓我自由選擇的。(H2，外文學者)

家庭對 H2 轉系（從工程科系轉到外文科系其實是升學主義意義下的降轉）完全沒有反對的意見。儘管因為父親早逝，經濟並不十分充裕，但是他仍然能夠豁免於經濟壓力的想像，沒有一技之長在身的壓力，持續的依賴家教或是擔任學術期刊的編輯唸完沒有實用性的外文博士。

訪談者：你認為大學應該服務於企業的需求嗎？

受訪者：今天台灣的大學裡當然有一些人很適合提供政府意見，這當然可以啊！可是這不表示在學校的這些教授，通通都要照這樣的模式，如果台灣的這些知識份子百分之百都要用在台灣的經濟貢獻，那請問，你作為國際的一員，你今天不就是 free ride 美國或其他國家的知識嗎？如果說全台灣的智慧都要用於立即的經濟發展，那麼其他的努力都是 nonsense，如果你要去探討國際的普同知識，你要去追求什麼法國的哲學、社會學，那你去美國、法國好了，不要來台灣，因為台灣所有的智慧都要完全用於台灣經濟。這樣的說法通嗎？…當然，每一個人都會按照自己角色說話，當政府需才孔急時，他發現許多教授都在做學術研究，他當然有這種看法。(C4，商學學者)

C4，商學學者，師大附中畢。父親從軍職轉大學教職，大學兼任教授。大學原本填的是土木工程，研究所時轉向管理。畢業工作兩年後才決定走入學術界。C4 認為讓他投入學術工作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我爸爸還是很希望我走學術，因為他自己是教授，他一直覺得我怎麼土木系、企管所畢業後為什麼不繼續讀書，不管是土木還是企管也好，就是應該繼續讀。…還有一個是我現在事後想，我對心

理面的東西還是比較有興趣，當時接觸的都是土、木、物，現在覺得那時候進到土木工程這樣的領域未必是最適合的。加上我父親推我一把，我本來還想不要那麼快出去。(C4，商學學者)

C4 的例子更明顯的看到了一種家庭對學術資本累積的鼓勵形式：「不管唸什麼，就是要繼續讀書。」這裡也看到了知識貴族型的學者並不一定是人文科學或是自然科學的特權。因為學術分工系統的穩固和成形，康德所言的純粹理性並不限於在特定的基礎系所學科上，許多原本依賴於國家或社會需求的學科因為學術場域的自主性建立而開展出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在過去，這種知識貴族氣質僅僅是純人文科學、哲學和基礎自然科學所享有特權，如今這些拿破崙在十八世紀末所建立的實用性學科，因為學術場域的建立給予了存在的保障。

MB2，生命科學學者，新竹中學畢，父親是清華大學教授。新竹中學畢業的他功課一直非常優秀，大學選填志願完全是自己決定的。從小由於家裡沒有任何的限制，而是自然而然就會閱讀：

我只有看書。我閱讀的範圍很廣，什麼都看。我小學就有閱讀的習慣，現在的古典、大眾讀物都很小就閱讀了。我家本來就有書，自己也本來就會去看，我爸媽也沒有特別去導引，我是自然而然的就去閱讀。我的小孩從小就看很多，反而中學以後看得比較少。(MB2，生命科學學者)

訪談者：你為什麼大學會選擇植物系？

受訪者：我選植物系的原因是因為植物系當時有很多關於基因的課程，我想研究基因。而且也因為植物系不需要外語，而動物系的課程則需要。(MB2，生命科學學者)

雖然 MB2 強調「很少管我們，我們都是自由發展，我從小功課就很好」，但是如同 H2 和 H4 所說明的，這種「很少管」早已意涵著父母對子女未來成就的放心，和不需要有任何升學壓力和文憑主義的自信。這位在大學聯考就清楚的知道自己要選擇基因作為研究方向的學者，顯然比同年紀時，按照升學落點安排志願的學者要來得早熟，這種早熟沒有例外，就是透過家庭給予的自由閱讀和早已準備好的書籍，從小到大享有這種別人沒有的特權。

知識貴族的特徵反應在對所有的權力活動感到反感。這個部分以學術行政工作的意願來分析：

台灣的文化，是把行政工作當官來看，所以有一個階層化，我很不喜歡這個東西，你知道我小時候教育真的很不喜歡這個東西，我真的很不能適應，可是台灣基本上就是這樣，你當什麼主管、當什麼副主管，就是把他當官來看，所以很多人都要當，要當得不得了，我對這個文化真的是很不喜歡，而且我有國外經驗，我知道很多東西都是責任，大家輪流當嘛！……我非常不喜歡把這個東西當做官，而且利用這個官位來建立一個 hierarchical 的東西。可是這是我們社會的根本性質，所以我對這一點很不適應。(H4，歷史學者)

我沒有考慮過其他的方向，譬如說行政職務，基本上我沒有很大的興趣。(MB2，生命科學學者)

行政工作我覺得滿不適合的，所以比較不會傾向於……。行政工作是要跟滿多人接觸的，我是一個不太懂得…只會做自己的事的人，比較 asocial 一點，但行政工作很多時候你都要處理人際關係這類的事情，而不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所以我覺得並不是那麼的適合。(H2，外文學者)

就是關係。我自己的看法，我們都知道中國人講關係、人情，所以你一旦涉入，你就會覺得踏入人情債，要做很多的結交，甚至是巴結。說實在的，你陷在裡面以後，好處當然是得到很多實質利益，會結交很多台灣所謂上流階級的人，拿出來的卡都是貴賓卡，去哪裡都可以打折，甚至免費。雖然他沒有違法，可是這個已經嚴重到…我們整個社會都沒辦法進步了，如果我們再不想辦法劃清界線，整個社會還是受制於很多人情關係，那麼企業、政府都沒有辦法作一個應該有的一個有魄力的決策，這是一個很痛苦的選擇，你在你的職位上雖然希望能夠很有魄力，可是當你去得罪這些人你又很難做事，所以你一方面想要做事又必須要跟這些人扯在一起。除非你有很大的智慧去解決這個問題。(C4，商學學者)

這裡必須多作說明。知識貴族學者對行政工作的反感並不是因為事務性的繁雜會影響到學術，而是因為對行政工作的權力化而反感。對他們來說，行政工作是一種不需要以官位和權力為代價的責任和純粹付出，不為任何外部目

的，只為學術成就的服務，在這一點上他們類似於民主先知對學術行政的態度，只對責任性的行政事務感到興趣，對掌有實權沒有興趣。對權力的反感會表現在他們對指紋資料庫和監視器的價值判斷上：

我其實不太贊成建立指紋資料庫，因為靠指紋破案的統計數字沒有信服力。然後我覺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你建立指紋資料庫，你怎麼能確保不會反而因此讓某些人蒙受不白之冤？加上詐騙的風氣，我覺得指紋資料庫是不太……（安全）。監視器我也是反對，基本上這三個我都反對，我覺得看起來那麼有效的遏止，可是其實我並不是那麼有信心。（H2，外文學者）

至於指紋資料庫，這個問題是說，一個政府怎麼樣用比較簡單的方式找到重要的資訊。指紋的問題是說，第一個前提是，資料的丟失是不可避免的事，連在管理最嚴格的日本都不斷丟掉，因為它是有力的犯罪和謀利的工具，事實上能夠接觸到這些資料的人之中，一定會有犯罪的因子，願意把這個出賣，賣給犯罪的集團，所以指紋資料庫在我看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說，這個資料一旦有了以後，它能不能夠不被非法集團利用，這一點就是作為問題嚴重性的判斷。因為絕對不能以資料不會丟為理由，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從經驗看來，現在大量的把資料用數位的方式儲存，包括日本，已經有掉了的，政府一直說不會掉，還是掉了，這是一定的，這不是 hacker 的問題，管理的人就會有問題，所以資料能保管萬全不是理由，而是萬一掉了，能不能有什麼方式不要有重大的損失。指紋的事情如果在這件事情沒有講清楚之前，我是傾向反對的。（H4，歷史學者）

我會傾向於不同意，因為這些措施有它好的目的，但是大家也會擔心隱私權，這些 information 會被用在其他方面，今天如果有人掌握了這些 information，他可以知道任何人在什麼時候的哪裡出現，會影響一些事情。（MB2，生命科學學者）

受訪者：我對這個 issue 沒有很深入的了解，大概只是從報紙上看到瞿海源講的一些，從我很粗淺的理解，我是反對的。……

訪談者：如果就純粹你個人的意見呢？

受訪者：如果不是要我分析解釋的話，就純粹從情感出發的話，我認為在人權問題沒有解釋清楚之前，我是反對的。(C4，商學學者)

社會秩序的價值判斷和學術行政的態度是文化教養的表現，文化教養愈高，對使用秩序和權力的手段來達成的目的愈不重視，而且也都不認為學術需要為任何的理想（科學素養和民主素養）或務實（為國家或社會帶來物質的豐饒）而服務。知識貴族的文化教養無疑是最深厚的一群，這裡討論接近知識貴族的六位學者中，有三位的老師是教授，一位是著名的佛教文化創作者，一位是醫師，只有一位是從商工作。他們都有這樣的特色，家庭對教育的態度完全沒有就業和升學主義的壓力，也都因為家庭早已準備了大量的書籍培養他們對純粹知識的喜愛（和務實型學者的不同）。他們的求學過程也沒有任何的壓力加諸在他們身上，他們身上看不到時代的使命（科學先知的科學報國），也看不到社會的烏托邦性格（民主先知的社會改革），他們的學術只是為學術而學術，不為任何的理想和生活價值而服務。這種學術態度並不是來自個人的天賦，而是家庭的對教育自由和廣泛閱讀的教養過程所養成，以及一個安穩和富裕的社會。

#### 第四節：學術地圖

圖 4-1：學術態度分類的相應分佈圖

指紋和監視器+ 學術行政 +	國家秩序+ 個人人權-	指紋和監視器+ 學術行政 -
務實型： 工程：2人 生/醫：3人 商學：3人 社會：3人	科學先知型： 科學：6人 生/醫：1人	
科學- 社會+		科學+ 社會-
民主先知型： 工程：3人 社會：2人	知識貴族型： 人文：4人 生/醫：1人 商學：1人	
指紋和監視器- 學術行政 -	國家秩序- 個人人權+	指紋和監視器- 學術行政 -

圖 4-1 表這次訪談之間的分類示意。橫軸表示科學(強調真理和知識的重要)傾向和社會傾向(強調對人的物質貢獻或民主貢獻)之間的光譜<sup>145</sup>(這是真理和民主的零和關係),縱軸表示秩序和人權的光譜(贊成一樣也是價值零和的),圖中的「+」和「-」表示傾向的親近和疏遠。從示意圖的左上到右下則是<sup>146</sup>表示「強調學術一定有所用」(usefulness of scholarship)和「強調無所用的學術」(usefulness of scholarship)的差別。

橫軸和縱軸採用的都是相應的(或零和的)因素來繪製。橫軸採用的是「科學」<sup>147</sup>和「社會」的傾向變化,這個差異表現在「科學先知、知識貴族」和「務實型、社會先知」兩個大分類上。主要的差異在於這兩個集團對知識的目的不同。前者視知識本身為目的,而後者視知識是為社會服務(無論這個目的理想多麼的崇高或多麼的務實)的工具。所以在橫軸上的表現中,科學先知和知識貴族同樣強調科學、知識、學術,甚至是啟發民智的教育;而民主先知和務實型學者同樣強調民主、平等的重要性。

縱軸則是學者的處世態度在集體秩序和個人權利之間的相應變化。這個差異表現在「社會先知、知識貴族」和「務實型、科學知識」兩大分類上。這兩個分類主要的差異表現在價值判斷的意見上(國家奪去人權的政策),社會先知和知識貴族在意見上均傾向於個人的自由,而不喜歡集體制約的方統治方式;而科學先知和務實型學者則傾向於對集體秩序的期望。

第一象限是科學先知型學者組成,他們認為學者的角色應該要對科學有所執著,而且科學教育要先於科學研究,所以強調科學素養。他們傾向於支持維持秩序的所有措施,但卻不喜歡去執行學術上維持秩序的措施(學術行政工作)。他們的社會實踐反映了他們對學術的期待:科學報國。

第二象限是由務實型學者組成,他們認為科學是為社會而服務的,只是他們服務的不是社會的精神層次,而是物質層次。他們傾向於支持所有維持秩序的措施,也認為把這樣的措施放在自己身上是有價值的。他們的社會實踐反映了他們對學術的期待:滿足基本的必需性。這完全是繼承自家庭對教育上的期待。強烈的物質實用性價值取向是他們的特色。

第三象限是由民主先知型學者組成,他們和務實型學者一樣,認為學者的角色要以社會貢獻為優先,他們所指的社會貢獻不是物質富裕,而是民主素養。他們傾向於反對所有維持秩序的措施,也不喜歡把這些措施加諸在自己身上。

<sup>145</sup> 對價值光譜的分佈來說,真理(價值)和民主(價值)是不可能同時獲得的,兩者推論到某一個界限必然會面臨到二選一的局勢。

<sup>146</sup> 這是來自柏拉圖著名的洞穴隱喻。柏拉圖以光和影來譬喻背對著明亮,他的世界就是光明所照出影子的洞穴人;以及走向光明打開世界視野的啟蒙人之間的差異。

<sup>147</sup> 「科學」過去是知識中最出類拔萃的一種,如今則幾乎是審查知識的標準了。

他們的社會實踐反應了他們對學術的期待：民主精神與公民社會。和第一象限的科學先知一樣，他們帶有強烈的社會責任和使命感，將國外「進步」的觀念引進台灣。強烈的非功利性價值取向是他們的特色。

第四象限由知識貴族所組成，他們在學術的態度上接近先知型學者（排斥學術的物質性使用），但是他們更進一步的，連任何的「理想」的貢獻都沒有（也排斥學術的理想性使用，如民主和科學）。他們是學術獨立性的表現，他們的出現代表著特定的學科已經發現出不需要由任何社會需求和價值（不管是物質的需求還是理想的需求）來合理化的一套獨特邏輯，他們毫不理會外部的需求，不管是物質性的還是精神性的需求，只是憑藉著純粹學術的學術實踐，這種獨特的邏輯就是韋伯所說的一種科學體驗：

這完全取決於你能不能成功的想到這點：沒有這種被外人所嘲弄的著迷，沒有這種「生之前千年已過，還有千年沉默的等待」的熱情；沒有這些的話，你將不會有任何為科學而服務的職志，所以你應該去做其他的事。除非一個人懷著熱切的奉獻，否則沒有什麼事是值得人去做的。<sup>148</sup>

知識貴族在面對國家權威時的態度和科學先知分開，而在面對社會服務時的態度和民主先知分開。這使得知識貴族的在社會位置當中愈發難以找尋他的社會條件。這必須要透過家庭文化教養的差異分析來解釋<sup>149</sup>。本研究所分析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問題也在於此：「家庭傳承下來的文化教養是否會影響學者的學術態度？」分析的結果是肯定的。不過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父親是大學教授的學者和父親是軍人、公職、中小學教職人員的學者，在學科的分配上並沒有明顯的關係。但這並不代表文化教養對學術工作沒有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我們不是按學科來劃分學者之間的不同，而是用學者和外部社會之間的關係來看待學者之間的不同，會發現父親的教養程度（父親是大學教授、文化創作者、醫（上層族群）>公務員、軍人、中小學教師（中產族群）>商人、勞工、農人（勞動族群））影響的不是學科的選擇，而是學術態度的選擇：

圖 4-2：父親職業和學術態度的相應分佈圖<sup>150</sup>

<sup>148</sup> 參見Weber, "Science as Vocation", in Gerth and Mills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p135。

<sup>149</sup> 也有另外一條路徑。如Bourdieu在*Distinction*的後記 "Toward a 'Vulgar Critique of Pure Critiques'"提到一種「否定測量」。這原本是取自康德*Essay on Negative Magnitudes*中，討論如何測量「善」的大小，康德認為：「要透過克服惡的大小來測量善，要透過衝動的否定強度和粗魯的拒絕強度來測量純粹品味。」

<sup>150</sup> 在這裡是以文化教養為父親的類別作區分的。但必需注意到文化教養並不是經濟資本，因此職業上的類別必需經過學歷和文化上的重新區別。在訪談對象中，將父親的文化教養區分為勞動族群（由國中、小學歷畢業的工人、農人、商人所組成）、中產族群（以高中、專科、大學畢業

指紋和監視器+	國家秩序+	指紋和監視器+
學術行政 +	個人人權-	學術行政 -
務實型		科學先知型
勞動族群：6		勞動族群：0
中產族群：5		中產族群：6
上層族群：0		上層族群：1
民主先知型		知識貴族型
科學+		科學+
社會-		社會-
勞動族群：0		勞動族群：1
中產族群：4		中產族群：0
上層族群：1		上層族群：5
指紋和監視器-	國家秩序-	指紋和監視器-
學術行政 -	個人人權+	學術行政 -

這裡可以看到務實型學者的父親教養程度較少，幾乎主要是由技術或半技術勞動者、從商人士，和軍公人員所構成；相對的先知型學者較務實型學者的父親在文化教養程度上較高，但是較知識貴族型學者為低；而文化教養最高的一群（主要由醫師、大學教授、文化創作者所構成）則落在知識貴族型學者。學術態度在表現在家庭的教養，是與品味不同的，品味和美學的鑑賞是由長期嚴格的紀律訓練養成，但學術資本則是由開放和自由的閱讀習慣養成。傳統社會學的流動分析幾乎都是以代間職業的變化作為分析的主軸，這沒有辦法看出同為「大學教授」在代間流動中所構成的變化之間的差異；而且一般對理工醫法商、人文社會科系的選擇和代間流動的印象也是錯誤的，家庭的貧富和科系的選擇沒有絕對的關係，而是家庭文化和從事學術工作的態度才有關係。

---

以上的軍、公、中小學教師、以及小部分學歷較高的商人所組成）、上層族群（由醫學院畢業的醫生、碩博士以上，在大學任教的大學教授、或從事專業的文化書籍創作者組成）。

## 第五章：

### 結論

學術，是現在知識生產最自成一格的場域。然而知識的用處卻因外部社會的使用而有不同的用途。學術無法自外於社會，但是學術又不能依照任何的價值走向而前進，它必需有自己的一套目的，這勢必使學術和外部社會形成一個相對自主性的關係。

本文的目的就是在於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台灣在遷台後，學術和外部社會的關係是什麼？受到什麼樣的國家因素變成這樣？」康德的理論無疑的給定一個很好的分析架構，他以分工的方式區分出兩種系所：為一般人能設想的目的而服務的高等系所，以及純粹為理性服務的基礎系所。但是成為一個高等系所和成為一個基礎系所到底是透過什麼樣的選擇機制區分的？而且這樣的區分是不是會有時代上、國家處境上的差異？學術是一種行動者所構成的場域，無疑的必需從這些參與學術工作的學者身上找出他們投入學術實踐的意義，以及他們基於什麼樣的社會條件選擇了不同的意義。

本文的第二章引入康德的教員說，這是本文重要的區分架構。不過康德的理論存在著許多的問題。首先康德的概念無法應用到十九世紀發展出來的市民社會概念，「批判」這個概念需要和純粹理性分開。市民社會的興起使得大眾出版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許多原本在康德意義下的基礎系所獲得了來自外部的論述權力，針砭時局和政治。這早也不再是「純粹理性」，因為它含有強烈的價值導向和教育作用。因此要歸納出「基礎的」特質，必需重新定義。

第三章討論台灣學術發展的歷史脈絡，這是一個和康德對話的特殊脈絡。由於台灣在國際位置上屬於後進國家，對學術的發展必需要依附在現實環境的考量下，也因此台灣的學術和教育發展一直受到經濟力量的牽扯和主導。也有一部分學者有其他的理想，他們是先知型學者（或稱暫時性高教員），他們是曾經留學國外的先鋒，一下子從落後的國家跳到先進國家，將先進國家的政治方式、教育方式和生活方式視為基礎，回到母國後發現純粹學術的領域受到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拉扯而無法獨立進行，教育上受到升學主義和文憑主義的影響，無法直接對知識產生興趣；在政治上受到威權體制的影響，無法朝向市民社會。在百廢待舉的環境之間，迫使這群學者捲起袖子進行社會和教育改革，在這社會實踐的過程中使得他們變成了先知型的學者，對社會有很大的使命感，強調學術應該為這種良心而服務。這類型的學者原來所屬系所幾乎都是康德所說的「基礎系所」，因為他們是自然科學家、人文社會科學者。但是卻因為台灣的「社會」有民主化

和科學化的需求，推促他們成爲先知型學者的機會。不管是台灣以經濟需求發展學術，或是先知型學者在台灣推動民主和科學的活動，都看出來康德的分類架構有時空上的侷限，無法充分或是康德分類來將學者的活動簡化成二元的高等／基礎系所。

經過第二章的理論修正和第三章歷史脈絡鋪陳。本文在第四章試途重新解釋學術和社會的關係是透過什麼樣的分工來達到相對自主性。由於第三章陳述了許多被康德視爲基礎系所的學者在台灣其實進行了許多價值引導的活動，康德式的系所學科式劃分已不可行，我必需透過實際的經驗來審視學者們的不同，以理解學術場域應該如何分類才能妥善解釋它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研究的模式以朱元鴻在（這雙腳所經驗的階層：審美語言分析）中的訪談研究來進行。如同朱文一樣，本文也試圖透過訪談的研究方式，來測量學者對學術的態度是如何隨著他在家庭教養過程中所繼承的文化位階而產生分化，以描繪出他在學術中的位置是靠近外部社會的，還是靠近學術核心的「爲學術而學術」。

訪談的研究發現，台灣的歷史脈絡對學者的學術態度有不可抹滅的痕跡。

二十九位平均於六個學術專長的受訪者中，有 11 位在選擇投入學術工作時，動機都是來自於聯考排行、是否爲未來就業的熱門產業，或是單純爲國家社會的物質利益而服務的務實型學者，他們的教養過程大多是來自社會主流的升學主義，家庭對教育的文化意義表現在他們的學術態度上，意見上非常親近於國家的政策和社會主流的意見。

有 12 位學者，他們是從台灣威權體制到學術獨立過程的時代產物，他們實踐了大量的社會改革運動，企圖消滅學術獨立上的社會問題：升學主義、政治上的不民主、科學素養和公民素養低落。先知型的學者又區分爲科學先知和民主先知，兩者對學術的態度一致，但是和社會俗民的距離並不一樣。這表現在他們對價值問題上的不同；科學先知因爲基於科學理念，對反科學的權威容易產生反感，所以他對權威的設定對象其實是來自社會上的民粹不智，例如教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對市民社會的自主並沒有信心，對科學先知來說民主就是民粹的候選人，因此他們容易產生科學權威。而民主先知則恰恰相反，作爲市民社會代言人的他們關心的是公民素養的訓練，因此對所有來自國家因爲統治的目的而威脅人權的價值判斷傾向於否定。先知型學者非常類似公共知識份子、評論家和記者。他們帶有強烈的理想性格，認爲學術工作只是社會實踐的手段（不管是安生立命的手段，或是獲得言論能見度的手段）。他們的出現，表現出後進國家學者投入社會活動的活躍背後有其結構性原因，這個結構性成因是康德在論及教員鬥爭時不必討論到的問題，台灣的學者有當時的普魯士學者不需要面對的問題和歷程：留學外國的經歷，見證先進國家的制度，然後回國看到落後而不足的社會情境。這樣的經歷都不是二百多年前康德所處時代的普魯士學者會面對到的狀

況。

最後 6 位是知識貴族學者。他們的存在代表學術場域的獨立程度。他們傾向於不參加任何的社會實踐，強調學術不需要為任何目的服務。他們是康德分類中專司純粹理性的教員們，也是韋伯所說的為學術而學術的一群。他們都來自文化教養豐厚的家庭，大學教授就是醫生（除了一位藝術類學者的家庭從商以外）的比例最高，幾乎獨占。他們的家庭文化教養非常的開放和自由，小時候的閱讀量很大，而且沒有任何的目的性。升學主義的壓力在他們的身上看不到任何影子，填選科系幾乎完全掙脫文憑主義的牢籠，填選科系或轉換科學完全憑藉自家庭自由教養風格的「個人興趣」。他們在價值判斷上離社會最遠，學術態度也最傾向於不需要配合任何的需求，不需要給定任何的社會交代（accountability）。但是身處台灣的他們並不享有低教員的批判理性尊榮。康德說，國家需要基礎系所的純粹理性批判來嚇止政府的腐敗，但是在學術制度未獨立的台灣，所有的批判都不可能是「純粹的」，都必需要帶有特殊的目的或是需求來進行「不純粹的」理性批判。

訪談的分析得出了三點結論：

- 一、學術和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大抵如康德所描述，學術的核心價值和外部的利益權威之間是緊張的鬥爭關係。但是文化教養並不明顯影響學科的選擇，我們在任何一個領域中都看得到不同類型的學者，當然在本研究中，人文類學者全部都是知識貴族，商學也多數是務實型，康德系所學科式劃分的傾向可能有它的解釋效力，但研究中意外發現了一位商學學者和一位生物／醫學學者的學術態度非常傾向於知識貴族，都強調他們的研究不為社會任何人服務，這是康德的理論架構無法解釋的地方，這說明了高等／基礎系所的區分只是一個大略的分布，不代表社會用途明顯的學科就不會出現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Friedrich Schelling 所言：「某物之為萬物，絕非任何特定之一物。」既然理性是所有知識的根本，它又怎麼可能被特定的學科所獨有。這樣的反省主要來自 1794 年後，拿破崙式的工藝學校模式深刻的影響了現代大學的專業化程度，學科和學科之間的界線愈來愈明顯，能互相交談和理解的部分也愈來愈少。專業化學科的學者面對的批判也一樣是來自同一學科的學者，而不是來自另一個比較沒有社會需求的學者。
- 二、研究中發現，這些文化教養卓越出眾的學者真正類似的不在於他們的學科選擇，而在於他們的治學態度。教養影響的其實是學術的態度和學者距離社會主流需求的遠近，家庭傳承的教養愈是豐

厚，對學術的態度愈容易趨向武斷的<sup>151</sup> (arbitrary) 需求，從學者為物質問題反應，到學者為科學或民主價值奮鬥，最後到學者只為純粹學術負責。其實用性的傾向如圖 4-1 所示，同顏色由深 (usefulness) 至淺 (uselessness)，隨者學者家庭的文化背景的差距，向知識貴族蔓延過去。

- 三、 由於台灣的後進國位置、威權體制和升學主義的影響，形成了對這些落後現象的不滿先知型學者。這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和地方產物。同時，也台灣因為後進國的位置，學術發展必需要依賴國家的資源投入，也因此受到國家選擇方向的影響，無法形成一個完全獨立的學術場域。

最後的結論必須說明的一點，必須要回到康德對分工意圖上，學術場域的構成不能由任何一種學術態度來獨斷。學術如果要獲得社會或國家的正當性基礎，必需要有一部分學者從事和社會或國家所需要的事務；但也需要有一部分學者從事為學術而學術的工作。而且這樣的分工方式背後的社會條件是來自於家庭傳承的文化教養過程，使得他們將學術視為不同文化階層的生活條件反應。文化教養較低落的一群，容易將學術工作視為生活必需問題的反映；文化教養中階的一群容易將學術工作視為信仰價值的反映，傾向於剷除過去的傳統連帶關係。文化教養最高的一群，則是把學術工作視為武斷的活動，學術不為任何目的服務，沒有外部的指涉對象，只為自己服務。

最後，康德的教員鬥爭理論立基在他過去對「純粹理性」的信念上，他認為只要在合法鬥爭（不欺騙、不力脅迫、不利誘、不以「用處」，而是以「理性」作為學術最高指導原則）的學術體制之下，不為任何目的服務的純粹理性就可以發揮它的力量，批判所有帶有權威力量的學術。但是實際訪談的結果發現一個令人感到困惑的結果：學術態度其實是學者從家庭傳承文化教養反映過來的一種表現。如 Bourdieu 在 *Distinction* 中所討論的三個不同文化資本的階級，分別以必需性、文化善意、文化貴族的美學品味，反映出他們的階級特色。我們也一樣可以在學術上看到治學態度隨著文化教養而變化。其中真正能夠做到純粹理性的學者型態，其過去家庭的文化教養累積卻是最雄厚且深遠的。

康德期待理性之光能照耀被世俗權威所壟斷的大學，成為社會進步的馬達，只要大學的理性不死，社會就一定的進步。但其實，純粹的理性背後有綿密長遠的文化階層差異問題作為門檻。知識貴族之一的受訪者 H4，在訪談中回答他的學術知識對社會的作用時，他是這麼說的：

訪談者：人文學科既不能提供它的服務，它的作用

---

<sup>151</sup> 武斷的意思是說，和現實需要斷裂的。沒有任何現實指涉的。

對一般人而言就是比較無法感受到的，就自然被能感受到的排擠到下面去。

受訪者：這是社會問題，人文學科跟理工科比起來，它創造的是公共財，它是所有人都能用的，那公共財在社會上是很重要的啊！公共財來講，相對於每個個人來說，當然影響比較輕，這要看你的社會採取什麼樣的觀點來看，如果採取的是非常狹隘的功利主義觀點，或是對日常生活的內容沒有興趣，動不動就把娛樂就變成賭博，這樣當然任何公共財的地位都會是低的，我覺得對人文學者而言，改善你的地位還是其次，最重的是自立自強，自發自律，創造出好的東西，讓喜歡你的人他們的生活得到豐富，知識得到進步，也許可以一點一滴傳下去。這沒有什麼社會工程可以改變這個東西，有沒有必要改變我也懷疑，如果改變有的話，應該是一種演化，是自然形成的。(H4, 歷史學者)

學術的知識是像路燈、馬路、水庫、電廠一樣，只要一點點，或甚至不需要成本就能夠享有的公共財嗎？圖書館的大師著作，躺在大學圖書館裡、國家圖書館裡的經典知識，除了讓讀者跑一趟，辦個證件，交個照片以外，還需要什麼條件？純粹理性的學術知識近用（access），除了這一點點的經濟成本外，難道就沒有其他的社會條件嗎？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們發現文化教養是一種完全家庭個人化的秘傳資本，沒有任何的形式（包含學歷證照也無法說明，本文訪談對象中全部都擁有國內外著名大學的博士學位）可以完整言說它。我們沒有辦法不承認，這個被康德賦予啓蒙大任的純粹理性，竟有如此深遠的教養傳統作為背景。然而可惜的是本研究只能作出 Bourdieu 文化資本概念的前半段，討論文化資本的家庭養成過程，但仍然需要文化資本在學術場域兌現的邏輯，以完成文化資本和學術場域之間完整的生產和供售過程。也就是說，對本研究來說，未來的發展需要針對不同類型的學者，追縱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表現、研究合作的機構，甚至需要能夠掌握不同學科領域中，不同的學術期刊和研討會對該學科學術成就（credits）的影響，以及受邀國內外大學短期講學的次數。但本研究的經驗有限，家庭教養和學術態度的關係也只能說明文化資本前半段的過程，但也足以描述純粹理性的社會條件和家庭教養過程。這是研究結論重要的發展之一：「找出大學核心的理性精神的社會條件。」過去（如康德式的系所鬥爭說）總是將理性視為是知識的一個重要條件，學者必須要稟持的理性才有可能從事知識的研究，理性和知識是不分的。但是康德透過系所鬥爭的分析，將知識視為是理性的上層範疇，區分出有用的知識和理性（無用的）的知識，而且賦予後者核心的地位，能夠和前者進行合法鬥爭和批判。可是康德的啓蒙式想法，將理性視為先天的產

物，而忽略了純粹的理性也有它的後天社會條件，它不是運用知識的功利企圖，也不是企圖用知識改造社會、教育人民的理想，而是無法由學校教育所阻斷的家庭文化教養。在訪談的例子中我們看到，純粹理性完全不屬於所有用功但家庭文化教養不足（以大學選填志願、從事學術研究的目的、學術行政工作的服從與否來測量）的孩子所擁有，這些孩子擁有所有的知識條件：用功、努上、上進、積極、受教；但獨缺一項：開放、自由、不為任何目的而閱讀的廣泛閱讀，這是一種從小培養的純粹好奇心。康德所設想基礎系所的教員們，是由這些自小培養純粹好奇的知識貴族所組成，對所謂的「哲學家批判精神」或是傳統倚賴知識作為權力批判的培根式知識方針有了些許的商榷味道。

最後，在呼應本文對台灣現況的研究中，本研究用來對應品味研究中下層階級的「務實性學者」，以及用來對應中層階級文化善意的先知型學者，並沒有表現出面對（康德區分下的）基礎系所的純粹理性時，那種自卑、怯懦、絲毫不敢妄自僭越的退縮，反而以務實的理所當然毫不畏懼的指責基礎系所的教員們不理會社會需求。承繼自文化教養的理性之光在台灣也許並沒有那麼耀眼。一位完全贊同「教授的待遇應該和學生受企業重視的程度成正比」的教授是這麼說的：

我覺得應該把社會需求當作一個很重要的評鑑，不然你高等教育是在幹嘛，它應該是一個 open system，不是關上門我們自己玩自己的，為什麼國家要出錢給你玩自己的，我常常開玩笑我們來成立一個「水管管理系」，老師混學生也在混，老師教不到東西，學生也找不到事，很多國立大學成立了，只要中華民國不倒它就永遠在那裡。

訪談者：你的意思是說，冷門科系就像水管管理系一樣，不考慮社會需求？

受訪者：對啊！他們老師就會站起來說我們不要考慮社會需求，我們有偉大的學問，因為我們有偉大的人在管理水管，他們有很多理由，說你們很骯髒，叫學生賺錢，講一堆理由，會有這樣子不是嗎？  
（C3，商學教授）

恣意否定冷門學科的知識，對沒有任何社會需求的學科毫無敬意！這代表了台灣的學術脈絡中，對知識貴族的學術態度並沒有賦予那麼高的地位。我們看不到一種學術服務於社會現實的羞恥感和罪惡感，看不到中國傳統士人反商輕武的情結，反而看到學術服從於社會需求的理所當然和理直氣壯。非常有趣的，C3的方式是透過一種諷刺（caricature）的方式，把一種純粹理性的知識薰陶滿足（哲學、文學）翻轉成一種最基層次的身體和排泄問題的滿足（水管管理）。這種翻

轉足以說明原來兩種不同知識類型的位置之間的文化層次差距其實是存在的。而且這種敢於翻轉和降格的勇氣其實也不難理解，我們可以回顧台灣過去在教育和學術上的投入：從 1947 年胡適提出學術獨立計畫以後的台灣，不管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資本都不足以全盤接受投入學術應有的成本，所以它必須做選擇和節約，選擇一種趨吉避兇的方式來從事經濟上、文化上、人力上皆昂貴的學術活動，而且對浪費成本或投資成本在他所不熟悉領域的人們十分的不友善。因此台灣的學術氛圍和它剛剛脫離第三世界國家的小資產階級心態會密切相關，而台灣這是台灣的國際地位所展現出來的學術樣貌，一種剛剛脫離貧窮之後的學術氛圍。這使得大學的精神核心，也就是承繼自家庭文化教養的純粹理性態度，對台灣學術場域的支配並不是那麼有力量，反而是無產階級式的必需性和小資產階級式的（只對英美語系國家表達的）文化善意，卓越地支配了台灣學術場域在經歷過後進國家計畫性經濟之後的學術發展態度。務實、目的性，強調建設性的學術要比批判性的學術更具有學術尊榮，這種特殊時空下的學術實踐其實正是後進國家台灣所身處的國際角色與社會期望（場域結構），以及每一位學者將個人生涯投入這個場域時的慣習差異（慣習特性），分布在不同學術態度的位置上所產生的綜效結果。

## 參考書目

### 中文部分

朱元鴻

1983a,《台中市生活風格研究 I》,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NSC81-0301-H-029-505)。

2000b,(這雙腳所經驗的階層:審美語言分析),《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社會學框作筆記》,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羊憶蓉

1994,《教育與國家發展—台灣經驗》,台北:桂冠。

吳大猶

1990a,(如何發展我國學術),(我國科學發展計畫實施經過和檢討),《科學與科學發展》,臺北:遠流。頁 12。

1990b(科學、技術、人文學),《人文、社會、科技》,台北:遠流。

李國鼎

1987,《工作與信仰—台灣經濟社會發展的見證》,台北:天下。

林和(編)

1991,《科技與本土:第一屆民間科技會議》,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林崇熙

2000,(從兩種文化到科技社會),第七次張昭鼎紀念研討會:科學的人文面向探索,台北:陽明大學。

金耀基

2001,《大學的理念》,中國北京:三聯書店。

胡適

1966,(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胡適的一個夢想》,台北:胡適紀念館。

孫清山、黃毅志

1996,(補習教育、文化資本與教育取得),《臺灣社會學刊》,19,p95-139。

楊翠華

1992, (胡適對台灣科學發展的推動：「學術獨立」夢想的延續), 《漢學研究》, 第 20 卷, 第 2 期, 頁 327-351。

錢永祥

1988, (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省》),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一卷, 第四期, 頁 57-99。

## 中譯部分

Bloom, Harold

1998, 《西方正典》, 高志仁譯, 台北：立緒。

Cassirer, Ernst

2004, 《人文科學的邏輯》, 關子尹譯, 中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Coser, Lewis

1992, 《理念的人》, 郭方譯, 台北：桂冠。

Jacoby, Ressel

2002, 《最後的知識分子》, 洪潔譯, 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Lnaniecki, Florian

2002, 《知識人的社會角色》, 鄭斌祥譯, 中國南京：譯林出版社。

Rikert, Von Heinrich

1991, 《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 涂紀亮譯, 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

## 英文部分

Arnold, Matthew

1882, *Literature and Science*, <http://www.chass.utoronto.ca/~ian/arnold.htm>.

Bezel, Nail

1975, Autobiography and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Novels of C. P. Snow, in *Annals of Science*, 32, p.555-571.

Bourdieu, Pierre

1986a,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90, "The Scholastic point of view",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5, No. 4,  
p380-391.  
1992,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SAGE Publication Ltd.  
199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Casement, William

1998, DO COLLEGE STUDENTS NEED A MAJOR?, *Academic Questions*; Vol.  
11 Issue 3, p72, 7p.

Derrida, Jacques

1992, Mochlos; or "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 in Richard Rand ed.,  
*Logomachia: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Dimock, Wai Chee and Wald, Priscilla

2002, Literature and Science: Cultural Forms, Conceptual Exchanges,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74. Duke University Press

Gaff, Jerry G. and Wilson Robert C.

1971, Faculty Cul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41, No. 4, P. 186-201

Gay, Peter

1993,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V3,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eryn, Thomas

1983, "Boundary-Work and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8, No. 6, p781-795.

Hacking, Ian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lperin, John

1983, *C. P. Snow: An Oral Biography*,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Kant, Immanuel

1992, *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Kimball, Roger

1994, "The Two Cultures" Today, in *New Criterion*; Feb94, Vol. 12 Issue 6, p10

Leavis, F. R. and Yudkin, Michael

1963, *Two Cultures?: The Significance of C. P. Snow and an Essay on Sir Charles Snow's Rede Lecture*, Pantheon Books

Levin, Yuval

2003, Snow's Two Cultures and Ours, in *Public Interest*; Fall2003 Issue 153, p54, 15p.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dgorecki, Adam

1997, *Higher Faculties: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University Culture*, Praeger Publisher.

Reading, Bill

1997,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dder-Symoens, Hilde de

1996, *Univers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nger, Fritz

1992, *Fields of Knowledge: French academic cultu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890-19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now, C. P.,

1993, *The Two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olleis, Michael

2002, The Role of the Humanit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 in *TRAMES*, Vol. 6, P. 211-217

Trilling, Lionel

1965, The Leavis-Snow Controversy, in *Beyond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Learn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Vesna, Victoria

2001, Toward a Third Culture: Being in Between, in *Leonardo*, Vol. 34 Issue 2, p121.

Weber, Max

1958, "Science as Vocation", in Mills, C. W. and Gerth, H. H.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p129-15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